

史
譯

目次

i 編輯報告

研究論文

- 1 坐產招夫：論宋代接腳夫與重財婚之關係
吳倩宇
- 19 從《御纂朱子全書》
看清代前期官方意識形態與士風的形塑
施厚羽
- 59 朝鮮天下圖與其天下意識
朱社樂
- 87 金融革命與商業社會的興起：
18 世紀初期英格蘭的社會轉型
陳禹仲

第一線學習

- 125 從 *A Woman in Berlin*
觀察柏林戰役中蘇聯紅軍的性暴力
廖容慈

書介

- 151 書介：馮客《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 年的中國浩劫史》
林明波

紀事

- 159 第 38 期《史繹》發表會會議紀要
張容兒
- 183 研究歷程
施厚羽

編輯報告

林宣瑋*

第 38 期的《史繹》總算付梓了。從 2012 年接下主編的職位到現在，已經過了整整兩年。人母懷胎十月生子，但《史繹》耗時 20 個月，其中包含了各種酸甜苦辣、風風雨雨，從害喜到陣痛、途中一度難產、最好只好剖腹生產，種種經過，實在一言難盡。

回顧

《史繹》作為一本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的學生學術刊物，行之有年。每一期的編輯、排版、稿源也因時代而有所不同。事實上，若以《史繹》為研究對象，相信是研究臺灣史學界 50 年來發展變遷的絕佳素材，諸多學者曾在《史繹》上發表文章，《史繹》的重要性不言可喻。而我們也預計在近期內，與歷史系研究生刊物，《史原》，一同進行過刊回溯的工作，希望能數位典藏這些珍貴的文章。

收稿

本期《史繹》共收錄了四篇研究論文、一篇書介，而專欄「學習第一線」，則刊出一篇包括學習成果與研究歷程的報告。

* 《史繹》第 38 期主編、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100 級生

四篇研究論文，皆是作者就讀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大學部時的作品。吳倩宇的〈坐產招夫：論宋代接腳夫與重財婚之關係〉，回顧宋代「坐產招夫」的習俗，思索程朱理學下的宋代婚姻關係。施厚羽〈從《御纂朱子全書》看清代前期官方意識形態與士風的形塑〉，自《御纂朱子全書》的編纂、發行，和在地方上的流傳，討論清代思想傳播與印刷文化。朱祉樂〈朝鮮天下圖與其天下意識〉，除了綜述學者們對朝鮮天下圖的看法，更將之放在 17 世紀東亞秩序變化中，探討其思想與文化意涵。陳禹仲〈金融革命與商業社會的興起：18 世紀初期英格蘭的社會轉型〉，回顧當今學界對英格蘭金融革命的研究，同時也透過服裝、出版兩種行業，討論當時的商業文化。

這期開創了「第一線學習」專欄，旨在收錄大學部學生學習、培育研究能力的相關訓練成果。我們相信：歷史的教與學，非單向傳授，而是雙向交流。這一期收錄臺大外文系（雙主修歷史系）廖容慈的〈從 *A Woman in Berlin* 觀察柏林戰役中蘇聯紅軍的性暴力〉。本篇文章為臺大歷史系 99 學年度林維紅老師「數位資源與史學研究」的課堂檢索練習與研究歷程回顧，作者經修改後投稿本刊。除此之外，我們徵得林老師的同意，在文末附上當時的作業說明，供讀者參考。

本期收錄的書介，為畢業於臺大政治系（雙主修歷史）的林明波，對馮客（Frank Dikötter）《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 年的中國浩劫史》（*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一書所撰寫的介紹。大躍進運動及其後的大饑荒是目前學術界研究的熱門議題，隨著中共資料的逐漸開放，益增研究的可能性。

本期的嘗試

在編輯過程中，第 38 期編輯委員會做了許多嘗試。

我們於 2012 年時，申請了 ISSN（國際期刊編碼），讓《史繹》擁有一個專屬的國際期刊碼。期刊電子化已經成為學術界的必然趨勢，本刊自此期開始，也將收錄於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華藝線上圖書館（airiti Library）、Hyread ebook 電子書店，供讀者下載。且也申請了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另建立了自己的官方網站（shiyihistory.org），所有相關訊息、活動紀實、過刊（目前回溯至第 36 期），皆可瀏覽、下載。

此外，我們也重新修訂了新的稿約及撰稿格式。《史繹》的撰稿格式，整理了各種引用規範（如電影與網路資訊），同時也提供書目管理軟體 EndNote 的格式檔，方便投稿者使用。而撰稿格式，更為 102 學年度臺大歷史學系必修課程「史學導論」的課程教材。

第 38 期的《史繹》編委會，還舉辦了創刊 50 年來、首次的《史繹》論文發表會，邀請投稿者向大學部同學分享研究、寫作經驗，以及安排授課老師、資料庫廠商，傳授、介紹研究歷程與資源。除了知識探討之外，當天會後並安排茶會，以收寓教於樂及學術交流之效。本刊也收錄了這次發表會的紀實。

難以言盡的感謝

本刊之所以能夠順利出版，要感謝許多人的盡心盡力。

首先謝謝臺大歷史系系辦的全力支持。甘懷真主任除了協助爭取經費，始終關注《史繹》的編輯與出版，更給予我們鼓勵與期許。陳南之助教總是不厭其煩地分享編輯實務經驗，教導我們許多學術出版的規範，無法言述這番感動。而林佳宜助教、呂怡燕助教、楊芷柔助教和黃俊豪助教，更在我們需要時，盡最大的努力協助。以上，均由衷地感謝。

也感謝臺灣大學圖書館推廣組館員，李嫣紅老師，特別為《史繹》設定 EndNote 的格式檔，而且總是親切、耐心地回答我們的各種問題。衷心感激。

《史繹》雖為大學生的出版品，但目標定位為專業的學術刊物，文章能否刊出，採取雙向匿名審查制。特別感謝參與審查的專家學者。他們願意花費寶貴時間、投注精力、無私地替《史繹》審稿，並給予專業的指點、修改建議，讓後生晚輩得以學習、修正錯誤。許多的感激，無以言表。

也要感謝第 38 期編委會兩位編輯委員，李亞臻、陳靖叡的協助。《史繹》未改版前，身為第 44 屆歷史系系學會學術部部長的亞臻，將《史繹》主編的棒子交給我；雖然可能辜負了她的期望，但仍相當感謝當初她的信任。靖叡除了是《史繹》的編輯委員，同時亦是我的摯友，幾個深夜對談，至今仍歷歷在目。同為臺大杜鵑花節歷史系攤位的負責人，與他和倩宇在 2013 年春節於 Skype 上的討論，是最難忘的經驗。第 44 屆的學術部只有亞臻、靖叡與我，新生南路的麥當勞、羅斯福路的肯德基，是我們共同的回憶。

身兼投稿者與美術編輯的吳倩宇，更是本刊最大的支持者。倩宇一肩擔下排版的責任。她未曾有怨言，還給我許多的驚豔：身為主編，除了汗顏，更多的是感激。本刊的排版顧問，臺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藝術研究所的韓豐年所長，景文科技大學的曾絲宜老師，淇奧友善股份有限公司的劉柚佑、李主冠老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涂雅筑小姐，提供了許多的排版意見與技術支援。尤甚感謝。也感謝淵明印刷廠的吳稚嫻小姐，幫忙處理本刊的出版事務，筆墨難書的感恩。

而第 38 期《史繹》的責任編輯，張容兒，除了協助編輯工作，更是第一屆「閱讀·寫作工作坊」的負責人。

林維紅老師是本刊的指導老師，也是本刊得以順利出版的推手。我們從一開始對編輯的毫無概念，到後來的逐漸上手，她扮演了關鍵角色。林老師不僅替我們安排了許多編輯課程、請行家分享實務經驗，同時也從旁協助我們。無法忘記在修訂撰稿格式的那個晚上，剛結束課程的老師，與我和靖叡坐在麥當勞，逐條討論著用字遣詞的妥善與否。「要做，就要做得專業、做得好」是老師給我們的期許。無數次的對談，傳遞著她的關心與熱情。無法形容的感謝與感恩。

還有更多、更多需要感謝的人。《史繹》是大家的心血結晶，是我們的學術夢想。

展望

作為大學生的專業學術刊物，《史繹》的宗旨，除了成為學

術論文的發表園地，更希望投稿者能從寫作、閱讀審查意見、修改文章、發表論文的過程中成長。我們衷心地希望，透過嚴格審查，投稿者皆能從中獲益、精益求精。學生的可能性是無限的，只要有專業的訓練、專家的指點，以及求真、上進的心，任何人都可造之材。《史繹》願意提供一個平台，讓大家在此盡情發揮。

我們也致力於成為「華文世界大學生的歷史學學術刊物」。第 38 期取消了以往僅限臺大歷史系學生投稿的限制，改以全臺大的大學部學生為徵稿對象；第 39 期開始，更擴展至「以中文書寫的大學部學生」。

在可見的未來，我們會努力打造《史繹》，讓它成為中文世界歷史系大學生的交流平台。

2014 年 6 月 8 日

坐產招夫： 論宋代接腳夫與重財婚之關係^{*}

吳倩宇^{**}

本文主要討論宋代守節觀念與招夫行為的關係，以及這樣的行為與婦女財產權及家庭勞動的關連。宋代社會對於女性「專心守節」的爭辯尚未形成共識及規範，程朱理學未對招夫行為造成顯著影響，夫死守節可能只是受社會稱讚的行為。而在重財婚的風氣下，無論是「招接腳夫」或「為接腳夫」，是對男女雙方都有利益的選擇。

關鍵字：接腳夫 坐產招夫 重財婚 財產權 《名公書判清明集》

2012 年 10 月收稿，2013 年 8 月通過刊登。

* 致謝辭：本文原為 101 學年度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衣若蘭老師講授的「中國史三」課程期末報告。筆者修改後投稿《史繹》，並於 2013 年 12 月「第 38 期《史繹》成果發表會」宣讀。感謝衣老師的指導，與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建議，除了指出許多錯誤，更讓筆者學習到嚴謹的研究精神。本文所有問題由筆者負責。

**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100 級生

2 吳倩宇

- 一、 前言
- 二、 研究回顧
- 三、 宋代法律與士人對「守節」的看法
- 四、 接腳夫與財產權
- 五、 接腳夫與重財婚
- 六、 結語

一、 前言

本文將討論宋代守節觀念與招夫行為的關係，以及背後的行為、制度及社會風氣。

我們常聽到批評程朱理學如何禁錮婦女，但「招夫」這樣的權力，是否反映出宋代婦女的主體性並不若我們所想般的低弱？在程朱理學的影響下，宋代的貞節觀似乎爭議不少。「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這樣的價值觀可能被後人放大解釋。但規範畢竟只是一種理想，且士人對守節的看法並不是那麼一致。我們很難斷言這些與貞節相關的價值觀造成多深的影響，但我們可以從很多史料中看到：守節與否，女性其實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權。甚至女性為何不能單獨處理家務，而必須另外找個男性配偶進到原生家庭？其背後原因為何？這些是值得深究的。

本文以《名公書判清明集》為主要史料，探討宋代接腳夫與家庭經濟的關係。¹

1 [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遼金元史研究室點校，《名公書判清明集》，楊一凡、徐立志主編，《歷代判例判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二、 研究回顧

對於宋代接腳夫與財產權的關聯性，已有相當研究。包括游惠遠、伊佩霞（Patricia Ebrey）、滋賀秀三等學者，皆在著作中論及接腳夫的現象。

游惠遠從「附於夫亡無子的妻子財產權」來討論接腳夫。她認為，接腳夫是「婦人於丈夫死亡後所招的男性同居人」，沒有正式的婚姻關係，只是代寡婦主持家計。所以寡婦仍為亡夫的族人，可以繼續保有夫產直到改嫁或死亡。²

伊佩霞則是從再婚的角度討論招夫行為，並將之描述為「將後夫接到前夫家，種前夫的田，養前夫的子女」。她認為此類行為在相對貧困的社會中較為常見，因為家庭勞動力的失去，可能會影響整個家庭的經濟來源。她發現：寡婦的公婆常會為了自身的晚年，而替媳婦招夫。作為富寡的接腳夫，也對男性本身有現實上的好處。³

滋賀秀三對接腳夫及財產權的研究最為深入，除了對「接腳夫」一詞有明確的定義，亦整理與接腳夫財產權相關的法令。他認為：接腳夫是「寡婦再婚並以接腳夫之名將後夫招入前夫家之對象」，是對有財產但無勞動力家庭的一種寬容。若亡夫家仍有未分產的兄弟，代表該家庭仍有勞動力，此時招夫便不被接受。

2 游惠遠，《宋代民婦的角色與地位》（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8）。

3 伊佩霞著，胡志宏譯，《內闈——宋代婦女的婚姻和生活》（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譯自：Patricia Ebrey, *The Inner Quarters: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4 吳倩宇

在財產的相關法律上，也有特別的規定。後夫只能經營前夫的財產，後夫之子亦不能繼承前夫的財產。但因為前夫財產可能經後夫經營而增加，爭產糾紛便由是而生。以上三位學者對銜接腳夫的研究有相當啟發，但對於重財婚仍少提及。⁴

本文欲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做進一步的史料分析。

三、 宋代法律與士人對「守節」的看法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⁵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⁶

夫屬男、屬陽，屬乾卦；妻屬女、屬陰，屬坤卦。《儀禮》或基於《周易》乾坤、陰陽的觀念，認為「夫者天也」；⁷ 其並延伸出「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之觀念。⁸《禮記》亦有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⁹ 一生只經歷一段婚姻、從一而終的行為，被認為是女性一生所應該企求的目標，是在婚姻關

4 滋賀秀三著，張建國等譯，《中國家族法原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頁499，譯自：滋賀秀三，《中國家族法の原理》（東京：創文社，1967）。

5 [魏]王弼注，《周易·象傳·乾》（四部叢刊景宋本），頁5。

6 [魏]王弼注，《周易·象傳·坤》，頁13。

7 《儀禮·喪服》：「為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參見：[漢]鄭玄注，《儀禮·喪服》（四部叢刊景明徐式翻宋刻本），卷11，頁8。

8 [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列女傳》，曹世叔妻條，見：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84，頁2790。

9 [漢]鄭玄注，[清]阮元審定，[清]盧宣旬校，《禮記·郊特牲》（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年據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刊本），頁506-1。

係中的最高理想，成為女子教育傳授的核心觀念。但以上所述，都是儒家脈絡下的價值觀；事實上存在著不同看法，如管子就提倡女子再嫁，且以經濟補助鼓勵這樣的行為。¹⁰ 學者張彬村認為「從先秦到宋代，中國的寡婦通常會再嫁，守節不嫁只是少數的例外。」¹¹

士人的看法對社會有多大影響？其實不太一定。雖說「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¹² 但僅以此認定宋朝為對婦女禁錮由寬轉嚴的時代，恐怕說服力不足。這種道德性的訴求，能做到者幾希？生理是低層次需求，卻也是推動人們行動的強大動力。假若沒有獨立自主的經濟能力，又沒有家族或政府協助，在維持生活基本需要都有問題時，其實很難顧及高層次的「道德上的自我實踐」。¹³ 再者，當時提倡婦女守節者，以士大夫階層為主。不過士大夫之間對此事尚未形成共識，並未擬出任何一套具體的規範或制度。¹⁴ 許多學者的研究也指出，二程名言對兩宋的貞節觀並未形成巨大影響。¹⁵ 雖然程朱理學的發展可能是中國貞節觀由寬轉嚴的關鍵時期，但並不意味宋代婦女的地位就此急轉直下，且程朱理學到南

10 《管子·入國》曾提到：「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合獨。」見：〔春秋戰國〕管仲著，〔唐〕房玄齡注，《管子》（上海景常熟羅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頁107。

11 張彬村，〈明清時代寡婦守節的風氣——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的問題〉，《新史學》10卷2期（1999，臺北），頁29。

12 〔宋〕程顥，《二程全書·遺書》（同治求我齋叢書），卷22下，頁4。

13 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Maslow's hierarchy of needs)：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會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參考：A. H. Maslow,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50 (1943):370-396.

14 游惠遠，《宋代民婦的角色與地位》，頁20。

15 參見：張邦煒，〈宋代婦女再嫁問題探討〉，《宋代婚姻家族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頁169-176；賈貴榮，〈宋代婦女地位與二程貞節觀的產生〉，《山東社會科學》3期（1992，濟南），頁68-71。

6 吳倩宇

宋中末期，都還不是官方哲學及主要統治思想。宋代婦女在婚姻的締結和解除上，都保有一定的自主權，寡婦再嫁也相當普遍。另外，二程貞節觀不只要求女性守貞，也要求男性對婚姻專一，是兩性雙向的道德約束，並非單方面地限制女性的婚姻及性自由。

事實上，宋代法律是允許婦女改嫁的。¹⁶張邦煒〈宋代婦女再嫁問題探討〉一文，根據《夷堅志》中相關史料的統計，發現宋代婦女再嫁者仍不少，尤以南宋為多，並認為宋代婦女守節者勢必較明清時期少。¹⁷

另外，由米芾對「婦義」的定義：

婦義，謂感翁姑之恩、夫之義。夫沒不改嫁，不招接腳夫，只事翁婆，如夫在。¹⁸

可以看出，婦女的第二次婚姻，除了再婚，亦可選擇招接腳夫。可見在當時，招夫行為已是平常的社會現象。雖然政府褒獎守節的寡婦，¹⁹但並未如明清時期走向激烈化和極端化。袁采也曾討論婦女再嫁：

寡婦再嫁，或有孤女年未及嫁，如內外親戚有高義者，寧若

16 《宋刑統》僅禁止婦女居喪改嫁、強迫改嫁、背夫改嫁或是嫁娶有夫之婦，並無禁止婦女改嫁。參考：張邦煒，《宋代婚姻家族史論》。

17 張邦煒，〈宋代婦女再嫁問題探討〉，《宋代婚姻家族史論》，頁151-155。

18 [宋]米芾，〈六順曉示〉，《寶晉英光集》（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8，頁9。

19 「右是人間六順之事，能感召時和、歲豐人壽、長家道富子孫，多或遇朝廷恩赦，則當給賜粟帛，或免身役，旌表門閭。」參見：[宋]米芾，〈六順曉示〉，《寶晉英光集》，卷8，頁9。

與之議親，使鞠養於舅姑之家，俟其長而成親。若隨母而歸義父之家，則嫌疑之間，多不自明。²⁰

程頤本身亦曾主持甥女的再嫁：

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己為義，人以為難。²¹

雖然並非所有人都同意再婚，但就連程頤都會根據實際情況折衷自身觀點，由此可見，更多人是以前層面為考量，替婦女設想。士大夫的道德理想，若要真正落實於社會，必須依據現實環境的考量。而婦女選擇守節或再嫁，也不單純是因為理學的影響，而是社會、法律、經濟等等力量相互影響的結果。離婚再嫁於當時似乎不是一件值得大肆批評的事，我們只能說：夫死守節是一種受到社會稱讚的行為而已。

四、 接腳夫與財產權

在法有接腳夫，蓋為夫亡子幼，無人主家設也。²²

接腳夫，為以異姓繼寡婦者。²³

20 [宋] 袁采，〈孤女宜早議親〉，《袁氏世範》（合肥：黃山書社，2008），上卷，頁 22。

21 [宋] 朱熹著，呂祖謙編纂，〈家道〉，《近思錄集釋》（長沙：嶽麓書社，2010），卷 6，頁 6。

22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遼金元史研究室點校，〈已出嫁母賣其子物業〉，《名公書判清明集》，卷 9，頁 257-258。

23 [元] 徐元瑞著，〈親姻〉，《史學指南》，卷 5，收入：楊訥點校，《史學指南（外三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頁 91。

8 吳倩宇

可能自唐末即有接腳夫。「接腳」一詞最早出現於《舊唐書》，²⁴指「選人冒死人之名應選」。²⁵「接腳夫」一詞，頗有自此延伸而來的味道，且相當具象地表達了寡婦前夫與後夫之間的關係。根據《名公書判清明集》及《吏學指南》，接腳夫是婦人於丈夫死亡後，自外招來共同主持家計的男性同居人。當實際生活失去了依靠，自己又沒有求生能力時，這些因家貧無法生存、打算改嫁的寡婦，可能會因為無法拋下年邁的公婆及幼小的子女，而招一位男子到前夫家，與其結為夫妻。這是一種為拯救家庭勞動力喪失而造成生計困難的家庭，迫於無奈的折衷方式，其中有「招夫依靠」、「招夫養老」、「招夫養子」或「坐產招夫」等等形式。²⁶這裡所要討論的，是「坐擁前夫遺產並招後夫協助管理」的「坐產招夫」。

婦人夫在日，已與兄弟伯叔分居，各立戶籍之後，夫亡。本夫無親的子孫及有分骨肉，只有妻在者，召到後夫，同共供輸，其前夫庄田且任本妻為主，即不得改立後夫戶名，候妻亡，其庄田作戶絕施行。²⁷

只有缺少勞動力的家庭才可以招接腳夫。因此，若亡夫與其兄弟未分家，或是已不缺少維繫家庭生活必要的勞動力，寡婦是不能招接腳夫的，甚至會被判定為「再嫁」而非「招夫」。因此

24 《舊唐書·列傳·韋陟》：「常病選人冒名接腳……正調者被擠，偽集者冒進。」。此處所稱「最早」，是以《中研院漢籍電子全文資料庫》檢索而得。參見：中研院漢籍電子全文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檢索日期：2013年1月7日）。

25 漢典，<http://www.zdic.net>（檢索日期：2013年1月7日）。

26 滋賀秀三著，張建國等譯，《中國家族法原理》，頁499。

27 [清]徐松輯，〈民塵雜錄〉，《宋會要輯稿·食貨志》（北平圖書館影印原稿本影印），卷58-61，頁5902。

有寡婦和亡夫兄弟或繼子爭產的事例：

今已改嫁劉有光，遂以接腳為名，鵲巢鳩居，豈能免魏景謨等之詞乎？……魏景宣非無子孫，且其屋係同居親共分，法不應招接腳夫。……趙氏改嫁，於義已絕，不能更占前夫屋業……趙氏不應占魏景宣前妻之業，合還其親男魏汝楫管佃。²⁸

徐氏今不能守志，而自出嫁與陳嘉謀，則是不為陳師言之妻矣。不為陳師言之妻，則是不為紹祖兄弟之母矣。既非其人之妻，又非其人之母，而輒欲賣其家之業，則其子之不孝，可乎？在法有接腳夫，蓋為夫亡子幼，無人主家設也。今陳氏三子年幾三十，各能主家，亦何用陳嘉謀為哉？徐氏於子壯年事陳嘉謀，是嫁之也，非接腳也。安得據人之屋，賣人之業，豈是有理哉？²⁹

根據宋代法律，若夫死而有子嗣，財產名義上為兒子所有，寡婦則作為兒子長大前的財產管理者。若無子嗣，則寡婦有立嗣權，可以用過繼或收養的方式為夫家立嗣。³⁰ 但若寡婦改嫁，便不再是前夫的族人，也就喪失任何管理前夫財產的權利。而「改嫁」與「招接腳夫」之別，在於前者不能承分任何前夫財產，即所謂的「朝嫁則暮義絕」；後者則因未改適人，仍為亡夫族人，依然

28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遼金元史研究室點校，〈已嫁妻欲據前夫屋業〉，《名公書判清明集》，卷9，頁307-310。

29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遼金元史研究室點校，〈已出嫁母賣其子物業〉，《名公書判清明集》，卷9，頁257-258。

30 參考：方儷璇，〈從《名公書判清明集》看宋代婦女的婚姻生活〉，收入宋代官箴研讀會編《宋代社會與法律——《名公書判清明集》討論》（臺北：東大，2001），頁102-103。

有權保有夫產直到改嫁或死亡。以接腳夫的立場而言，若寡婦無子嗣，不須接腳夫負共同撫養之責，則接腳夫對寡婦家產只有使用權而沒有所有權。簡而言之，接腳夫只能管理或經營前夫的財產，而不能將之納入自己的名下。而接腳夫的子嗣，無論是否與該寡婦所生，皆不能繼承財產。

但若是後夫經營有成，寡婦的家產便會增值。這些增值的部分，便是後夫和其子嗣可以自由運用的部分。而當這些增值遠大過原本的家產時，便會產生後夫之子與前夫之子爭產的狀況。

五、接腳夫與重財婚

納接腳夫，簡而言之，就是把新丈夫接到前夫和自己的家，種前夫的田，養前夫的子女。³¹ 但是，把一個外姓男子接到前夫家中，前夫的母親難道不會心生埋怨嗎？《名公書判清明集》與《夷堅志》，有著這樣的案例：

丘輔之曾祖名紹，娶阿張為妻。紹存日生二女，名四二娘、四四娘，遺腹生一男，名繼祖。是時阿張奉姑阿葉命，納胡喆為接腳夫，撫養孤幼。³²

都昌婦吳氏，為王乙妻，無子寡居，而事姑盡孝。姑老且病目，憐吳孤貧，欲為招婿接腳，因以為義兒。吳泣告曰：「女不事二夫，新婦自能供奉，勿為此說。」³³

31 伊佩霞，《內闈——宋代婦女的婚姻和生活》，頁185。

32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遼金元史研究室點校，〈爭田業〉，《名公書判清明集》，卷6，頁154-155。

33 [宋]洪邁，〈都昌吳孝婦〉，《夷堅志補》，收入：《筆記小說大觀》（臺北：新興，1975），卷1，頁5。

以上為兩篇前夫母親要求兒媳婦納接腳夫之史料。我們可以發現，婆婆非但沒有要求兒媳婦守節，反而要她納接腳夫。而再觀看其納接腳夫的理由，更可以得出以下原因。第一，這戶人家需要男丁。宋代「不立田制，不抑兼併」，土地兼併情況嚴重，很多下層家庭沒有能力納稅，只能由自耕農轉為佃農。如果一位佃農死了，他的地主可以因為他的妻小沒有能力耕田納租而趕走他們。若這時，這位寡婦有了新丈夫，亦即多了一位男丁，這戶人家就可能有能力繳納租稅。每個家戶有無可勞動者，對他們日後能否有穩定的經濟收入，影響甚大。這兩段史料中的男子可能皆為家中獨子。婆婆不希望兒媳婦改嫁，拋下孤幼造成自己的負擔，又希望她可以照顧自己終老，卻擔心她可能沒有能力獨自撫養，所以希望找一位男子到家中「幫忙」。

另外，人的需求確實有層次之別。家有恆產的寡婦親持家計本已不太容易，家無恆產者更是困難。在無法維持生計的情況下，即使宋儒強調貞節，他們亦主張以實際需求作為優先考量。³⁴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節婦」並非一個強烈、束縛的基本要求，女子對守節與否其實有相當的自主權，納接腳夫也似乎稀鬆平常。

為什麼一個家庭一定要有一名男性呢？很多例子說明了女性如何主持家中經濟、撫育兒女，其治理家業的能力是無庸置疑的，她們也確實在夫亡後擔起家中家長的角色。但除非寡婦有著超人的意志力及能力，能完全獨立經營家業並且有成，否則若一個家庭沒有男性家長，似乎依然會受到種種困難及限制。中國婦女的

34 張彬村，〈明清時期寡婦守節的風氣—理性選擇 (rational choice) 的問題〉，《新史學》10 卷 2 期，頁 59。

12 吳倩宇

生命意義是附屬於夫家之下的，她們所做的一切，或說道德標準要求她們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夫家的利益為優先考量，包括招夫行為。

再論接腳夫與宋代重財婚的關係。宋代商業發達，不免帶動社會上的重財風氣，使人們追求財富，甚至造成婚姻關係與現實利益的密切關聯。蔡襄與司馬光，皆對此作出了批評：

婚娶何謂？欲以傳嗣，豈為財也。觀今之俗，娶其妻不顧門戶，直求資財，隨其貧富。³⁵

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³⁶

由上述二人的批評，可以知道當時社會將婚姻一事「商品化」的陋習。直到南宋的士人群體，仍有這樣的現象：

近年進士登科，娶妻論財，全乖禮義。衣冠之家，隨所厚薄，則遣媒妁往返，甚於乞丐，小不如意，棄而之它；市井駟儉，出捐千金，則貿貿然而來，安以就之。³⁷

而我們可以說，接腳夫是重財婚的表現形式之一。成為接腳

35 [宋] 蔡襄，〈福州五戒文〉，《端明集》，卷34，頁8。參考與轉引自：方儷璇，〈從《名公書判清明集》看宋代婦女的婚姻生活〉，收入：宋代官箴研讀會編，《宋代社會與法律——《名公書判清明集》討論》，頁102-103。

36 [宋] 司馬光著，〈親迎〉，《司馬氏書儀》（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卷3，頁33。

37 [宋] 呂祖謙編，〈請禁絕登科進士論財娶妻〉，《皇朝文鑑》（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據常熟瞿氏藏宋本），卷61，頁697。

夫，或為了生存、或為了完成娶妻留嗣的人生大事。

焦生，不知何許人，客於洛陽，久之……有同里民姓劉，家亦豐實，姓劉者忽暴亡，有二女一男，長者才十餘歲。劉之妻，以租稅且重，會無所依，夫即葬，村人不知禮教，欲納一人為夫，俚語謂之接腳。村之豪儒，以焦生愧然，命媒氏於劉之妻言之。劉妻知焦生於州縣熟，許之。未半歲，納之為夫。焦久貧悴，一旦得劉之活業，幾為富家翁，自以為平生之大遇也。³⁸

上述史料中，為焦生和寡婦婚姻牽線的，是村中的豪儒。寡婦在前夫死亡不到半年，便納焦生為接腳夫。焦生因為做了劉家寡婦的接腳夫，自此擁有富裕的生活，竟也感到自豪，絲毫不因婚配對象及招夫身分而有任何負面情緒。此事發生於洛陽，是士人聚集、城市發達的區域，社會的思想或較其他邊遠地區開放，也較具該時代的代表性。雖有士人批評他們「不知禮教」，但似乎也僅止於批評而已。納接腳夫在當時，應該不是一件要不得的事。而這段史料代表「坐產招夫」的招夫形式。劉家寡婦以豐厚家財招到貧困單身男子，進入其夫家成為替補的勞動力。

「坐產招夫」這樣的表現形式，適用於擁有耕地權或是財產的寡婦。倒不是寡婦以此吸引男性成為其接腳夫，而是男性選擇擁有這樣條件的寡婦為其妻：既不需支付聘禮費用，又可以坐享其前夫之成。

38 [宋]張齊賢，〈焦生見亡妻〉，《洛陽緝紳舊聞記》（清知不足齋叢書本），卷5。

六、結語

南宋的守節觀念，並未對寡婦招夫造成顯著的影響。因為士人之間對此事尚未達成共識，也沒有法律或規範禁止這項行為。關於南宋寡婦對夫家財產的支配權，只要她們不改嫁，繼續留在夫家扮演「母親」的角色，還是可以繼續保有夫產的使用權直到逝世，即使擁有同居人也沒關係。以寡婦的家庭來說，招接腳夫的最大目的，莫過於遞補因前夫死亡所失去的家庭勞動力。招夫只是招來一個幫手，並不是另立家庭中的主人。然而，就接腳夫而言，他們到寡婦家的最主要原因，多半是為了寡婦的家產。

雖然尚未找到足以相佐證的史料，但我們或許可以較大膽地假設，宋代士人反對招夫行為的原因，除了所謂「專心守節」的價值觀以外，應還包括因招夫而引起的種種財產問題。我們很難排除接腳夫對寡婦家產的目的，而在史料中也確實看到很多為了財產對簿公堂的實例。有接腳夫任意揮霍寡婦家業者、³⁹ 有前夫之子與後夫之子相爭田產者、⁴⁰ 有因為招夫而產生的立嗣問題，⁴¹ 有後夫之子是否應奉養寡婦的問題……⁴² 等等。《袁氏世範》亦提到：

娶妻而有前夫之子，接腳夫而有前妻之子，欲撫養不欲撫

-
- 39 《朱子語類》：「昔為浙東倉時，紹興有繼母，與夫之表弟通，遂為接腳夫。擅用其家業，恣意破蕩。其子不甘，來訴。初以其名分不便，卻之，後趕至數十里外。其情甚切，遂與受理。」引自：[宋]黎靖德編，〈外任·浙東〉，《朱子語類》，卷106，頁2643。
- 40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遼金元史研究室點校，〈爭田業〉，《名公書判清明集》，卷6，153-156。
- 41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遼金元史研究室點校，〈夫亡而有養子不得謂之戶絕〉，《名公書判清明集》，卷8，236-238。
- 42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遼金元史研究室點校，〈背母無狀〉，《名公書判清明集》，卷8，255。

養，尤不可不早定，以息他日之爭。……當質之於眾、明之於官，以絕爭端。⁴³

由是觀之，接腳夫與寡婦前夫家之間的爭執，是一項眾所周知而且相當棘手的問題。而這些爭端所造成的社會衝突，其實都是可以避免的。故士人或許亦基於這樣的立場而傾向反對「坐產招夫」的行為。

最後，若從墓誌銘的紀錄來看寡婦再嫁的數量，其實不一定準確。雖說夫死守節於宋代並非必要，但若當時士人的道德標準傾向於守節，他們不一定願意直接寫出寡婦再嫁的事實。再嫁寡婦的真實數量，可能較所記載為多。

43 [宋]袁采，〈收養義子當絕爭端〉，收入：王雲五主編，《袁氏世範》《四庫全書珍本別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據清知不足齋叢書本），上卷，頁 22-23。

徵引書目

史料

- 〔春秋戰國〕管仲著，〔唐〕房玄齡注，《管子》，上海：景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宋刊本。
- 〔漢〕鄭玄注，《儀禮》，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景明徐式翻宋刻本。
- 〔漢〕鄭玄注，〔清〕阮元審定，〔清〕盧宣旬校，《禮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清嘉慶二十年南昌府學刊本。
- 〔魏〕王弼注，《周易》，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景宋本。
- 〔劉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楊家駱主編，《新校本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臺北：鼎文書局，1981。
- 〔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遼金元史研究室點校，《名公書判清明集》，楊一凡、徐立志主編，《歷代判例判牘》（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 〔宋〕司馬光著，《司馬氏書儀》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 〔宋〕呂祖謙編，《皇朝文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7。
- 〔宋〕米芾，《寶晉英光集》，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朱熹著，呂祖謙編纂，《近思錄集釋》，長沙：嶽麓書社，2010。
- 〔宋〕袁采，《袁氏世範》，合肥：黃山書社，2008。
- 〔宋〕袁采，《袁氏世範》，收入：王雲五主編，《袁氏世範》，《四庫全書珍本別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 據清知不足齋叢書本。
- 〔宋〕洪邁，《夷堅志》，清十萬卷樓叢書本。
- 〔宋〕程顥，《二程全書》，同治求我齋叢書。
- 〔宋〕張齊賢，《洛陽緝紳舊聞記》，清知不足齋叢書本。
- 〔元〕徐元瑞著，《吏學指南》，收入：楊訥點校，《吏學指南（外三種）》，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平圖書館影印原稿本影印。

期刊論文

- 張邦煒，〈宋代婦女再嫁問題探討〉，《宋代婚姻家族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張彬村，〈明清時代寡婦守節的風氣——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的問題〉，《新史學》，10卷2期，1999，臺北，頁29-76。
- 賈貴榮，〈宋代婦女地位與二程貞節觀的產生〉，《山東社會科學》，3期，1992，濟南，頁68-71。
- A. H. Maslow. "A Theory of Human Motiva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50 (1943): 370-396.

專書

- 宋代官箴研讀會編，《宋代社會與法律——《名公書判清明集》討論》，臺北：東大，2001。
- 伊佩霞著，胡志宏譯，《內闈——宋代婦女的婚姻和生活》，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譯自：Patricia Ebrey, *The Inner Quarters: Marriage and the Lives of Chinese Women in the Sung Period*,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 滋賀秀三著，張建國等譯，《中國家族法原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譯自：滋賀秀三，《中国家族法の原理》，東京：創文社，1967。
- 游惠遠，《宋代民婦的角色與地位》，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98。

數位資源

- 中央研究院編漢籍電子全文資料庫，<http://hanchi.ihp.sinica.edu.tw/>。
- 漢典，<http://www.zdic.net>。

Zuochanzhaofu :
A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iejiaofu* and
Zhongcaihun

Chien-Yu Wu*

Previous studies have described that the scholars of the Song Dynasty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chastity among widowed women. Therefore, women in that era did not possess substantial subjectivity regarding their identities and assets. However, this argument is contradictory to the fact that women had to seek a “*jiejiaofu*”, or second husband, to maintain a sufficient household labor force. What options were chosen by women in the Song Dynasty torn between the culture of widow chastity and labor demands? How were the widow’s assets allocated after remarrying someone with a different last name? How did Song Dynasty scholars contemplate this difficult contradiction?

Based on the *Ming gong shu pan qing ming ji* and other historical records,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d the prevalence of seeking a second husband and determined that relevant arguments involving female chastity had not reached a consensus or formed a norm during Song Dynasty society. In addition, the Cheng-Zhu school did not exhibit a considerable influence on seeking a second husband. Nonetheless, widow chastity was celebrated by society. However, the popularity of fiscal remarriage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was beneficial for both widows and their remarriage partners.

Keywords:

Jiejiaofu (接腳夫, men who marry widows) *Zuochanzhaofu* (坐產招夫, widow who seeks new partner using inheritance from late husband) *Zhongcaihun* (重財婚, fiscal marriage) property rights *Ming gong shu pan qing ming ji* (名公書判清明集, Collection of just verdicts by famous judges)

* under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從《御纂朱子全書》看清代前期 官方意識形態與士風的形塑*

施厚羽**

本文以清聖祖《御纂朱子全書》為核心，討論清前期皇帝欲宣傳的政治、文化意識形態，以及該書頒布後，地方官員的推行與士人的收受。文章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從清代初期程朱理學與政治、文化政策的關係著手。第二部分述說殿本書籍印刷出版文化，梳理這部書編纂、刻印的相關脈絡。第三部分針對聖祖御製序文分析主導者的心態，並以高宗的上諭及地方大吏奏章說明流佈情形，使用地方學校所藏和文集集中的討論，說明參與形塑意識形態的不只統治者，也包括一般士人。時間上以康熙朝和乾隆朝為主，但部分內容亦涉及清代中葉以後的情形。

關鍵字：聖祖 高宗 御纂朱子全書 意識形態 書籍文化

2014 年 2 月收稿，2014 年 5 月通過刊登。

* 致謝辭：拙文原為 2013 年修習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陳熙遠老師開設之「明清檔案與歷史研究」期末課程報告。撰寫期間承蒙陳老師與諸位師長、學長姐賜予寶貴意見，讓文章得以順利完成。報告繳交後，深知文章尚有訛誤與不足之處，然而未得暇修訂，只能暫且擱置。逢此次投稿機會增修文章，修訂期間亦獲兩位匿名審查人指正賜教，筆者受惠良多，於此誠摯感謝。然因筆者學識淺薄，文中或仍不乏粗疏錯漏之處，凡此皆由本人負責。

**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98 級生

- 一、 前言
- 二、 清代前期的理學與文化政策
- 三、 《御纂朱子全書》的編纂過程與篇目次序
- 四、 《御纂朱子全書》的版本
- 五、 聖祖諭製序文中的官方意識形態
- 六、 乾隆年間頒發書籍上諭所見之目的
- 七、 地方收藏、閱讀御纂書籍的情況
- 八、 結語

一、 前言

清代官方學術以程朱理學為宗，聖祖（1654-1722，1662-1722 在位）、世宗（1678-1735，1723-1735 在位）、高宗（1711-1799，1736-1795 在位）皆以致力編纂、刊刻各類書籍著稱。從中央政府主導的典籍編纂工程中，可以看到政府藉此操作文化、學術潮流的用心。清代官方編纂的書籍眾多、規模浩大，就前期內府刊刻書而言，以儒家經典和正史類數量居冠，子、集、佛教書籍次之。¹ 本文將以清聖祖主導編纂的《御纂朱子全書》為主，討論清代前期政治意識形態與印刷文化。

當然，御纂書籍種類眾多，選擇《朱子全書》是因為它的誕生與清初官方學術潮流密切相關。雖然本文聚焦在單一部書，但希望能以此書為起始點，觀察以理學思想為主要內容的御纂書籍中，所呈現皇帝與地方士人之間的互動。皇帝期盼透過刻印書籍，

¹ 吳哲夫，〈清代殿本圖書〉，《故宮文物月刊》3卷4期（1983，臺北），頁132-137。

賦予士人何種價值觀？士人又是怎麼看待這類書籍？以及我們是否能從盛清時期御纂書籍的出版、流通，研究這類文化工程對士人的影響？

本文將分成三大部分，主要史料《御纂朱子全書》採用《欽定四庫全書》所收錄的版本。而其餘運用的史料包括上諭、奏摺，以及各個地方志中學校的書籍板片清單、清人文集等。文章結構方面，第一部分首先略述理學在清代前期的發展，接著在第二部分說明編纂的過程、篇章次序的擬定。在第三部分又分為兩個區塊。首先談的是康熙皇帝的編纂目的，不過該書明顯的影響則開始出現在乾隆朝，所以後文還會往下延伸到乾隆皇帝的想法。在材料方面，聖祖的部分將以〈御纂朱子全書序〉為中心，搭配該書編纂過程中的相關材料。高宗則使用頒行書籍的上諭，以此討論兩者背後的政治思維。後半段將會說明地方士人如何使用、看待御纂書籍，主要又分成三個面向：地方機構的收藏、書籍在地方的功能，以及士人的評價。因為牽涉到在地方上的影響，所以時代會稍下涉乾隆、嘉慶朝（1796-1820）。這部分的重點將放在：御纂書籍頒佈到地方（主要是學校）以及賞賜給臣下之後，地方士人如何接納？

二、 清代前期的理學與文化政策

清初程朱理學受到官方推重、發展蓬勃，儒者如熊賜履（1635-1709）、李光地（1642-1718）、湯斌（1627-1687）等人皆於康熙朝仕宦，位至高顯。其中熊、李二人更是受命修纂《朱子全書》等多部理學書籍的負責人，因此有必要稍微處理清初理學的發展脈絡。

程朱一派於清初慢慢佔據思想界主流，與明清鼎革造成士大夫極大的衝擊密切相關。清初士人關於明亡的反省論說是個大課題，這裡只稍指出幾個顯著的潮流。在思想方面，基本上歸咎王學末流形成的空疏學風，是以清初的學術風尚開始返回重實踐、輕玄虛的道路。此時的儒者大多強調篤實學習的功夫，回歸倫理、禮儀的規範化社會。²同時由明末以來回歸經典、開啟重視經學的暗流在清初浮現，而其所展開的篤實學風可謂清初多數士人的共同追求。進一步來說，在明清易代的政治環境影響下，清代前期的理學是以居敬窮理為核心，並強調以修齊治平為實踐的。³並且理學派還懷抱著重整文化秩序的企圖，同時希望以外王為己任，所以他們試圖結合文化與政治兩個場域。然而從清代前期的政治文化氛圍來看，其結果反倒解除了傳統儒家站在道統角度上批判治統權威的功能，因為他們的做法促使道統和治統的最高權威同時匯聚於皇帝一人。⁴

皇帝作為道統和治統結合的論述從清聖祖開始，雖然自順治朝（1644-1661）起就有隱含推重儒家的風向，不過從康熙帝即位到親政前此風略挫，而後經由早年的經筵講官熊賜履等人的潛移默化，青年皇帝的思想逐漸傾向程朱一脈。成年後的聖祖夙慕程朱理學，且盡心研讀宋儒著作，認為「周程張朱諸子之書，雖主於明道，不尚辭華，而其著作，體裁簡要，晰理精深，何嘗不文

2 詳細討論可參閱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2013），其中第一章〈清初思想中形上玄遠之學的沒落〉以及第二章〈清初「禮治社會」思想的形成〉與本文最為相關，見該書頁1-87。

3 史革新，《清代以來的學術與思想論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頁70-74。

4 參見黃進興，〈清初政權意識形態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統觀〉，收於氏著，《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臺北：允晨文化，1994），頁87-124。

質燦然，令人神解意釋」。⁵ 宗室昭槿（1766-1829）喜愛文史、熟知國故，在著作《嘯亭雜錄》中非常精闢地指出了康熙時期鼓勵朱子之學的努力及其燦然成效：

仁皇夙好程、朱，深談性理，所著《幾暇餘編》，其窮理盡性處，雖夙儒者學，莫能窺測。所任李文貞光地、湯文正斌等皆理學者儒。嘗出《理學真偽論》以試詞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書》等書，特命朱子配祠十哲之列。故當時宋學昌明，世多醇儒者學，風俗醇厚，非後所能及也。⁶

從引文來看，聖祖推重朱子可分為幾個面向。可歸屬於道統的部分包括他個人學問上的鑽研、刊行理學的著作；接近治統的部分則為任用以理學聞名的時儒、以朱子配祀孔廟。對當時很多士人而言，道統與治統在康熙皇帝身上完美地融鑄，代表了皇權同時掌握了政治和文化的權威。康熙帝所具備的內聖外王的聖君形象，不僅是程朱學派這麼認定，連陸王一派也無法否認。⁷ 只是聖祖自身雖心慕程朱，但並未刻意壓制陸王學派。而本人雖然極為推尊朱熹，倒也不盡然是完全為了控制思想。楊菁指出，程朱的「理」已有批判權威的成分，且康熙中期以後政權根基已穩固，似乎沒有必要積極壓抑讀書人思想。⁸ 故康熙帝的作為主要還是在於個人的自戒自惕，並且在自己身體力行的同時，也希望臣子能以朱子教誨為自課，共同達到治道的境界。可以說越到了晚年，

5 〔清〕《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4），卷120，頁1609-1610。

6 〔清〕昭槿，何英芳點校，〈崇理學〉，《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1，頁6。

7 參見黃進興，〈清初政權意識形態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統觀〉，頁87-124。

8 參見黃進興，〈清初政權意識形態之探究：政治化的道統觀〉，頁87-124。

聖祖更將理學視為實踐倫理道德的方式，包括《御纂朱子全書》、《御纂性理精義》等的御纂理學書籍大量刊行，皆由此故。

三、《御纂朱子全書》的編纂過程與篇目次序

前面非常簡單地敘述了清初理學的發展，和聖祖對程朱之學的景仰，本小節將回到《御纂朱子全書》本身。全書總共有 66 卷，⁹ 由熊賜履、李光地等人奉命修書，並於康熙 52 年刊刻告竣，¹⁰ 隔年頒布海內外，依例於每省頒發四部，¹¹ 且准民間刊印流傳。至於為何命名為《朱子全書》？李光地指出這部書「關係甚大」¹²，這個「全」字代表此書包納朱子思想之全部精華，悉錄其微言大義，故特命名為「朱子全書」。正如康熙 52 年 5 月 19 日武英殿總監造和素（1652-1718）、李國屏（生卒年不詳）奏共得《朱子全書》八篇的硃批中，康熙帝點出了這部書的特質：

此書不可比於別書，其性、理、禮彙為一體。此刻板不清，字粗糙及舛誤之處，八篇內即如此矣，再多時又將如何？和

- 9 關於卷數，在李光地〈請發朱子全書磨對劄子〉中通計為 82 卷，見〔清〕李光地，《榕村全集》（臺北：力行出版社，1969），卷 28，頁 1304。而在〈進校完朱子全書劄子〉中提到該書共 83 卷 55 冊八套，參見：前引書，卷 28，頁 1406。
- 10 康熙 52 年 9 月「上諭大學士李光地曰：朱子全書、四書註解，刊刻告竣，可速頒行。」見於《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 256，頁 3419。
- 11 康熙 54 年 9 月 20 日李國屏奏，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 1057-1058。
- 12 此語見於和素、李國屏 5 月 25 日的奏摺，李光地說「此舛錯緣由，我另行具奏。此書關係甚大，嗣後凡刻完之書，告知我已奏薦之翰林張起麟、徐用錫、舉人成文，送我閱看。」見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頁 855。

素爾糊里糊塗，甚不能為事，嗣後若復如此苟且，斷然不可。此書及此摺內批示之處，一併交大學士李光地閱看。¹³

御纂的理學書籍，聖祖向來都交付大學士編纂，基本上未專門委任武英殿的官員，這部書亦非例外，並非和素過於糊塗。但硃批昭示《朱子全書》的重要性在於，這部書鑄了性、理、禮三者，故在皇帝心中特為重要。可注意的是，硃批除了指出「性」、「理」之外，「禮」的角色也被納入考量。此書是如此地重要，所以力求書板清爽、文字精確，編纂更須仔細，而這也是交由嫻熟理學的李光地等人主持的原因。而從聖祖與李光地、李光地與熊賜履等人來往的劄子、書信，也可見君臣、儒臣之間，對該書內容、編次多有討論。¹⁴

不過整套書的編纂並不是從零開始，而是建築在前人的成果之上。《御纂朱子全書》以南宋咸淳六年（1270）黎靖德（生卒年不詳）所編《朱子語類》和後人所輯《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為底本，並且「撮取精要，芟削繁文，以類相次，裒為全書，以便學者。」¹⁵因為當時流通的朱熹著作雜冗之處繁多，編纂群認為這樣的現象可能妨礙學者透析朱子真意。同樣地，《四庫全書總

1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頁852。

14 在李光地的《榕村集》中，卷25有〈進朱子全書表〉、卷28可見幾道與康熙討論《朱子全書》編次、刪改條紋的劄子，包括〈覆發示朱子全書目錄及首卷劄子〉、〈進朱子全書首卷并請改定書名劄子〉、〈進朱子全書第三冊并請改祭祀神示目錄劄子〉、〈條奏朱子全書目錄次第劄子〉、〈命移熊賜履朱子全書條目覆奏定劄子〉、〈請發朱子全書磨對劄子〉、〈進校完朱子全書劄子〉、〈覆朱子全書刪節幾條劄子〉，以及卷32有與熊賜履討論的信件〈與孝感熊先生商酌朱子書名目次第書〉。

15 〔宋〕朱熹著，〔清〕李光地、熊賜履編纂，《御纂朱子全書》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凡例〉，頁461。

目提要》評介《朱子全書》的部份也認為：

記載雜出眾手，編次亦不在一時，故或以私意潤色，不免失真；或以臆說託名，全然無據。即確乎得自師說者，其中早年晚歲持論各殊，先後異同，亦多相矛盾。儒者務博，篤信朱子之名，遂不求其端、不訊其末，往往執其一語。奉若六經，而朱子之本旨轉為尊朱子者所淆。¹⁶

將《提要》所言視作康熙本人和編修群的理念應不致相差甚遠。由於世間上流通的版本，無法精確地理解朱熹的思想，而學者們又不深考，導致出現了片斷式的摘取、脫離朱熹原本的想法。所以康熙帝才要重新編修、去蕪存菁、以廣教澤，導正學問。使「尊朱」之所尊，乃是有統緒、有脈絡的朱子，而非僅僅提出朱熹的「名言佳句」，但對其思想卻毫無概念，甚至道聽塗說、理解錯誤。同樣地，其編纂緣由亦可從李光地的劄子〈覆發示朱子全書目錄及首卷劄子〉得到佐證。他寫道：「皇上特命儒臣依仿門目逐類增入，自此朱子談經論道以及講世務評人物之言，披卷粲然，無復遺憾。」¹⁷

在篇目的次序方面，《朱子全書》也有別出心裁的安排。聖祖和李光地針對篇目和內容進行多次討論。例如最初的目錄將「理欲義利君子小人之辨」放在「力行」條之下，但李光地建議「力行」

16 〔清〕永瑤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1965年據乾隆武英殿刻本），卷94，頁1121。

17 〔清〕李光地，〈覆發示朱子全書目錄及首卷劄子〉，《榕村全集》，卷28，頁1388。另外，由本劄以及〈進朱子全書首卷并請改定書名劄子〉可知《朱子全書》已先由部分儒臣先行纂輯，李光地的工作主要建議刪去部分條目，並分析已有內容。

當與「致知」相次。¹⁸不過，聖祖並不是任由李光地添入或刪節內容，例如聖祖曾指示「《朱子全書》已看完，選得皆妥當；惟吾與點也章太多，有可刪者就刪去幾條。」或是交待「李光地說與他仔細想，若於道理無害，就存著，若有啓人疑惑處，就去了」，¹⁹可見李光地可以思考那些內容可否放進書中，但最後的決定權仍然掌握在康熙皇帝手中。

此外，還有幾個例子可以看出編纂群非常在意書中各條目的次序。例如李光地認為讀書之後才能窮理，所以「讀書法」和「讀經史」應該要擺在「致知」而非「力行」之後。²⁰不過從今日的四庫本來看，其建議未被採納。另外，現今所見的目錄於「論學」之後，即接到「四書」、「六經」、「諸儒」、「諸子」、「歷代人物」，這些條目結束後，才是「治道」。但李光地曾經建議，當將「治道」接續在「論學」之後，而「治道」諸目應該以奏疏為首，然後以君道、臣道、養教、兵、刑、用人、理財等目次之。對於此一次序的優點，李光地說明：

則開篇數十卷之中，而內聖外王之道備矣。繼以四書、六經以證明之，又繼以聖賢、諸儒、諸子百家以折衷之，又繼以歷代人物以參考之，似為得先後緩急之序，而使天下後世學者知為學、為治之出於一，不作兩意推求也。²¹

18 〔清〕李光地，〈條奏朱子全書目錄次第劄子〉，《榕村全集》，卷28，頁1397。

19 〔清〕李光地，〈覆朱子全書刪節幾條劄子〉，《榕村全集》，卷28，頁1412-1413。

20 「臣查前進呈目錄內，其讀書法及讀經讀史等題，原在力行教人倫等題之後。臣愚陋淺見，切惟讀書窮理乃一事也，故朱子行宮便殿奏劄有云：『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此朱子告君之定論也，然則讀書法與讀經史諸題，似應與致知相次，不應在力行之後。」

21 〔清〕李光地，〈條奏朱子全書目錄次第劄子〉，《榕村全集》，卷28，頁1396-1397。

李光地的建議看起來非常完善，也顧及了康熙帝懷抱著內聖外王自許的心思。然而對照書成之後通共 19 門的篇目（學、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易、書、詩、春秋、禮、樂、性理、理氣、鬼神、道統、諸子、歷代、治道、論文、賦詞），可見康熙皇帝並未完全採納李光地的看法，而是保持了自己的意見。例如成書後，「致知」和「力行」章仍比「讀書法」優先。除上述的例子之外，《朱子全書》最特殊的地方是，過去「《語類》及《性理大全》諸書篇目，往往以太極、陰陽、理氣神諸類為弁首，頗失下學上達之序」，²² 所以將四書順序調至性理、理氣之前。整體來說，康熙皇帝認為學者必須首先知曉小學蒙養、大學進修的方法，下一階段才能讀四書、六經，再來才是性命、道德、天地、陰陽、鬼神之說，如此貫通才能達聖統王功。²³ 可見這個次序同時也是康熙帝心中為學次序與輕重的反映。

關於書名尚有一可提之處。由於《朱子全書》作為將朱子留下的語句分門別類的「類書」，所以李光地曾經提出將《朱子全書》改名成「類書」之議，但顯然未獲康熙皇帝採納；《四庫全書》也未將這部書歸在類書，而是屬於子部儒家類。²⁴ 這個意見可能代表著，聖祖有著藉這部書來樹立官方意識形態的意圖，而這樣的任務，不是一部以分門別類為主旨的書籍所能負荷的，當然不能以此名之。從篇目次序的安排，完全展現康熙皇帝冀讓讀者建立

22 〔宋〕朱熹著，〔清〕李光地、熊賜履編纂，《御纂朱子全書》，〈凡例〉，頁 462。

23 〔宋〕朱熹著，〔清〕李光地、熊賜履編纂，《御纂朱子全書》，〈凡例〉，頁 462。

24 〈進朱子全書首卷并請改定書名劄子〉建議「御纂之盛意，蓋分別門目以便學者誦習，所以嘉惠天下，後世至明切也。書名應否改為類書，統 聖裁，以光大典，謹具摺奏。」見李光地，《榕村全集》，卷 28，頁 1392。

何種學習方式和道統譜系，同時他欲內聖外王的期望亦昭然若揭。李光地的〈覆發示朱子全書目錄及首卷劄子〉也指出《朱子全書》的規章、用意。他認為是：「聖代表章之聖規，儒林折衷之要典。」²⁵然而書籍要產生作用，也得社會背景與技術條件搭配才有可能。前面從學術背景的角度簡單介紹了清初理學的影響，接下來將會簡單討論技術條件的層面，即清代前期官方印刷出版發展的背景。

四、《御纂朱子全書》的版本

就版本方面來說，據《書目答問匯補》的整理，至少可見康熙 53 年（1714）的武英殿刻黑口本、乾隆 13 年（1748）武英殿刻古香齋袖珍本與貴陽官本、咸豐元年（1851）的墨格精抄進呈袖珍本、咸豐 10 年（1860）的浙江紫霞洲祠堂刻本、同治八年（1870）的四川吳棠刻本、光緒（1875-1908）年間的江西書局刻本等。²⁶總的來說，《朱子全書》在清代前期的版本並不多，由於是官方所刊定的書籍，所以世間流傳的版本基本是從殿本翻刻。在地方學校中，有時候會出現冊數較少的情況，²⁷推測有可能是遺失、損壞，也可能是將原有卷數合併，再經由地方重新刊印，故版面的配置則仍與殿本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清中葉以後才出現私家刻本。但這個結果並不表示在清代前期《朱子全書》的普及度較低，因為我們還是可以從其他角度見到《朱子全書》的影響。不過中期以後的情形並非本文主軸，故出現其他刻本的緣起在此無法詳論。

25 李光地，《榕村全集》，卷 28，頁 1388。

26 〔清〕張之洞撰，來新夏、韋力、李國慶匯補，《書目答問匯補》（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 573。

27 從現有地方志中沒有發現明確寫出卷數有缺的例子，但若比較其他地方志所記載的本數，部分地區如《廣西府志》的本數就少於其他地方。參見附錄的地方學校藏《御纂朱子全書》清單。

若將殿本書籍置於整個清代中國出版文化，並將之與私家刻書相比，可以發現殿本裡屬於前代經史的書籍數量較少，學者就指出殿本的編纂應以當代著作為主。²⁸ 武英殿刻印完成後，除了宮內收藏之外，也會向民間頒布。殿本向宮外流動方式有：頒布中央各部院、地方各級政府、府州縣學、各省著名寺廟，或者成為賞賜給宗室貴族、參加修纂的翰林、各級官員、地方著名學者，或作為外國使臣的禮物。除了從上至下的賜與之外，也准許書坊自行刷印，或者經由省府組織重刻，再交由縣級官府或募集個人捐款刻印。²⁹ 由此觀之，統治者是有意擴大御纂書籍的影響；但對民間而言，官方編纂多為大部頭書籍，刊印的成本過高，私人刊印的意願並不算太高。憑依上述的討論，我們可以稍微想像《朱子全書》離開武英殿之後可能歷經的旅程。

下文暫時離開這部書自身的脈絡，轉個方向，從統治者的角度來看待《朱子全書》，而最宜傳達聖祖欲宣傳的理念是其親作之〈自序〉。

五、 聖祖御製序文中的官方意識形態

康熙帝自幼即深習儒家學問，因受身邊的儒臣影響，對儒家的興趣漸被引導到理學。³⁰ 《朱子全書》之首有其親作序文，詳盡地描寫了為何要編纂刊印《朱子全書》的心路歷程，同時也傳達了對朱子學的推崇與敬愛。在序文的開頭，他首先批評三代聖賢思想，到了秦漢以下無人傳承的窘境：

28 盧秀菊，〈清代盛世武英殿刊刻本圖書之研究〉，《圖書館學刊》6期（1989，臺北），頁129。

29 吳哲夫，〈清代殿本圖書〉，《故宮文物月刊》，頁136。

30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2），頁186。

唐虞夏商周聖賢迭作，未嘗不以文字為重，文字之重，莫過五經四書。每覽古今，凡傳於世者，代不乏人。秦漢以下，文章議論無非因時制宜、諷諫陳事、繩愆糾繆、補偏救弊之計耳。……皆不近於王道之純。³¹

認為三代以下五經、四書最為重要，但是秦漢以下的文章議論卻與王道相距甚遠，只圖補偏救弊。接著他開始自述早年讀書的經驗，為文求華美而武功圖剛勇，然而自康熙 35 年（1696）時，親征準噶爾後，開始自我反省過去的態度：

予少時頗好讀書，只以廣博華瞻為事；剛勇武備為用。自康熙三十五年天山告警，朕親擐甲冑，……。後有所悟而自問：兵可窮乎？武可贖乎？……數十年來，方得宋儒之實，據雖漢之董子、唐之韓子，亦得天人之理，未及孔孟之淵源。至邵子……周子……似二程之充養有道、經天緯地之德，聚百順以事君親，前儒已誦之矣。³²

雖然聖祖也承認董仲舒（179 B.C.E-104 B.C.E）、韓愈（768-824）也掌握天人之理，但惟獨宋儒最能把握孔孟真傳。這樣的看法可能是受到朱熹道學、道統觀的影響。接著又引出歷代諸儒之中以朱子能真正繼承孔孟，必且盛讚其功績：

至於朱夫子，集大成而繼千百年絕傳之學，開愚蒙而立億萬世一定之規。……至於忠君愛國之誠，動靜語默之敬，文章

31 〔宋〕朱熹著，〔清〕李光地、熊賜履編纂，《御纂朱子全書》，〈序〉，頁 455。

32 〔宋〕朱熹著，〔清〕李光地、熊賜履編纂，《御纂朱子全書》，〈序〉，頁 455-456。

言談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氣，宇宙之大道。朕讀其書、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與之奧，非此不能治萬邦於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於天下，非此不能外內為一家。³³

由此觀之，康熙帝推重程朱之學的原因，除了自身對朱熹的崇敬之外，其作法也有鞏固統治的目的。³⁴ 故云讀朱子書可知天人相與、安邦定國的方法，在此程朱同時做為統治內外、安定臣民的工具，更發揮了教導人民忠君愛國的效果。³⁵ 到了最後一段他自述編書的理由，但因擔心後世批評他假借朱子名義而自作議論，故述而不作。然而聖祖認為，歷代的經典注解境界都未達到朱子的高度。他以極為誠懇的態度向世人自陳何以編纂此書：

讀書五十載，只認得朱子一生居心行事，故不揣粗鄙無文，而集各書中凡屬朱子之一句一字，命大學士熊賜履、李光地素日留心於理學者，彙而成書，名之《朱子全書》，以備乙夜勤學。雖未能幾於寡過，亦自勉君親之責者。朕又思朱子之道，五百年未有辨論是非，凡有血氣皆受其益。朕一生所學者，為治天下，非書生坐觀立論之易。朕集朱子之書，恐後世謂借朱子之書自為名者，所以朕敬述而不作，未敢自有議論，往往見元明至於我朝，注作講解萬不及朱子，而各出已見，每有駁雜反為有玷宋儒之本意。……凡讀是書者，諒吾志不在虛詞，而在至理；不在責人，而在責己，求之天沒而盡人事，存、吾之順；沒、吾之寧，未知何如也。³⁶

33 [宋]朱熹著，[清]李光地、熊賜履編纂，《御纂朱子全書》，〈序〉，頁456。

34 宋德宣，《康熙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頁202-204。

35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頁188。

36 [宋]朱熹著，[清]李光地、熊賜履編纂，《御纂朱子全書》，〈序〉，頁

簡言之，《御纂朱子全書》是要讓天下士人有個正確的典範。不管是立身處世、忠君愛國，還是天人相與皆可自朱子處得到。李光地在〈進朱子全書表〉中說朱子的著作：

惟其書流行於海內，前代雖頒行學校，知德者稀。全編則剝蝕經坊，研精實寡，從未有紹其道，傳其心，典極累朝尊異之隆。……六百年來編朱子書者，其得詳畧輕重之中，誠未有如我皇上者也。非夫心心相繼不隔絲毫，聖聖相承如合符節，孰能與此哉？³⁷

李氏盛讚康熙帝對朱子之隆禮，雖不無溢美，但這段話同時也說出了康熙帝對這部書所寄予的期望：不僅希望藉此書來自我砥礪，希望能心法朱子，也希望天下讀書人都能以朱子思想道德自勉，還希望能以此樹立朱子在官方意識形態中獨一無二的地位。宗室允禮（1697-1738）很清楚地點出這部書的作用，他說聖祖「命儒臣排纂《朱子全書》，刊布於世，學者誠能取此書朝夕研究，身體而力行之，則為聖賢也不難矣。又何必誇多鬪靡，以馳逐於風雲月露之文也哉。」³⁸ 其實尊崇程朱之學乃是當時的時代潮流，不過《朱子全書》的刊行確實也讓這個浪頭又推得更高。

而全書內沒有任何一字御批。除了由於聖祖希望，闕除歷代注解都不明朱子本意的弊病，才需編此書以正學問之外，或許也因為清楚地意識到書籍刊行，對廣大士人群體的影響力。若以帝

456-457。

37 [清]李光地，《榕村全集》，卷25，頁1264。

38 [清]允禮，《自得園文鈔》，收於《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據清乾隆刻本影印），283冊，頁834-835。

王之尊批注，則意味著評價聖人，既然朱熹是康熙皇帝心中的至高標準，也不可能在書中批評朱子的思想。

如同前面所提，清代初期以理學為宗，在反省陽明一派的弊病之後，學者開始有回歸程朱的傾向。像清初陸隴其（1630-1692）所著《讀朱隨筆》就是摘取《朱子文集》闡發微意，摘取朱子著作來發揚其思想的做法早就為士人所行。康熙帝這部書在編纂之前，其他文人也曾經編輯朱熹著作，並命之為《朱子全書》。如晚明學者就有一些節要朱子著作的作品，例如東林學者鄒經畬（生卒年不詳）著有《朱子節要補》、《朱子全書偶摘》。清初馮班（1602-1671）在《鈍吟雜錄》曾提及讀過《朱子全書》、康熙初年蔡衍錕（生卒年不詳）所著《操齋集》中有〈朱子全書跋〉等，不過在《御纂朱子全書》刊行後，後代學者所指涉的就是康熙皇帝御纂的版本了。另一方面，雖然康熙皇帝並未在御製序文中提及，但《朱子全書》之編纂，除了康熙本人塑造官方意識形態的目的，如果綜合明末到清初，民間出現了不少摘錄朱子著作的作品的現象，我們可以說：《御纂朱子全書》也同時回應了當代的學術潮流，如此則更能解釋為何該書能被士人群體所廣泛接受。

而這部書刊印之後，康熙帝藉著頒賜地方學宮並允許刊印等措施，試圖主導和控制文化。在下文關於地方學校書籍清單的討論中，更可見官方以量取勝、以程朱思想為官方意識形態的文化政策，確實產生了預期的作用。不過書籍一旦流傳於民間，民間如何接受書中欲傳達的意識形態，就不是皇帝所能百分之百掌握；而皇帝又是怎麼看待書籍實際流傳後，所產生的各種現象？他又採取什麼樣的處理方式？下文將透過高宗的例子來說明。

六、 乾隆年間頒發書籍上諭所見之目的

前面已經用〈朱子全書序〉來處理了康熙皇帝的想法，與為何修《朱子全書》的背景。這部份則利用乾隆帝的幾則上諭，從書籍流傳的角度，討論乾隆帝希望御纂書籍達到何種效果。官方編纂書籍可謂一種文化動員，從編纂、刊刻到發佈，大量的人員牽涉其中。編纂的目的自然是為了廣為流傳，皇帝當然不希望書籍頒佈到地方後就被束之高閣、乏人問津，所以自康熙朝以來皆准許民間刷印流通。而且殿本刊行後除了用於頒賜、陳設之外，武英殿也會刷印部分書籍的通行本，標明價碼於書肆中販售。但如果從政府的觀點來看，此策略是否能達成目的呢？從《大清會典事例》中乾隆三年（1738）頒行書籍的上諭可知：

諭。從前頒發聖祖仁皇帝御纂經史諸書，交直省布政使敬謹刊刻，準人刷印，並聽坊賈刷賣。原欲士子人人誦習，以廣教澤，近聞書版收藏藩庫，士子及坊間刷印者甚少，著直省督撫將書板重加修整，俾士民易於刷印。坊間有情願翻刻者，聽其自便，毋庸禁止。如御纂諸書內有為士子所宜誦習者，著該督撫奏請頒發刊版流布。至武英殿、翰林院、國子監皆有存貯書版，亦聽人刷印。從前內務府所藏各書，如滿漢官有願購覽誦覽者，概準刷印。³⁹

如果單就上諭來看，會認為殿本或從殿本翻刻御纂書籍，士人皆不好使用；就高宗的角度而言，不管是一般讀書人或庶民，

39 [清]崑岡等，《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收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69，頁61-62。

都鮮少刷印御纂書籍。他認為原因出在官府未善盡職責，未能使百姓易於取得板片，所以指示各省應該要修整書板，提供品質良好的板片給讀書人，這樣才能達到讓書籍廣為流傳的目的。但從對象來說，它針對的是御纂經史書籍，這是否代表《朱子全書》這類的子部書籍不包含在內呢？從現存史料來說，我們無法精確地指出坊間刊印《朱子全書》的數量，但高宗的上諭提示我們，官方有意圖地將御纂書籍推行於民間。除了將書籍頒佈於府署、學校之外，更要求各省政府提供方便民間印書的管道。這點在同年的上諭中表達地更清楚：

諭。士子書藝之外，當令究心經學，以為明道經世之本。我皇祖御纂經書多種，紹前聖之心法，集先儒之大成，已命各省布政使敬謹刊刻，聽人刷印。亦准坊間翻刻廣行，恐地方大吏不能盡心經理，則士子購覓，仍屬艱難，著督撫藩司等善為籌畫，將士子應讀之書，多行印發，以為國家造士育材之助。⁴⁰

乾隆帝認為總督、巡撫、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等應該主動扮演印刷書籍的角色，尤其康熙皇帝的御纂經書乃集先聖先儒的大成之作，更是士子應讀之書，而這麼做的目標是替國家培育人才，使讀書人熟習經世濟民與道統之所尊。從上述幾則上諭來看，皇帝們有意識地想要運用御纂書籍影響士人群體。不過這並不表示他們是以治統的角度來看待這個政策。縱使從康熙帝之後，道統和治統可謂結合為一，歷代皇帝仍傾向站在以道統指導者來指揮這一文化工程。乾隆三年（1738）的另一道上諭，除了明確提及《朱

40 [清] 素爾訥，《欽定學政全書》（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據乾隆三十九年武英殿刻本），卷4，頁106-107。

子全書》外，對於擴大書籍流佈以便於士子傳習一事，又有了更具體的指示：

《御纂朱子全書》……俱於學術有裨，自宜廣為傳習，今將刷印各書所需墨工價銀兩，逐部核定。凡滿漢官員有情願指俸若干，刷印書籍若干部者，由該旗該衙門查明，移咨武英殿等各衙門照數刷給，行文戶部扣俸還項，則大小官員皆得易於購覓，以備誦覽。至內廷書籍，外間士子無不群思觀覽，照從前頒發御選語錄等書之例，將武英殿各種書籍交與崇文門監督，存貯書局，准令士子購覓，以廣見聞。⁴¹

高宗這幾道上諭的思維都延續著其祖父的思維，即希望御纂書籍盡可能地擴大在民間流通。除了要求各省長官帶頭刊印之外，旗籍官員若有意願印刷者，也有相關措施，甚至開設書局便於士人尋購。從這幾個政策來看，乾隆帝對御纂書籍在民間流傳之事很是關切，康熙皇帝雖然也指示書籍應該廣為刷印，但乾隆帝積極的要求顯然比康熙帝更為具體且深化。而乾隆帝的幾項努力大約確實收到了成效，我們從河南巡撫臣尹會一（1691-1748）乾隆四年（1739）正月20日的上奏可見：

聖祖仁皇帝御纂……《朱子全書》、日講四書等書其板俱貯開封府學宮，久經曉諭，士子人等刷印翻刻，並無留難。今奉諭旨，臣復與藩司悉心籌畫，豫省所屬士子，現在各于城鄉就近分社，每社設有社長，為之月課，講貫前項書籍八種，通共刷印工價銀七兩有零，所費無幾，州縣于養廉之外，本

41 [清]素爾訥，《欽定學政全書》，卷4，頁104-106。

有另給公費銀兩，以備地方公務之用，而振興學校乃有司之責，酌動公費刷印，按社給發以備諸生講誦，仍將各書價直遍行。曉諭如士民有家計饒裕，子弟讀書情願刷印。俾孤寒後學，借觀誦習者，不拘部數，並不需遠赴省城，但由該地方官報明藩司，即先墊項刷發，雖山僻邊隅書賈不到之地，亦可偏為流布。俾士子潛心經學，以期實用，所有遵旨辦理經書，緣由理合據實覆奏，伏乞睿鑒謹奏。⁴²

尹會一詳細地奏陳了他接受上諭後的相關施政，包括在各城鄉內設社，每月宣講包括《朱子全書》等書籍，而公費印刷這些書籍。同時鼓勵士人、民眾自行印刷，也提供書籍給邊鄙之地。他認為經學實用乃書籍的目的，而非供奉在地方學校中生蠹。如果尹氏確實執行，那我們可以想見，透過宣講《朱子全書》的內容，聖祖所希望傳達的讀書之道、四書六經優於性命的道理，都可以藉著宣講這一有效率的傳播方式散布。而將書籍供應至偏遠地區，一方面所有讀書人都能閱讀，也同時是一種官方積極擴散其意識形態的做法，且無孔不入的程度，也使得《朱子全書》在地方上變得常見。雖然從上諭和尹會一的奏章之中無法獲悉士人對書的看法，但至少從皇帝的角度而言，書籍廣泛流傳的目的確實達成。那麼接下來就要討論：從地方的角度來看，這部書的傳播狀況。

七、 地方收藏、閱讀御纂書籍的情況

大抵而言，書籍皆有其預設讀者。例如《朱子全書》大多頒布到學校、書院，較少賞賜給大臣。⁴³ 如果說告竣就是宣告一部書的

42 [清]尹會一，《健餘奏議》，收於《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新華書店，2000年據乾隆刻本影印），冊40，史部，卷6，頁76-77。

誕生，而無人閱讀是其死亡，那麼是否在康熙 52 年（1713）誕生之後，《朱子全書》是步入其死亡、作為學宮中的擺設，或作為聖祖皇帝御纂之書，提醒諸人皇權的衍生，還是被視作朱子學問的要領，仍然於地方上影響著無數的讀書人？下文主要還是從《朱子全書》的情況出發，不過這個問題牽涉了多數御纂書籍的狀況，故在此仍從較大的視野來討論。

（一） 御纂書籍於地方機構的收藏

自《御纂朱子全書》頒行後，從各地府州縣學的藏書清單常可見此書，⁴⁴來源多由政府頒行而進入地方學校的收藏。舉例來說，上從府、州，如寧夏府學藏《御纂朱子全書》六部，每部 32 本，⁴⁵下至縣學，如東流縣存《御纂朱子全書》二部。⁴⁶除了寶慶府學中的收藏可以確定是由武英殿刷印後頒布，⁴⁷大部分的縣學則缺乏明確資料說明來源為殿本或坊間翻印本，而時間上也沒辦法一一確定各個府州縣學所藏《朱子全書》是何時頒發。就地域分布而言，從現有的資料來看，以江浙、安徽、湖南等地最多。雖然這不表示其他地區的學宮不收貯此書，可能因故，比如說戰亂造成書籍焚毀，而使地方志缺載。我們有理由相信，既然書籍是發布各省，且准人民刊印，那麼帝國各處應該都可取得此書。但不管如何，

43 其中也有用作賞賜的例子，例如雍正元年賞賜《朱子全書》給朝鮮使節。

44 參見附錄：道光朝以前地方志中所載《御纂朱子全書》的收藏。部分地區的本數不同於其他，我懷疑可能是地方上另外刊印的版本，而非直接由武英殿本翻刻。

45 〔清〕張金城，《（乾隆）寧夏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 年據嘉慶年間刊本），卷 6，頁 111。

46 〔清〕吳旒，《（嘉慶）東流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年據嘉慶 23 年刊本），卷 10，頁 458。

47 〔清〕吳旒，《（嘉慶）東流縣志》（臺北：成文出版社，1985 年據嘉慶 23 年刊本），卷 10，頁 458。

大量的學校藏書清單中都可見此書，甚至有許多不止收藏一部的學校，可見至少在地方學校中，這部書是容易取得的。除了官學之外，皇帝也會賞賜給書院和各地孔廟，如康熙 55 年（1716）頒賜給浙江萬松書院。⁴⁸ 熱河文廟落成時，乾隆帝亦下旨頒發武英殿本《御纂朱子全書》等。⁴⁹ 綜上所述，在地方的教育機構中，《朱子全書》可說是常見的書籍。

那麼在地方的士人又如何收藏這部書？在康熙 55 年浙江巡撫徐元夢（1655-1741）奏報的一道摺子中，他敘述將康熙帝御筆、《孝經》法帖、《古文淵鑿》、《淵鑿類函》、日講《四書》、《易》等出示於書院，當地士子跪稱：

自古以來，雖有著名書院，然主子御筆字匾、法帖、大內之書賞賜者，前所未有的。我等猶如草芥，欣逢聖世，得進書院讀書，皇帝為示惠愛教育聖意，既賞……及編著之各類書，豈但我等於書院讀書之人感念聖諭，即全省讀書之人，亦無不感戴歡忭。⁵⁰

而徐氏亦「將主子所賞法帖及各類書，恭陳書院，永為眾學子典範。」⁵¹ 雖然徐氏公布的書籍並無《朱子全書》，不過其中書籍無一不具有御纂性質。他的彙報紀錄了地方士人對於御纂書籍的態度，儘管我們也不可排除過度誇飾的成分。

48 [清]嵇曾筠等監修、沈翼機等纂，《浙江通志》（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頁 0519-130。

49 [清]和坤等奉敕撰，《欽定熱河志》（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年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74，頁 496-53。

50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頁 1107。

5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頁 1107。

（二）御纂書籍在地方的角色與功能

除了御賜書籍的皇權身份，御纂書籍在地方上又是怎麼被運用呢？是可有可無？或具有其他功能？從乾隆元年（1736）8月22日，江西布政使刁承祖（1672-1739）的一封奏摺或許可以窺其一二：

江西布政使革職留任臣刁承祖奏，《朱子全書》刻版向藏南昌府署，於康熙五十三年遭被回祿，焚燬無存，迄今缺一未全，士子無不遺憾，自應重付剞劂，以廣教思，臣將原本交匠估計，共需工價四百余金，現商請撫臣，動支存公銀兩，鳩工刊刻，仍令書鋪印刷平價發售……。⁵²

根據前文所引乾隆三年（1738）上諭，康熙朝已命令各省布政使刊印書籍。綜合刁承祖之陳奏，可知《朱子全書》曾頒布地方、依照殿本樣式重新刻印、存於省會。不過有趣的是，可從奏摺中得知：刻印這麼大部頭書籍，約需400兩金，其價值約等於400兩白銀。根據學者研究，雍正末、乾隆初英國東印度公司從廣東購買南京高級生絲的價格為一擔155兩到175兩之間。⁵³又一百金約可於乾隆初年的紹興府購買七、八畝良田。⁵⁴但這對地方政府而言顯然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值得注意的是，依照刁氏的說法，這是士子們自發地希望官府重刻此書，而重刻後又令書商印行發售，流佈於民間。換言之，地方上也認為御纂書籍是為了「廣教思」，因此在書版毀於祝融後，仍要重新刊印，進而平價出售，使更多

52 翁連溪，《清內府刻書檔案史料彙編》（揚州：廣陵書社，2007），頁105。

53 岸本美緒，《清代中国の物価と經濟變動》（東京：研文出版，1997），頁147-148。

54 岸本美緒，《清代中国の物価と經濟變動》，頁154-155。

人都有機會閱讀此書。當《朱子全書》擺在官學或衙署中，不管是否有人實際閱讀，只要不是無人知曉，其都可能成為文化權威上的象徵。原書損毀，並且由士人提議使之二度重歸地方時的情形下，這部書象徵皇朝的意識形態被地方所接受，進而聯繫中央與地方對程朱理學的共同認同。地方並不只是被動地接受官方主導、以程朱為統的意識形態，他們同時也參與了這一思想風氣的形塑過程。

又如嘉慶 22 年（1817）御史卿祖培（1775-1822）奏請飭各省學政講明《朱子全書》以端士習一摺說道：「教化為立政之本，以正人心，以厚風俗，非特各省學政當講明正學，以端士習。即督撫、藩臬以至道府州縣，各負有治民之責，皆應隨時化導。」⁵⁵ 可以說，《朱子全書》的角色不純粹體現在整理、辨明理學或朱子思想，使儒者不至因閱讀摻入了後學觀點，而對程朱理學產生龐雜、錯亂的理解，更進一步帶有教化的功能。當然這點在聖祖御製序文便已明示，只是站在康熙帝的角度而言，其懇切的語氣中更多表現在個人修身養性和讀書窮理的面向上；而落實到地方官員時，又多了份校正風俗的味道。又譬如福建地區的官員徐夔（1803-1879）「嘗一至福建學政署中，以士習浮僞，命刊《朱子全書》以授諸生。」⁵⁶ 還有嘉慶年間四川學政聶銑敏（1775-1828）「廣發《朱子全書》以正士習。」⁵⁷ 兩人同樣都藉著刊印《朱子全

55 〔清〕崑岡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收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 4651。

56 〔清〕俞樾，（1821-1907），《春在堂雜文》（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卷 2，〈光祿大夫漁臣徐公家傳〉，三編，卷 2，頁 599。

57 〔聶銑敏，字蓉峰，肇奎三子。乾隆乙卯優貢本科舉人，嘉慶乙丑進士，選庶吉士改兵部武選司主事，己巳恭逢萬壽，進呈回文賦並詩頌稱，旨特授編修。庚午充貴州副考官，放榜前一夕，猶搜落卷，恐有遺珠。己卯提督四川學政，在任三年，文必親閱，無弊不別。並廣發《朱子全書》以正士習。尋以知府揀

書》來矯正地方風俗。從這兩段史料來看，至少在官員眼中，《朱子全書》的教化功能更受到重視。當地方士風不淳時，學政即以此書為教化之用，從另一個角度看，因「御纂」的朱子全書是「淳的」，才能歸正「不淳」。

由此觀之，對照聖祖認為此書兼具性、理、禮的評論，《朱子全書》已經由樹立官方標準的朱子思想這一層面擴大，甚至兼具道德教化的性質。再參照前文尹會一的例子，這些施政都可看作官方藉著《朱子全書》形塑意識形態的方式，且深具教化意義；而這些例子也成為良政的代表並記載於地方志中，也象徵著此番意識形態被士人接納。

（三）地方士人的評價

從皇帝與地方官員的努力來看，他們積極地使書籍流通於地方社會，並且獲得了一定成效。在地方上，士人取得該書的方式大約有兩種，一為學校、孔廟，二為是私人藏書、手抄，以下將分別討論。

清代皇帝常頒布御纂書籍到孔廟、書院，而清代這兩處地方與科舉文化密切相關。清代幾乎所有士人的一生都圍繞著科舉旋轉，而在科舉考試的過程中，我們也可以看到《朱子全書》的影響。例如嘉慶四年（1799）因為闈場之中原有的書籍不敷使用，故出考題時會拿出官書來參考。但是政府擔心這些書籍外傳之後，

發浙江署紹興，士民感其德，建生祠以祀，易五賢祠為六賢，卒年五十四。題祀四川名宦並祀鄉賢。」見於〔清〕曾國荃等纂，《（光緒）湖南通志》（南京：鳳凰出版集團，2010年據清光緒11年刻本），卷184，頁644。

士人會藉著鑽研特定書籍來迎合考官，所以下令禁止使用舊的參考用書。至於闈場中不足的書籍，則由相關科場向武英殿申請，並貯存於禮部和順天府，以備不時之需。「隨經禮部行文武英殿，移取……《朱子全書》、《四庫全書總目》、《三禮圖》各二部，一分存禮部，一分存順天府，屆鄉會試時，送闈中查閱。」⁵⁸ 這個措施說明了《朱子全書》也是出題參考用書。如果成為參考書，就算官方再如何嚴禁士民知悉，亦可以想像士子仍會趨之若鶩地閱讀。同時也說明《朱子全書》藉由科舉這個龐大的選材機制，對清代士人產生的影響不容小覷。

除了對科舉的影響，在一般士人眼中，又是如何評價《朱子全書》？康、雍年間的劉之珩（生卒年不詳）學問上宗法陸隴其（1630-1692），一生仕宦最高只擔任過教諭，然致力鑽研《朱子全書》，這點也被記錄在地方志中，成為他一生裡最值得稱頌的幾件事之一。⁵⁹ 而程朱一派的學者蔡世遠（1681-1732）在〈寄寧化五峰諸生〉指出：「《朱子全書》中有無限道理，體用俱備。《近思錄》則領要存焉，總在讀時句句切已，行事時刻刻對照耳。」⁶⁰ 似乎他將《朱子全書》視為克己之書，其中道理具備，讀書處事時反覆對照，這點與康熙皇帝的期望十分類似。又戴殿泗（1746-1825）在〈與朱西崖先生書〉說：

58 〔清〕英匯等纂，〈闈中書籍〉，《欽定科場條例》（臺北：文海出版社，1989年據咸豐年間刻本），卷43，頁3013-3015。

59 「劉之珩，字鈍軒。康熙丙寅拔貢。其學以陸隴其為宗，力闢姚江末流之說，於《朱子全書》致力尤久。官永興教諭，每教人變化氣質，專力主敬。學者翕然宗之，黻舍至不能容，憂歸。起甯遠教諭，崗蠻為亂，攝縣篆數月，力禦之。坐在永興時失察曾靜案，罷歸，卒年七十八。著有《講授摘要》、《慎言集》、《格物集》、《近思清錄》。」見於曾國荃等纂，《（光緒）湖南通志》，卷199，頁329。

60 〔清〕蔡世遠，《二希堂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8，頁18-19。

昨支來《朱子全書》一部分日挨誦，自客歲除日為始，至今月之初，纔克一週。以時日計，頗為淹滯，而此中精要，竊恨無所領會，然深觀其中閎深，無細大之不包，精簡又兩言而可盡。⁶¹

而方東樹（1772-1851）的學生戴鈞衡（1814-1855）於〈與方海舫書〉也說：「願足下從公之暇日，取《性理精義》、《朱子全書》、《大學衍義》三者時加玩索，以立經世之本。」⁶²在此，《朱子全書》從道德手冊變成了經世濟民的根本，這個看法雖然和前面兩個例子（乃純粹將該書視作道德學問的方法）略有不同，但基本上都超脫了聖祖御製序文中對此書的期待。

另一種閱讀的途徑為私人收藏，周中孚（1767-1831）的《鄭堂讀書記》仿照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一介紹所見之書，考證其版本、真偽並評價內容。他也同意《朱子語類》和朱子文集無法體現朱子思想之精粹，而《朱子全書》則擺脫了二書之缺點。⁶³也就是說，從一個藏書家和目錄學家的觀點，他肯定了《朱子全書》釐正朱子思想的作用。

61 [清]戴殿泗，《風希堂文集》，收於《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據道光八年九靈山房刻本），415冊，卷3，頁680-681。

62 [清]戴殿泗，《風希堂文集》，收於《清代詩文集彙編》，415冊，卷3，頁680-681。

63 「康熙五十二年大學士李光地等奉敕撰。謹案南宋諸儒所作《語錄》、《文集》，惟朱子卷帙最為繁富。然《語類》為門人黎靖德所編，中間不無譌誤冗複，雜而未理大全。《集》亦精麤雜載，細大兼收，觀者又苦其煩多，迷於指趣。是編分類排纂，釐為一十九門。凡學六卷、四書十九卷、六經十六卷、性理七卷、理氣二卷、鬼神一卷、道統六卷、諸子三卷、歷代二卷、治道二卷、藝文二卷，冠以御製序文及進表職名凡例。」見於〔清〕周中孚著，黃曙輝、印曉峰標校，《鄭堂讀書記》（上海：上海書店，2009），卷37，頁582。

士人閱讀書籍的方式，除了在地方學校或孔廟閱讀書籍之外，有時也會用手抄的方式記錄。縱然印刷術在宋代就已經非常發達，且刻書的門檻也沒有特別高，但手抄一直是獲取知識的重要方式。直到明代中葉以後印刷術才取代手抄，成為書籍最主要的傳播方式。不過就算印刷術發達，手抄仍是一個重要的知識傳播方式。有的文人雅士獨好手抄的質感；而一些貧困的士人從官方或私人的藏書閣借書抄寫，以獲取知識。一個時代較晚的小例子大約可以呈現一個普通士子的生活，是如何與《朱子全書》產生聯繫。在道光（1821-1850）年間修纂的《濟南府志》記載：「王斌，字憲章，齊河人。世業儒，雅好詩書，暇則持一編雜誦，耄年不倦。七旬後猶手鈔《朱子全書》以供玩味。」⁶⁴ 在這個例子裏面，王斌之所以抄寫《朱子全書》大概並非由於貧困，而是帶有品味朱子書中道理的味道。從此例亦可謂《朱子全書》有端正、教育士人的功能。我們可以想像，在底層士子的生活中，若有機會接觸這部書，大概也可能如王斌，是平時研讀學問的一部分。而官方所希望賦予的意識形態，也在不知不覺中融入一般士人的生命之中，士風也就暗暗地被官方的意識形態形塑。

大抵而言，《朱子全書》是受士人肯定的，而且常常表現在對於朱熹學說的喜好上。士人尤注意修養自身的實用和經世濟民的部分，且時時參照玩味，也就是他們都比較注意《朱子全書》對於「行」的用處，在此見不到抽象思考。尤其上述三者的學術態度基本上都是站在支持宋學的立場。在撰述時，清代學者也會參閱《朱子全書》，或藉此書論證觀點，例如查慎行（1650-1727）在《周易玩辭集解》自述中說：「余既作〈河圖說〉復細閱《朱

64 〔清〕王贈芳，〈（道光）濟南府志〉（臺北：學生書局，1968年據道光20年刻本），卷56，頁5278。

子全書》其中數條，有與鄙見相發明者，因摘附于左。」⁶⁵〈河圖說〉也以朱子也用河圖生蓍來佐證《河圖》出於讖緯。

八、結語

從皇帝的角度來看，《御纂朱子全書》是為了推廣朱子思想而存在的。就建立朱學為典範這點來說，至少在官方的意識形態上，程朱成為不可動搖的標準乃是不容質疑。縱然這樣的影響可能不見得完全來自於《朱子全書》，然而，這部書等同於朱子部分著作的重編，與《語錄》雜冗後學思想不同。從士人的角度來看，不管是地方官員的施政或士人的評價，很多時候《朱子全書》被當作修養道德的參考用書。甚至，大部分的文集討論此書時，並不會強調其「御纂」的性質，而是從朱子學問的角度來談，只有在一些頌德的文字中才會特別提出「御纂」的性質。從目前的材料來看，無法說明他們是否是有意地忽略《朱子全書》與皇帝的意態相關，或者對他們而言，原著者是朱熹這一點才更具意義。

不過若我們從反面來看，士人沒有談到這部書籍的編纂、篇次的問題，甚至並無動其根本的相左意見。如此大同小異的言論，可能同時反證了他們同意這種意識形態，這正代表著他們被官方的意識形態內化。清初理學反對過於強調性命，注重實際、經世的特質，也同樣反應在篇次的安排上。四書六經抬至性命之前，除了康熙皇帝個人的解讀之外，從沒有對篇章結構的批評，也可證明當時的學術潮流認同這樣的做法。換句話說，《御纂朱子全書》讓我們看到了清代皇帝藉由書的編纂和流傳，試圖影響士風，

65 〔清〕查慎行，《周易玩辭集解》（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首，頁4。

而當代的學風也同樣影響著皇帝的觀點。士人群體的學風，讓他們可以接納官方所賦予的意識形態。在這個過程中，沒有一方是完全被動地接受對方施加的力量，而是互相影響、吸納。

附錄

道光朝以前地方志中所載《御纂朱子全書》的收藏⁶⁶

地域	時間	書名	數量	頒布時間
山西	乾隆	大同府志		
山西	乾隆	渾源州志	12 冊	
山西	乾隆	陵川縣志	12 本	
山西	乾隆	寧武府志	每部 32 本	
山西	乾隆	蒲縣志	一部	
山西	乾隆	太谷縣志	一部	
山西	嘉慶	太平縣志	一部	
山西	道光	大同縣志	一部	
山西	道光	陽曲縣志	12 本	
山東	道光	濟南府志	25 本	
山東	道光	泰州志		
四川	乾隆	鄰水縣志	一部	
四川	道光	萬州志	一部計 40 本	
四川	道光	遵義府志	一部	
甘肅	乾隆	狄道州志	六部	
甘肅	乾隆	合水縣志	一部	
甘肅	乾隆	華亭縣志		

66 本表格依據愛如生中國方志庫，以「朱子全書」為關鍵字檢索後整理，表格中空白的部分即地方志未記載。檢索日期：2013 年 9 月 14 日。

50 施厚羽

甘肅	乾隆	涇州志	六部	
甘肅	乾隆	靜寧州志	二部八套	
甘肅	乾隆	寧夏府志	三套 25 本	
甘肅	乾隆	通渭縣志	六部	
安徽	康熙	安慶府志	一本	康熙 53 年
安徽	康熙	泗州直隸州志		
安徽	乾隆	池州府志		
安徽	乾隆	廣德直隸州志		
安徽	乾隆	含山縣志	二部	
安徽	乾隆	績溪縣志		
安徽	乾隆	潛山縣志	二部八函	
安徽	乾隆	銅陵縣志	22 本無套	
安徽	乾隆	望江縣志	二部八套	
安徽	嘉慶	備修天長縣志稿	兩部共八套	
安徽	嘉慶	東流縣志	兩部	
安徽	嘉慶	桂東縣志	一部 25 本	康熙 51 年
安徽	嘉慶	合肥縣志	兩部	
安徽	嘉慶	懷遠縣志		
安徽	嘉慶	涇縣志	一部	
安徽	嘉慶	旌德縣志	兩部	
安徽	嘉慶	南陵縣志	八套	
安徽	嘉慶	寧國府志	二部	
安徽	嘉慶	蕪湖縣志	兩部八套	

安徽	道光	繁昌縣志	二部共計八套	
安徽	道光	阜陽縣志		
安徽	道光	休寧縣志	貳部	
江蘇	乾隆	江都縣志	二部	
江蘇	乾隆	金山縣志	一部	
江蘇	乾隆	句容縣志	二部共八套	
江蘇	乾隆	吳江縣志	三部	
江蘇	乾隆	震澤縣志	一部	
江蘇	嘉慶	高郵州志	一部	
江蘇	嘉慶	直隸太倉州志	全函	
江蘇	道光	重修儀徵縣志	二部	康熙 55 年
江蘇	道光	重修儀徵縣志	一部	
直隸	乾隆	任邱縣志	一部	
直隸	乾隆	肅寧縣志	一部	
直隸	嘉慶	長垣縣志	兩部	
河南	乾隆	登封縣志		
河南	乾隆	獲嘉縣志	一部	
河南	乾隆	襄城縣志	四套	
浙江	雍正	浙江通志		康熙 55 年
浙江	乾隆	昌化縣志	六部	
浙江	乾隆	杭州府志		
浙江	乾隆	瑞安縣志		
浙江	乾隆	紹興府志	12 部	

52 施厚羽

浙江	乾隆	烏程縣志	十部	
浙江	乾隆	諸暨縣志	八部	
浙江	嘉慶	慶元縣志		
浙江	嘉慶	山陰縣志	12 部	
浙江	道光	東陽縣志	每部 32 本	
浙江	道光	建德縣志	四部	
浙江	道光	上元縣志		康熙 52 年
浙江	道光	武康縣志	一部 32 本	
陝西	雍正	藍田縣志		康熙 57 年
陝西	乾隆	淳化縣志	二部六套	
陝西	乾隆	鳳翔府志	二部	
陝西	乾隆	伏羌縣志	六部	
陝西	乾隆	石泉縣志	一部	
陝西	乾隆	咸陽縣志	二部	
陝西	嘉慶	洛川縣志		
陝西	道光	重修汧陽縣志	二部共六函	
湖北	乾隆	長陽縣志	一部	
湖北	乾隆	黃崗縣志		
湖北	乾隆	黃梅縣志	一部	
湖北	乾隆	棗陽縣志	一部	
湖南	康熙	耒陽縣志	一部	
湖南	乾隆	安鄉縣志	兩冊八套	
湖南	乾隆	桂陽縣志	二部八函	

湖南	乾隆	祁陽縣志	二部	
湖南	乾隆	清泉縣志	二部八函	
湖南	乾隆	湘潭縣志	二部	
湖南	乾隆	永興縣志	一部	
湖南	嘉慶	長沙縣志	兩部	
湖南	嘉慶	常德府志	八函	
湖南	嘉慶	龍山縣志	二部 80 本	
湖南	嘉慶	廬州府志		
湖南	嘉慶	沅江縣志	兩部四函	
湖南	道光	寶慶府志	二部每部 40 冊	
湖南	道光	鳳凰廳志	二部八套 80 本	
湖南	道光	永州府志		康熙 52 年
湖南	道光	永州府志		乾隆十年
貴州	道光	大定府志		雍正九年鄂爾泰置
貴州	道光	貴陽府志	一部	
貴州	道光	思南府續志	一部	乾隆元年
雲南	雍正	阿迷州志	一部	
雲南	乾隆	石屏州志	八本	
雲南	道光	廣南府志	一部計四套	
雲南	道光	昆明縣志		雍正九年鄂爾泰置
福建	康熙	南平縣志	十二本	
福建	乾隆	安溪縣志		
福建	乾隆	南靖縣志		

54 施厚羽

福建	道光	彰化縣志	一部	
廣西	乾隆	富川縣志	一部	
廣西	乾隆	廣西府志	13 本	
東北	道光	承德府志	一部四函	
東北	道光	吉林外記	一部四套	

徵引書目

史料

(一) 史籍、政典、檔案

- 〔宋〕朱熹著，〔清〕李光地、熊賜履編纂，《御纂朱子全書》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1983年據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
- 〔清〕《大清聖祖仁（康熙）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4。
- 〔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商務，1965年據乾隆武英殿刻本。
- 〔清〕英匯等，《欽定科場條例》，臺北：文海，1989年據咸豐刻本。
- 〔清〕素爾訥，《欽定學政全書》，臺北：文海，1969年據乾隆39年武英殿刻本。
- 〔清〕張之洞撰，來新夏、韋力、李國慶匯補，《書目答問匯補》，北京：中華書局，2011。
- 〔清〕崑岡等，《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載於《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康熙朝滿文朱批奏摺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 翁連溪，《清內府刻書檔案史料彙編》，揚州：廣陵書社，2007。

(二) 方志

- 〔清〕王贈芳，《（道光）濟南府志》，臺北：學生書局，1968年據道光20年刻本。
- 〔清〕吳簾，《（嘉慶）東流縣志》，臺北：成文，1985年據嘉慶23年刊本。
- 〔清〕和坤等，《欽定熱河志》，北京：商務，2006年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清〕張金城，《（乾隆）寧夏府志》，臺北：成文，1968年據嘉慶年間刊本。
- 〔清〕黃宅中，《（道光）寶慶府志》，臺北：成文，1975年據民國23年重印本。
- 〔清〕嵇曾筠等，《浙江通志》，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年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曾國荃，《（光緒）湖南通志》，南京：鳳凰出版集團，2010年據清光緒11年刻本。

（三）文集

〔清〕允禮，《自得園文鈔》，收於《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據清乾隆刻本影印。

〔清〕尹會一，《健餘奏議》，收於《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新華書店，2000年據清乾隆科本影印。

〔清〕李光地，《榕村全集》，臺北：力行，1969。

〔清〕周中孚著，黃曙輝、印曉峰標校，《鄭堂讀書記》，上海：上海書店，2009。

〔清〕俞樾，《春在堂雜文》，臺北：文海，1969。

〔清〕昭槤，何英芳點校，《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

〔清〕查慎行，《周易玩辭集解》，北京：商務，2006年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蔡世遠，《二希堂文集》，北京：商務，2006年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清〕戴鈞衡，《味經山館文鈔》，載於《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據咸豐刻本影印。

〔清〕戴殿泗，《風希堂文集》，載於《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據道光八年九靈山房刻本。

論文

吳哲夫，〈清代殿本圖書〉，《故宮文物月刊》，3卷4期，1983，臺北，頁132-137。

盧秀菊，〈清代盛世武英殿刊刻本圖書之研究〉，《圖書館學刊》，6期，1989，臺北，頁115-134。

專書

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2013。

史革新，《清代以來的學術與思想論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朱賽虹、曹鳳祥、劉蘭肖，《中國出版通史·清代卷（上）》，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08。

宋德宣，《康熙思想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臺北：允晨文化，1994。

楊菁，《清初理學思想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8。

葉高樹，《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2。

岸本美緒，《清代中国の物価と經濟變動》，東京：研文出版，1997。

數位資料

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研製，中國方志庫。

Examining the Official Ideology and Shaping of the Academic Atmospher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Hou-yu Shih*

Based on *Yu zuan Zhuzi quan shu* by Shengzu of Qing, the present study explored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deology disseminated by early Qing Dynasty emperors, and examined its promotion by local officials and its acceptance by scholars after the *Yu zuan Zhuzi quan shu* was published.

The present study comprises three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is center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Cheng-Zhu school and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olicies. The second section involves an analysis on the publication culture of the imperial court and the compilation and printing process of the *Yu zuan Zhuzi quan shu*. The third section is focused on analyzing Shengzu's mindset based on his imperial preface. In this section, the dissemination of ideology was further examined through Gaozong's imperial edict and the relevant documents of local officials. Various literary sources from school archives and discussions in other collected works were used to explain that such ideology was not only stipulated by the ruler, but also by scholars. The majority of discussions in the present study are centered on the Kangxi and Qianlong reigns; however, a portion of the present study also examined the ideology during the mid- and late Qing Dynasty.

Keywords:

Shengzu (聖祖, Emperor Kangxi 康熙) *Gaozong* (高宗, Emperor Qianlong 乾隆)
Yu Zhan Zhuzi quan shu (御纂朱子全書, Imperial Compilation of Zhu Xi's Complete Works) ideology book culture

* under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朝鮮天下圖與其天下意識*

朱祉樂**

17 世紀後期，朝鮮出現了大量獨特的地圖—天下圖。目前的研究認為，這與 17 世紀時，東亞地區的政治環境變遷有著密切的關係。本文利用了學者對朝鮮天下圖的研究，考察朝鮮天下圖中所蘊含的「對世界的認識」，亦即本文所述的天下觀。地圖是一種「地理意識」表述的載體，表現了製圖者自身對空間的認知。通過研究朝鮮天下圖，本文發現朝鮮當時建構出與中國、日本等不同的「天下觀」。而這種思想上的變動，有極大的可能是來自 17 世紀東亞舊有秩序的瓦解與各國自身民族意識的建構。

關鍵字：朝鮮 天下圖 世界觀 東亞 小中華

2013 年 2 月收稿，2013 年 7 月通過刊登。

* 致謝辭：本文原為 101 學年度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衣若蘭老師開授「中國史三」課程期末報告，筆者修改之後投稿《史繹》，並於 2013 年 12 月「第 38 期《史繹》成果發表會」宣讀。感謝衣老師的鼓勵，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的修改建議，但文責由筆者自負。

**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100 級生

- 一、 前言
- 二、 天下圖介紹
- 三、 朝鮮天下圖的研究回顧
- 四、 天下觀、華夷秩序與《山海經》
- 五、 結語

一、 前言

地圖，在大英百科全書上的解釋是「在一個平面上，按比例尺對地球某一地區的特徵，通常為地理的、地質的、地緣政治的特徵，或某一天體的特徵所作的圖解表示」。¹ 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無論是搭乘捷運、看房地產廣告、還是旅遊，都會碰到形形色色的地圖。毫無疑問，地圖的功能就是以科學和客觀的手法，來反映特定的地理和空間，讓我們對地圖上所展示的某一空間有個整體的概念，換句話說，是「表達空間的主要圖形形式」。²

然而，在地圖上所表示出來的地理和空間，就一定是客觀的事實嗎？例如歐洲所通行的世界地圖，習慣把美洲大陸放在地圖的最左邊，歐洲則置於中心位置；相反，中國大陸和臺灣所出版的世界地圖，則慣性把東亞地區放在地圖的中間偏左，美洲大陸則移到最右。這兩種地圖會否影響兩個地區的人對世界的思考和想像？另外，在地圖上利用不同的顏色來表達不同的政治實體是常見的手法，而可能最讓臺灣人關切的是，不同國家所出版的地圖，

1 Britannica Online Encyclopedia, <http://www.britannica.com/EBchecked/topic/363506/map> (檢索日期：2013年1月6日)。

2 林天人，〈地圖：權力的視野、想像的空間〉，《故宮文物月刊》304期（2008，臺北），頁10。

會否用顏色來表達臺灣作為獨立政治單位的事實，還是把它放在和中國大陸同一個色塊當中？釣魚台又屬於那一國的顏色？同樣，利用不同的投影法，是可以改變各大陸的大小的。如非洲大陸在通行的投影法下，所表現出來的大小比例，是比它的實際面積要小。

所以，地圖必然是反映製圖者內心的空間觀、政治觀的人工產品。擁有書寫權的製圖者，實際上是向閱讀者直接灌輸某種意識；同樣，閱讀者除了看到某空間的精確實情外，也同時接受了製圖者想要表達的「空間事實」。

因此，把地圖視為只具有反映精準的空間事實的單一功能，無疑是危險的。在今天，透過更精密的工具，我們已經能製造出相當精準的地圖，而且對世界的想像也趨向單一。以四大洋和七大洲作為世界的基本形態已為世人所公認，但製圖者依然可以透過投影法、顏色、比例、圖例和不同的標誌，向讀者灌輸一種人為建構出來的空間觀。那麼在前近代，地圖的多元功能和空間的多元想像，必然比今天更為精彩。就好像清代的台灣輿圖，除了實際功能外，它也是從中國內地的視野出發，表達一種「內中國而外夷狄」的世界觀。

回頭看看 17 世紀滿人所建的王朝—清朝，作為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王朝，也是中國最成功的一個非漢族統治的王朝。然而，它的建立不單對中國疆域和中國與內亞的關係帶來深刻的影響，也同時衝擊到在傳統中華秩序中，與中央王朝長期保持朝貢關係的東亞諸國。他們的反應如何？本文希望以一種朝鮮獨特的世界地圖—天下圖為線索，來考察 17 世紀到 19 世紀朝鮮對天下和華

夷等概念的思考。

二、天下圖介紹

天下圖是一種很特別的世界地圖。之所以特別，是因為學者很難在東亞的傳統地圖中，找到一種具有朝鮮天下圖結構的參考系譜。³換句話說，天下圖是朝鮮半島特有的世界地圖，在製作過程中則可能參考了當時可以找到的各種地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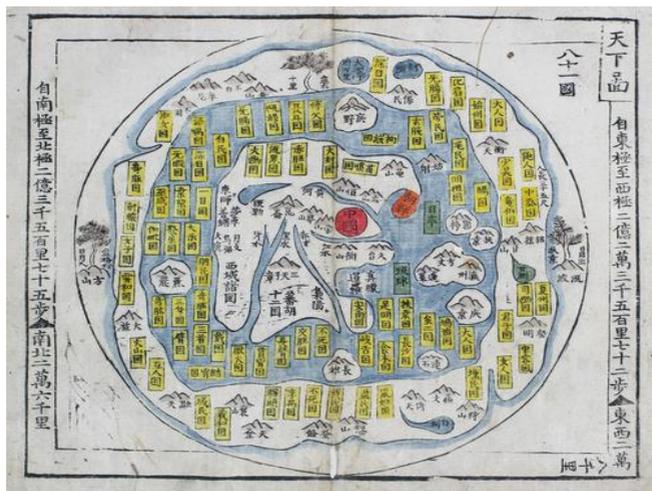
這類天下圖大多被收錄在地圖冊之中，或冠以「天下圖」、「天下總圖」、「天下諸國圖」或「四海總圖」等名。這種地圖冊除了天下圖以外，也包括中國圖（多為中原省區地圖）、日本圖、琉球圖、朝鮮八道總圖以及各道的分圖。這類地圖冊在 17 世紀晚期至 19 世紀初期間在朝鮮半島內相當流行，學者則透過考察地圖冊中朝鮮各道分圖的地名和行政區劃，推測各本地圖冊的製作時間。⁴

之所以要透過朝鮮各道分圖來推測，是因為單靠天下圖的內容，無法判斷具體的製作時間。讓我們看看天下圖的結構。天下圖是圓形的地圖，主要分成四大部分：中央有一塊大陸，中國、朝鮮、安南和西域諸國、東蕃 12 國，以及崑崙山與五嶽和幾條河流分佈其上；繼而為一圈內海，有日本、琉球、暹羅等國；外面為一環狀大陸，最外面則為另一圈外海。除了真實的地名外，大量

3 徐寧，〈古代圓形地圖研究史略〉，收入：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編，《歷史地理》（上海：世紀出版，2002），18 輯，頁 312-317。

4 徐寧，〈國圖所藏李朝朝鮮后期的圓形地圖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4 期（2002，西安），頁 146-151。

具神話色彩國名、湖澤名和山名也散佈在內海和環狀大陸之上。另外地圖的東西北極點則出現兩棵神話樹木，扶桑、盤古松和千里盤木。大多數天下圖都包含以上的結構，部分甚至有經緯網和南北極，部分外海南端有一大陸。（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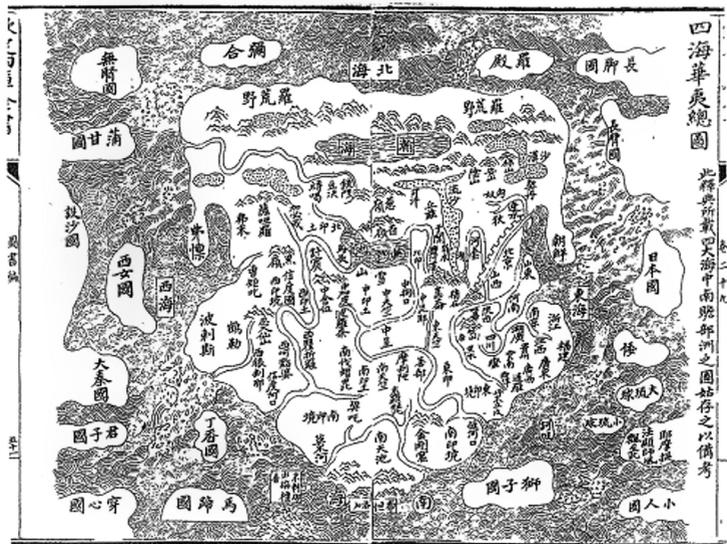


圖一：天下圖，18、19世紀，華盛頓特區：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藏。

三、朝鮮天下圖的研究回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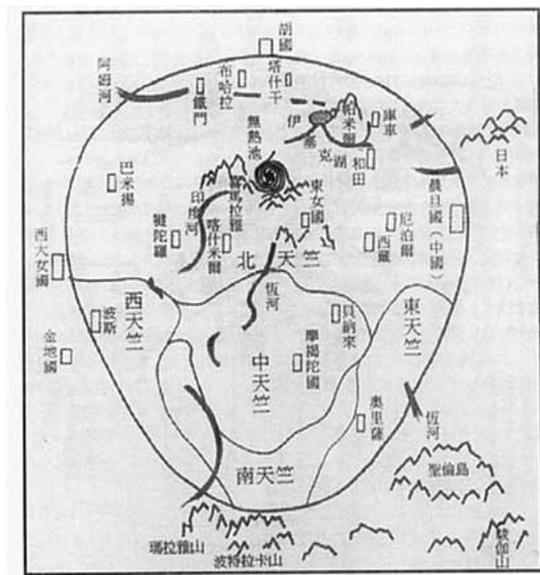
已故日本學者中村拓（1890-1974）很早就對天下圖進行考訂。他研究了十多種天下圖並進行分類，按照地圖的陸地與海洋，順次列出了194個地名（其中有重覆），並考訂出中央大陸的地名多出自於史書如《漢書·西域傳》、《舊唐書·地理志》以及《通

典》，而內海和環狀大陸的地名多源自《山海經》，因此天下圖上的地名是早在11世紀前就有的知識。中村把明朝章潢（1527-1608）《圖書編》所收的四海華夷總圖視為天下圖的前身，而天下圖則是四海華夷總圖和一些天竺地圖（如日本法隆寺藏的五天竺圖）的中間形式。也因為佛教世界觀確實曾傳到朝鮮半島，故他也推斷天下圖是參考了中國的佛教世界地圖；更推斷中國在漢朝已經製作圓型地圖，並傳到朝鮮，在印刷術有所發展後的16世紀在朝鮮半島上廣泛流行，即現行天下圖是始於16世紀。⁵



圖二：四海華夷總圖，1532，麻州：哈佛大學圖書館（Harvard Library）藏。

5 Hiroshi Nakamura, "Old Chinese World Maps Preserved by the Koreans," *Imago Mundi* 4 (1947): 3-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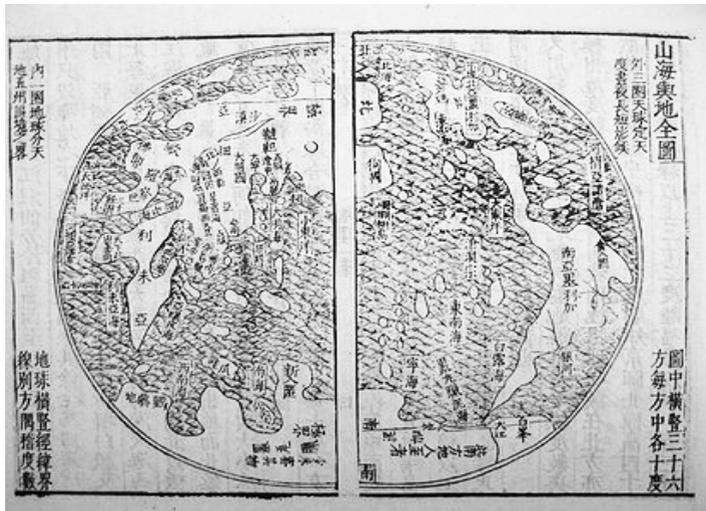
圖三：五天竺圖的線描示意簡圖。本圖引自：黃時璧，〈從地圖看歷史上中韓日“世界”觀念的差異——以朝鮮的天下圖和日本的南瞻部洲圖為主〉，《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3期（2008，上海），頁38。

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則在中村的基礎上，認為天下圖的世界觀是從中國傳入，為一種佛教和道教的混合物，並結合崑崙山中心說。這種宗教寰宇觀無疑最先是從印度傳入，在中國的代表為四海華夷總圖。然而這種寰宇觀在中國卻被視為「不可盡信」。⁶

另一位日本學者海野隆一考訂了中村尚未找到出處的幾個地

6 李約瑟原著，柯林羅南改編，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譯，《中國科學文明史》（上海：世紀出版，2002），卷2，頁297-298；李約瑟著，陳立夫譯，《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節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76），卷6，頁24-25，皆譯自：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565-568.

名，如「廣桑山」、「麗農山」和「廣野山」，以及「天地心」。他認為是出自唐代的《洞天福嶽瀆名山記》，故海野認為天下圖是以道教思想為基礎，受四海華夷總圖和利瑪竇的西方地圖影響。他也透過比照中國三才圖會中，記載變形的利瑪竇式地圖山海輿地全圖（圖四），認為天下圖是 17、18 世紀朝鮮實學者一方面以西學批判儒學，另一方面又批評西學的態度下的產物，是東方思想和西方地圖學的混合物。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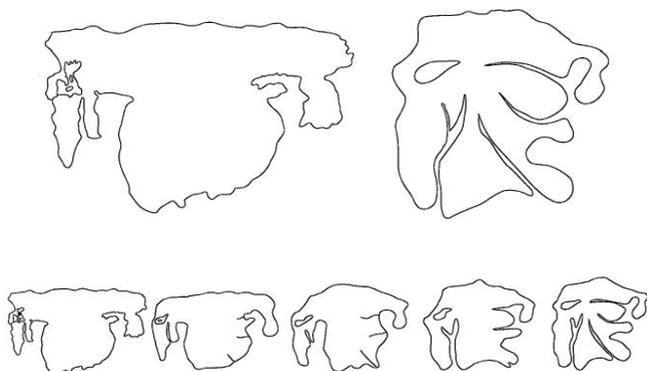


圖四：山海輿地全圖，1607，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亞洲圖書館 (Asian Library in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藏。

韓裔學者雷狄亞德 (Gari Ledyard) 同意《山海經》是天下圖的主要內容，而且很多地名也是固定在地圖某處，結構沒有太大的變化。他利用中村的研究，把《山海經》的地理方位和天下圖的方位進行比對，發現〈海內經〉與中央大陸、〈海外經〉與內海、

⁷ 關於海野隆一的研究，參考：徐寧，〈古代圓形地圖研究史略〉，載於：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編，《歷史地理》，18輯，頁 312-317。

〈大荒經〉與環狀大陸之間有所聯繫。另外，他認為中央大陸的形狀是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的變形（混一圖的天理版本是 16 世紀的作品，故合乎天下圖誕生的時期，見圖五），是傳統地理思想和科學製圖學的結合，為實學派的地圖。他不同意中村的佛教思想說，因為他認為天下圖地名多源自《山海經》，而跟佛教有關的地名只有天台山，另外把天下圖視為佛教地圖也和儒教大盛的朝鮮時代不相符。⁸



圖五：雷狄亞德繪製的對照圖。他認為《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的大陸與天下圖的中央大陸之間有著某種變形關係。本圖引自：Gari Ledyard, *Korean Cartography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2 Book 2, 265.

韓國學者金良善認為天下圖和鄒衍思想有關，特別是「中國四方之海，是號裨海，其外有大陸環之，大陸外又有大瀛海環之，方是地涯云」。⁹ 他亦指出自 15、16 世紀起開始有地圖被冠以「天

8 Gari Ledyard, *Korean Cartography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2 Book 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256-267.

9 金良善，《梅山國學散稿》（首爾：崇田大學博物館，1972），頁 217，轉引自徐寧，〈古代圓形地圖研究史略〉，收入：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編，《歷史地理》，18 輯，頁 314。

下」之名，推測天下圖可上溯至那個時代。但雷狄亞德則反駁指出，《史記》中的鄒衍大九洲思想並非如此，上述文句實際出自朝鮮時期魏伯珪《寰瀛志》一書，且魏伯珪所處正值天下圖盛行的時代，不排除是他先看到現成的天下圖，再以此解釋鄒衍的思想。¹⁰

韓國學者李燦同意傳世天下圖皆為 17 世紀後的作品，但其源流可追溯至李朝前期。他留意到有些天下圖繪有經緯網和南北極，認為是傳統圓形世界觀和西方製圖學的結合。他不同意中村的中國導入說，因為在中國未找到類似的圓形地圖。而海野所提到的四海華夷總圖和利瑪竇的西方地圖又與天下圖相差甚遠，故他傾向同意金良善所提的鄒衍世界觀和天下圖之間的關係，但也不否認製作期間可能參考了上述兩種地圖。至於傳統的圓形世界觀則可能和高麗時期尹誦所繪、以佛教思想為基礎的五天竺國圖有關。

中國學者方面，徐寧曾分析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一張天下圖。他不同意因為天下圖的中央大陸被大海包圍，就只把它單獨聯繫到佛教世界觀（如中村）或西方地圖的影響。另一方面，他認為上面提到的「鄒衍世界觀」是經過朝鮮詮釋，朝鮮人也利用這種世界觀對他們看到的中國式的利瑪竇地圖進行改造，並且找到了天下和西方世界的契合點。他所分析的地圖雖具有經緯網和南北極，但天下圖的基本結構並沒有改動。他同意海野的說法，認為朝鮮實學派一方面借吸收西學來抗衡儒學，一方面又把西學本土化，從中國古文獻中找相應證據並說成是「自古有之」，進

¹⁰ Gari Ledyard, *Korean Cartography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2 Book 2, 260, 263-264. 李燦著，Kim Sarah 英譯，山田正浩、佐佐木史郎等譯，《韓國の古地圖》（首爾：汎友社，2005），頁 357-361。

而利用當時可利用的一切地圖——不論是佛教地圖、西方地圖，混雜各種學說，製成天下圖。另外，他也強調天下圖的中心應該在崑崙山，以抗衡中國中心論。¹¹ 另一位中國學者黃時鑒則認為朝鮮圓形地圖是基於渾天說和相關的道教論述，又包容了西方地圓說而成的。其一是因為部分天下圖外有八邊形的框架，當與道教的八卦有聯繫（圖六）。

其二是部分天下圖有文句註解，所引的文句和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中的文句文義相同，故他認為朝鮮天下圖是繼承了中國天下觀後所建構出來的一種「既舊又新」、「既實又虛」的世界。¹²

近來韓國學者林宗台觀察到，利瑪竇地圖與中國改良版的西方地圖引入朝鮮之後，便引起了朝鮮士人的興趣。在這樣的需求之下，半島內曾一度充斥大量土製「利瑪竇地圖」，這些都可從士人文集中印證。故他認為天下圖的出現是受西方地圖的啟發（不論是出於抗衡還是改造），且製圖上大多結合了東方的世界觀。他還舉了一張魏伯珪畫的利瑪竇天下圖（圖七），證明天下圖是土製利瑪竇世界地圖的變種。利瑪竇也同時被朝鮮士人想像為曾遊歷五大洲的旅者，又是提出九大洲說的鄒衍的追隨者。甚至可以說，透過觀察真實的西方世界地圖，部分士人把西方的地理知識融合到提出九大洲說的鄒衍思想當中。¹³

11 徐寧，〈國圖所藏李朝朝鮮后期的圓形地圖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4期，頁146-151。

12 黃時鑒，〈從地圖看歷史上中韓日“世界”觀念的差異——以朝鮮的天下圖和日本的南瞻部洲圖為主〉，《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3期，頁30-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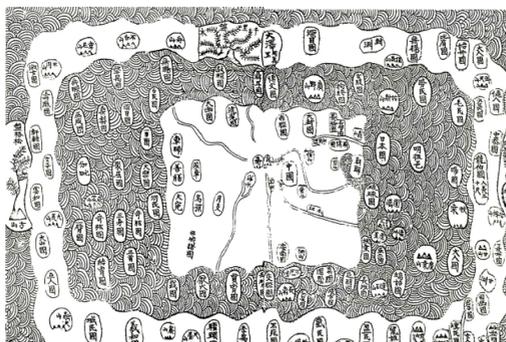
13 Lim Jongtae, “Matteo Ricci’s World Maps in Late Joseon Dynasty,” *The Korean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33:2 (2011):277-296.



圖六：有八邊形外框的天下圖，17世紀，大邱：嶺南大學圖書館藏。

另一位韓國學者吳尚學（오상학，英譯 Oh Sang-Hak）注意到天下圖在 17 世紀後期出現是有特別因素的，一是官方放寬了民間的地圖刊印和私藏，二是西學從中國的傳入。後者擴大了朝鮮人對世界範圍的認識，他們試圖從古代經典中尋找打破中國華夷疆域的局限、記錄未知世界與人跡以外大世界觀的文獻資料。而因此，具有完整大世界結構和各國方位的《山海經》，成為了他們的主要材料。同時，作者認為圓形地圖所反映的並非圓形世界觀。相反，朝鮮並沒有打破天圓地方的傳統思想，圓框所表達的實為「渾天觀」，是把傳統天、地、人同時表達在畫紙上（圖八）。若認為地圖只反映圓形世界觀，則是忽略了傳統對「三才」宇宙觀的想像。另外，在不違反「天圓地方」和「中國中心」的儒家思想下，道家的神仙思想也融入地圖之中，如一些仙山和神木。故天下圖並非單純的地圖，實質是反映朝鮮晚期的宇宙觀。¹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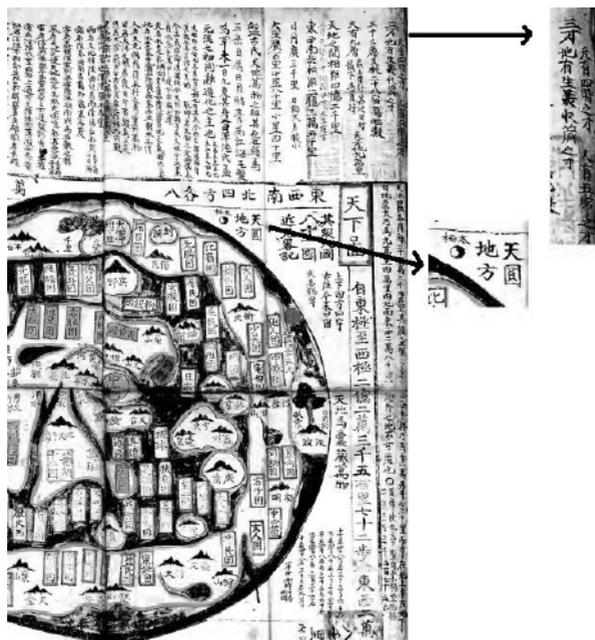
14 Oh Sang-Hak, "Circular world maps of the Joseon Dynasty: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Worldview," *Korea Journal* 48:1 (2008):8-45.



圖七：魏伯珪《存齋全書》所載的利瑪竇天下圖。本圖引自：朴成勳，《韓國三才圖會》(서울: 시공사, 2002)。

綜合上述諸位學者的意見，天下圖之所以出現於 17 世紀的地圖，主要是因為官方對民間印藏地圖禁令的鬆弛，以及西學的傳入所致。有學者認為天下圖是由中國或日本傳入，但兩國都沒有相關結構的地圖流傳。另外也排除了佛教地圖說，因為天下圖無論在結構上還是各國方位上，都和四海華夷總圖有異，佛教聖地也不在圖上，更莫論朝鮮官方是以儒教立國。

在上述情況下，那麼它就是直接參考了《山海經》中所描述的世界結構。學者大多同意西方地圖傳入朝鮮後，朝鮮士人對世界範圍的認知的確有所擴大。不論是出於抗衡還是融合，知識分子都習慣從古書中尋找那些能突破傳統中國華夷地理觀的文獻，來理解西方的五大洲世界地圖。《山海經》和道教經典正是超越了狹小的華夷世界，論及人跡罕至的地方，而成為天下圖的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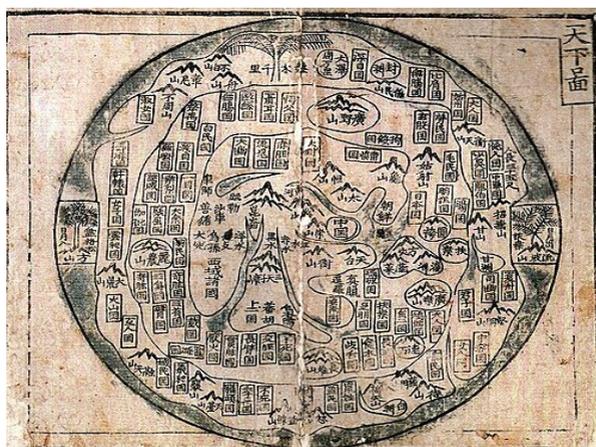


圖八：此張天下圖的文句註解中有「三才」和「天圓地方」的文眼。本圖引自：李燦著，Kim Sarah 英譯，山田正浩、佐佐木史郎等譯，《韓國の古地圖》，頁 166。

關於天下圖和鄒衍的聯繫，無疑把它視為是朝鮮士人在看到繪有五大洲的西方地圖後，從中國古書中把它托古為鄒衍九大洲說，會比較恰當，否則很難解釋為何朝鮮記載的鄒衍世界觀和《史記》中的紀錄有那麼大的差異。

至於圓形的世界想像，更確切來說，這是一種宇宙觀的表達。其中一張天下圖所印的註解，就有「三才」和「天圓地方」的文眼。（圖八）即天下圖實際上並無超越「天圓地方」的地理觀，圓形

所表的是「渾天」的原理。讀者應注意到地圖的端點有三棵神木，其實就是地理的邊界，是日月出入的地方。更進一步來說，一張印有星宿的天下圖就是最好的證明，星宿是印在圓圈之內，正好反映圓形的作用是表天，是「三才」秩序的具體表現（圖九）。另有學者認為西方地圖的傳入打破了中國中心觀，惟在視覺上，中國無疑被置於較崑崙山更為中心的位置。



圖九：印有星宿的天下圖。本圖引自：Oh Sang-Hak, "Circular world maps of the Joseon Dynasty: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Worldview," *Korea Journal*:34.

四、天下觀、華夷秩序與《山海經》

上述研究，似乎已經清晰闡明天下圖的背景和內容。然而，「子不語怪力亂神」¹⁵、「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¹⁶，《山海經》

15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論語正義》（武英殿十三經注疏本），卷7，〈述而〉，頁8。

16 〔清〕王先謙注，《莊子集解》（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內篇，〈齊物論第二〉，頁6。

既不是儒家經典，何以會成為天下圖對世界想像的主要材料？

吳尚學認為《山海經》既突破了傳統狹小的中國華夷天下觀，連人跡罕至的地方也記錄下來，可以用來融合西方五大洲的地理觀；另一方面，它又有完整的世界結構。¹⁷然而，如下所述，同樣面對西方地圖的傳入，中日兩地卻有不同於朝鮮半島的反應。既然傳教士東來，西方地圖和知識傳入了東亞，而且在士大夫之間流傳，那麼就不得不承認東亞以外的「未知世界」的確存在，萬國時代要來臨了，這是不能無視的。中國製圖者所採取的手法，就是把中國繪畫在地圖的中央，且整體面積又佔據了超過全圖的二分之一。至於傳教士所介紹的西方國家，則和其他夷狄一樣，小小的點綴在中國四周的大海之中，以示一視同仁，例如乾坤萬國全圖古今人物事跡（圖十）。在巨大的中國之下，被矮化的西方諸國和其他夷狄小邦成為了映襯天朝的他者，經緯網也不過是地圖上的裝飾品。但難道中國人不知道世界之大嗎？元朝的書籍理應有介紹 13 省以外的地理範圍。¹⁸故我們只能從思想史和天下秩序的角度去理解這種地圖，它實際上是一種「大中國而小夷狄」的思想。另外，儒家對於「天」的想像是具有道德意義的，故地圖說也不可能表現在中國地圖上，因此經緯網也顯得沒有地理學上的功能意義。

同樣，西方地圖進入日本後，也受到來自佛教的批判，以為

17 Oh Sang-Hak, "Circular world maps of the Joseon Dynasty: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Worldview," *Korea Journal*: 8-45.

18 十四世紀末至十五世紀初大明和朝鮮分別有兩張世界地圖傳世：《大明混一圖》和《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學者推測這兩張世界地圖的地理資料是繼承自元朝。相關研究可見：劉迎勝主編，《大明混一圖與混一疆理圖研究》（南京：鳳凰集團出版社，2010）。

是撼動了南瞻部洲世界觀的地位。但隨後所見如浪華子的南瞻部洲萬國掌果之圖，¹⁹ 西方的地名的確被融入到日本的佛教地圖當中，是佛教世界系統和西方地理系統的結合。更不用說的是，在鎖國前西方地圖已經傳到日本，日本也重印了大量利瑪竇式的世界地圖，可見其接受與包容外來文化的傳統。²⁰ 既然地圖是思想的載體，那麼為什麼朝鮮不學習中國和日本的態度，而去引用荒誕的《山海經》資料呢？本文覺得 17 世紀是一個關鍵的時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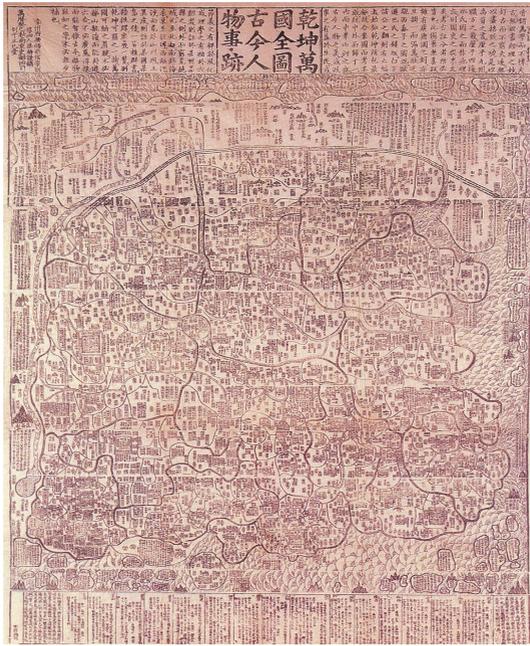
正如上文提到吳尚學的說法，經歷倭亂和胡亂後的朝鮮官方已無力禁止民間對地圖的刊印收藏。這裡提醒了筆者還可以從胡亂及其後大清入主中原對朝鮮天下觀的改變，來解讀天下圖。

17 世紀的明清交替被視為東亞一次「歷史性地殼巨變」。²¹ 朝鮮自古抱有「事大」的外交策略，文化上也表現出「慕華」傾向，加上倭亂時明神宗決意向半島派遣援兵，有「再造之恩」，是故朝鮮對明朝的崇拜意識，並非無緣無故的愛。「尊明排清」、「尊王賤霸」成為朝鮮在明清交替後的口號，蔑視「胡虜」的心態一直潛伏在朝鮮士人當中。在春秋義理之下，甚至有尊王攘夷的北伐論。崇禎年號被繼續使用，漢陽也設有祭祀明帝的大報壇。同一時間，清朝的「胡皇」卻要求漢人薙髮易服，完全顛覆了一套以中國為中心所建構的華夏文明象徵符號。

19 圖片可見：黃時鑒，〈從地圖看歷史上中韓日“世界”觀念的差異——以朝鮮的天下圖和日本的南瞻部洲圖為主〉，《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3 期，頁 30-41。

20 關於中日兩國對西方地圖的引用，可參考：黃時鑒、龔纓晏，《利馬竇世界地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21 伊東貴之，〈明清交替與王權論 - 在東亞視野中考察〉，收入：徐洪興等主編，《東亞的王權與政治思想 - 儒學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頁 79-116。



圖十：乾坤萬國全圖古今人物事跡，1593，北京：北京圖書館藏。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朝鮮雖然在丙子胡亂（1636-1637）後被迫向清朝俯首稱臣，並一直保持與清朝之間的朝貢關係。但另一方面，作為「東夷」的朝鮮卻把自己想像成一個比「中原」更為「中華」的地方，朱子之學內化到朝鮮士人的生活之中，使他們一直恪守著中華禮儀和風俗。也就是說，在「胡虜」吞併「中原」以後，朝鮮認為自己成為了中華文化的正統繼承人，產生出一種優越的「小中華主義」。我們可以看到，那些出使中國的燕行使者所作的紀錄，在明朝時被稱為《朝天錄》，但到清朝後，通通都只題

做《燕行錄》。

我們再回頭看天下圖。正如學者所研究，天下圖中央大陸的地名大多來自史書，是真實存在過的國名。但「朝鮮」和「中國」，無論在名稱還是地理範圍上，都有值得討論之處。故我認為在研究天下圖時，都不能忽略「天下觀」和「華夷秩序」等的關鍵詞。

首先是朝鮮的部分。17世紀朝鮮半島的李氏政權，無疑將國名定為「朝鮮」。但我們應該注意到，歷史上的朝鮮半島，還有三個時期是以「朝鮮」作為國名：「檀君朝鮮」、「箕子朝鮮」和「衛滿朝鮮」。李朝開國君主李成桂在建國之初，就派使者到大明請求皇帝賜予國號，當時朱元璋選了「朝鮮」，以為「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美，且其來遠，可以本其名而祖之」。²²當時不論是明太祖還是李朝君臣，所聯想到的，應該是箕子朝鮮的傳說。「天子之德，無愧於周武；殿下之德，亦豈有愧於箕子哉」²³，明太祖賜號一事，充滿了許多的暗示。箕子是孔子所稱的「殷末三仁」之一，是故當明太祖賜號後，朝鮮君臣皆設法把本朝跟箕子聯繫，塑造認同和正統性。無論在政治還是文化上，把周和明、箕子和李氏朝鮮聯繫起來，都是出於對以大明為中心的世界體系和文化體系的一種認同。經歷17世紀的明清交替後，有關箕子的暗示再次出現在朝鮮半島內。李朝被迫與清朝建立君臣關係，而箕子則再次成為「小中華主義」的重要基礎和依據。首先，箕子是中國人，

22 魚叔權，《考事撮要》（首爾：南文閣，1974年影印），引自：孫衛國，〈傳說、歷史與認同：檀君朝鮮與箕子朝鮮歷史之塑造與演變〉，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從周邊看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315。

23 鄭道傳，〈國號〉，《三峰集》，卷七，引自韓國民族文化推進黨編刊，《標點影印韓國文集叢選 第五卷》（首爾：韓國民族文化推進黨編刊，1990），頁414，轉引自：孫衛國，〈傳說、歷史與認同：檀君朝鮮與箕子朝鮮歷史之塑造與演變〉，頁316。

而且是儒家的聖人；其次，箕子是朝鮮半島最早的教化之君，是把朝鮮由「夷」變「夏」的關鍵人物。正因如此，「朝鮮之有箕子，猶周之有文武也」²⁴的思想湧現，甚至提出「夷變為夏，吾為東周」²⁵的看法。而且最重要的是，箕子「雖其封之，又不臣之」²⁶，李朝君臣把「小中華主義」的源流，追溯到箕子之世。²⁷

因此，我們大概可以知道，被儒者視為荒誕不經的《山海經》，為何可以成為天下圖的基礎材料。因為成書於戰國中期的《山海經》，就有關於「朝鮮」的記錄。雖然《山海經》論及朝鮮時，並沒有提到和箕子的相關資訊，但這毫不妨礙它被李朝儒者詮釋為箕子朝鮮，並與箕子傳說和相關的華夷暗示聯繫起來。另一方面，17世紀的李朝正好也以「朝鮮」作為國號。「朝鮮」，不單出現在《山海經》的「海內系統」中，而且是惟一存在到當代的禮儀之邦。也就是說，朝鮮與中原連綿而密切的關係，以及相較其他在《山海經》夷狄方國的荒誕記載，箕子朝鮮在當時是東方唯一由「夷」變「夏」的國家的「事實」，都可以在先秦的《山海經》中找到印證。或許精確地說，《山海經》經過17世紀的朝鮮士人重新詮釋後，直接與17世紀明清交替後的朝鮮小中華主義相聯繫。

另一條線索是中國在天下圖上的位置。中國被置於天下圖上相對中央的位置，這和《山海經》中以崑崙山作為中心的論述不

24 《箕子志》，卷8，〈洪範·學記〉，頁16a，轉引自：孫衛國，〈傳說、歷史與認同：檀君朝鮮與箕子朝鮮歷史之塑造與演變〉，頁327。

25 《箕子志》，卷6，頁13b，轉引自：孫衛國，〈傳說、歷史與認同：檀君朝鮮與箕子朝鮮歷史之塑造與演變〉，頁327。

26 李穡，〈牧隱文稿〉，卷8，〈賀竹溪安氏三子登科詩序〉，頁61，轉引自：孫衛國，〈傳說、歷史與認同：檀君朝鮮與箕子朝鮮歷史之塑造與演變〉，頁327。

27 關於李朝對箕子傳說詮釋的研究，可參考：孫衛國，〈傳說、歷史與認同：檀君朝鮮與箕子朝鮮歷史之塑造與演變〉，頁313-336。

一樣。而且在天下圖中，「中國」（有時是中原）二者都是被圈起來，或被塗成紅色，無疑是作為一個特殊區域。上文已經提過，17世紀以後，朝鮮以標榜「周禮在東」的意識，建構了一種文化上的華夷觀，把自己塑造成中華正統的繼承者。所謂「土地之昔夷而今夏」²⁸、「國家文治四百年，禮樂明備，幾乎周矣」²⁹，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

但是，傳統的華夷觀，不只是以文化作為區分指標，還包括種族和地理的因素，只有把三者相互聯繫，才是一套完整的華夷秩序。我們看到朝鮮排清的方法，都是祭出大明的旗號，或提出北伐之論。然「東僻於一隅」的朝鮮，即使承認自己的文化水平上比中原高，仍無法超越「小中華」的地位。所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朝鮮無法建構出「突破傳統把中原視為道德最高中心」，以及「天子居中國治天下」的論述。在現實政治和軍事層面上，朝鮮政權位處半島之內，即使他們相信自己在文化上已經由夷變夏，恐怕也無法透過北伐，對抗大清、自創帝業、成為中國的正統王朝。是故朝鮮一直與清朝保持君臣關係，奉明或清的正朔而沒有建元。從理念上來分析，朝鮮的行為與華夷思想內涵是：以恢復中原正道，恢復中國作為道德中心，作為李氏政權在明亡清興後依然存在的合法依據。也正因為這種17世紀後的朝鮮天下觀，方可解釋為何朝鮮一方面以文化華夷論介定自己位處於相對清朝的優越地位，一方面又堅守中國中心說，向清朝朝貢。

28 宋時烈，〈雜錄〉，《宋子大全》，卷131，轉引自民族文化推進黨編，《韓國文集叢刊》112期（1993，首爾），頁439；筆者於王元周論文注意到這份文獻，參考：王元周，〈論「朝鮮中華主義」的實與虛〉，《史學集刊》3期（2009，吉林），頁48。

29 成大中，〈送徐侍郎浩修以價之燕序〉，《青城集》，卷5，轉引自：民族文化推進黨編，《韓國文集叢刊》200期（1993，首爾），頁430；與上註同樣參考王元周的論文。

這種天下觀的兩面性正好從理念上和現實政治環境下，確保李朝政權的合法性和相對獨立性。我們還可以注意到，天下圖中的中國，並沒有標明是大清或者是大明，也反映了「中國」其實是在華夷概念底下的中原而已。它一方面有助於朝鮮在整個華夷秩序中自我定位和確認其存在的目標；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圖中的「中國」只作為一種理念而存在，為李朝的正統性提供依據。「中國」在這裡並不代表任一當今或歷史上的國家和朝廷，而是概念。

也正因為朝鮮自我界定為在整套華夷秩序下，是一個與中原最為親近但又不能取代中國的「東夷」，所以在繪畫世界地圖的時候，它不能像上文介紹的乾坤萬國全圖古今人物事跡那樣，把自己和其他蕞爾小邦一齊點綴在中原的四周。天下秩序的公式是「中華—夷狄—禽獸」，朝鮮只能依靠把一些更荒誕無稽的奇怪地名，散落在天下圖的四周，才能向讀者證明朝鮮在文化和道德上，是和其他蠻邦不一樣的。再加上《山海經》成書年代非常早，更能被朝鮮士人詮釋為：朝鮮自古就是一個和中原靠近的衣冠之國、禮儀之邦。

如果上述推論正確，利用明清交替以後所成立的朝鮮天下觀，同樣可以理解天下圖的內容和內涵。為應對西方地圖衝擊而從古書中找尋大世界觀的情況，以及「三才」宇宙觀的解讀並無抵觸，可互相參考，並進一步理解天下圖的實質意義。正如天下圖的名稱所示，這種地圖是用來表示「天下」的，它並不單純是一種表達天圓地方的世界地圖，也不會只是一張「三才」宇宙觀的示意圖，更不是一幅《山海經》插圖，而是呈現一種對世界秩序的想像與建構。是故我們從思想史的角度出發，結合 17 世紀的大時代背景來考察，必定能更深入理解天下圖所要表達的世界構想。

五、結語

本文試圖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提出以朝鮮天下觀來考察天下圖的內容，並試圖整理、歸納，推論出一些想法與發現。

首先，地圖是一種權力的展現，同時也在維護某種權力，包含政治上的權力、知識的控制和宗教的詮釋。正如上述學者的理論和我的推論都顯示，製圖者無疑是透過圖像，建構、維護和灌輸一種世界觀或世界秩序的「事實」。

第二，東亞各國都是行動主體，包括中國、日本和韓國。他們在應對各方的思想衝擊時，都會有各自的反應，而非單純跟隨中國天子的意向。這就是平勢隆郎提倡的東亞複數正統論。³⁰ 本文認為天下圖是朝鮮 17 世紀中後期的天下觀的圖像化，也表明朝鮮自有一套和中國有別的天下觀。每個政權都會為自己建構一套正當性的理論，在東亞就是所謂的「天下理論」。所以天下觀、世界觀和宇宙觀之間都存有微妙的差異。不必懷疑東亞各國都有建構以自己為中心的一套正當性理論，這是在中國官方文獻中無法看見的。但這卻會影響到中國歷史的發展，最為明顯的例子就是清末面對現代性挑戰時，中日間的互動。換句話說，如果單從中國官方文獻中所表達出來的「事實」（一種清朝統治階級的意志）來判定清朝與各國的關係，其所呈現的只會是事實的一個面相，甚至與真正的現實仍有一定的差距。

³⁰ 可參考：平勢隆郎，〈東亞冊封體制與龜趺碑〉，載於：高明士主編，《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政治法制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3），頁 17-43。

第三，正如前述，17世紀是東亞史上的關鍵年代。16世紀晚期到17世紀前期，西方人開始出現在東亞海域，他們的地理知識就隨著傳教士的東來而在東亞知識界中流傳，各國都按自身的歷史知識來理解、重新詮釋，或假託於古文獻理解他們。而另一波更重要的思想衝擊，則是17世紀中晚期的明清交替。這不是一場單純的朝代交替，而是涉及到對「中華」、「夷狄」與「正統」的思考。不用懷疑，終清一代，從北京到江戶，從漢陽到順化，各個統治階級都牽起了一場對世界秩序和中華思想的重新思考和詮釋，有學者稱之為「華夷變態」。如果說雍正帝借《大義覺迷錄》來為滿人統治的合法性辯護，那麼東亞各國都懂得利用相同的手段和知識，其基礎就是在前近代東亞世界中被視為普遍準則的儒家思想。延續第二點所論，東亞各國都有自己的一套正當性理論，如日本以其萬世一系的「神國」來把自身定義為「中華」，朝鮮亦然。那麼清朝的出現，則推動了一場「原始民族主義」運動。當乾隆皇帝依然沉醉於皇清職貢圖時，「東亞世界」內部認同已經慢慢崩解。³¹ 但我們也要有相當的警覺，即在17世紀的東亞確實存在複數「中華」，但它們是否都要對清朝統治構成威脅？是否真的要「入主中原」爭天下？

其實這並不必然。如朝鮮建大報壇的目的，與其說是真的要達到反清復明效果，不如說是要確立朝鮮內部的君臣義理。也可以說，17世紀後以清朝為中心的冊封關係變得更多姿多彩，除了因滿族人稱帝而帶來的內亞因素和個性之外，就傳統的東亞區域而言，也變得更為複雜。另外我們也能更進一步思考何謂「華夷」，

31 有關明清交替東亞三國對華夷觀的思考，參考：伊東貴之，〈明清交替與王權論：在東亞視野中考察〉，收入：徐洪興等主編，《東亞的王權與政治思想－儒學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頁79-116。

儒家學說以文化界定「華」和「夷」，似乎顯示出相當的彈性和包容；但我們也應該從另一方面思考，誰才是可以接受教化，成為文明人？誰不可以？誰才是「上帝的選民」？儒家經典經過各種有意的詮釋後，將呈現不同的面相。

最後，在討論朝鮮天下觀之後，回頭再看看東亞近代史，就能更加理解清朝以來東亞各國互動，如中朝關係、朝日關係等；也可以更精確地去理解東亞在 19 世紀面對現代化時，各國的行動與反應，以及冊封制度向現代化的轉型。特別是牽涉到三國命運的甲午戰爭，為何朝鮮儒者一方面跟日本和西方簽訂一系列條約，一方面又請求清廷介入打擊親日派，一方面批評袁世凱干涉朝鮮內政，一方面又不贊成高宗稱帝。無疑，了解東亞各國怎樣看待世界的秩序，對理解中國歷史，以及東亞特有的朝貢冊封制度，還是有一定幫助的。³²

32 關於中日韓三國在近世的天下觀，參考：劉青峰、金觀濤，〈19 世紀中日韓的天下觀及甲午戰爭的爆發〉，《思想》3 期（2006，臺北），頁 107-128。

徵引書目

史料

-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論語正義》，武英殿十三經注疏本。
〔清〕王先謙注，《莊子集解》，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

論文

- 王元周，〈華夷觀與朝鮮后期的小中華意識〉，收入：北京大學韓國學研究中心編，《韓國學論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12輯。
- 王元周，〈論「朝鮮中華主義」的實與虛〉，《史學集刊》，3期，2009，吉林。
- 平勢隆郎，〈東亞冊封體制與龜趺碑〉，收入：高明士主編，《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政治法制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3。
- 伊東貴之，〈明清交替與王權論：在東亞視野中考察〉，收入：徐洪興等主編，《東亞的王權與政治思想：儒學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
- 林天人，〈地圖 - 權力的視野：想像的空間〉，《故宮文物月刊》，304期，2008，臺北，頁10-17。
- 黃時鑾，〈從地圖看歷史上中韓日“世界”觀念的差異——以朝鮮的天下圖和日本的南瞻部洲圖為主〉，《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3期，2008，上海，頁30-41。
- 徐寧，〈國圖所藏李朝朝鮮后期的圓形地圖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4期，2002，西安。
- 徐寧，〈古代圓形地圖研究史略〉，收入：中國地理學會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編，《歷史地理》，上海：世紀出版，2002，18輯。
- 孫衛國，〈傳說、歷史與認同：檀君朝鮮與箕子朝鮮歷史之塑造與演變〉，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從周邊看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09。
- 劉青峰、金觀濤，〈19世紀中日韓的天下觀及甲午戰爭的爆發〉，《思想》，3期，2006，臺北，頁107-128。

- 裴祐晟，〈朝鮮的地圖和東亞〉，《韓國研究論叢》，2期，2009，上海。
- Jongtae, Lim. "Matteo Ricci's World Maps in Late Joseon Dynasty." *The Korean Journal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33:2 (2011): 277-296 .
- Nakamura, Hiroshi. "Old Chinese World Maps Preserved by the Koreans." *Imago Mundi* 4 (1947): 3-22.
- Oh Sang-Hak. "Circular world maps of the Joseon Dynasty: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Worldview." *Korean Journal* 48:1(2008): 8-45.

專書

- 李約瑟著，陳立夫譯，《中國之科學與文明節本》，第6冊，臺北：商務，1976，譯自：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 李約瑟原著，柯林羅南改編，上海交通大學科學史系譯，《中國科學文明史》，上海：世紀出版，2002，譯自：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 黃時鑾、龔纓晏，《利馬竇世界地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琴章泰著，韓梅譯，《韓國儒學思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
- 李燦著，Kim Sarah 英譯，山田正浩、佐佐木史郎等共譯，《韓國の古地圖》，首爾：汎友社，2005。
- 東北亞歷史財團編，《東北亞關係史性格》，首爾：東北亞歷史財團，2009。
- 韓國圖書館學研究會編，《韓國古地圖》，漢城：韓國圖書館學研究會，1977。
- Ledyard, Gari. *Korean Cartography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數位資料

- 蜜三刀的日記，《朝鮮人通過《山海經》看世界》，<http://www.douban.com/note/93610925/>。

The Korean *Cheonhado* and its World View

Chi Lok Chu *

Maps are a medium for expressing geographical awareness. In addition to displaying a cartographer's understanding of a particular space, maps also reflect alterations of the historical environment. The *Cheonhado* was a type of map that became widely popular in Korea follow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us numerous scholars have examined the content and meaning of the *Cheonhado*. Based on relevant characteristics proposed by academia,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d the ideology underlying the *Cheonhado*, which is world view. Subsequently, the *Cheonhado* and its related world view were discussed in the context of political change in East Asia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y examining the Korean *Cheonhado*, the present study found that during China's transitioning from the Ming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Korea developed an entirely new world view. The content of the *Cheonhado* suggests that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Qing Dynasty, Korean scholars ceased to view Korea as the borderland of China. They consequently developed the Sojunghwa belief, which means "Little Sinocentrism." The present study further inferred that Sojunghwa may be the origin of Korea's strong sense of nationalism.

Keywords:

Korea *Cheonhado* (天下圖, world map) world view East Asia Sojunghwa (小中華, Little Sinocentrism)

* under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金融革命與商業社會的興起： 18 世紀初期英格蘭的社會轉型 *

陳禹仲 **

本文探討 17 世紀末、18 世紀初，英格蘭從政的思想家對於財政改革的討論，並兼以探討 18 世紀初英格蘭社會產業型態的轉變，希望由這兩個脈絡重新檢視「商業社會」（Commercial Society），這個過往為經濟與社會史家所重視的歷史現象。本文試圖指出，包含英格蘭 17 世紀末的金融革命（Financial Revolution），乃至於至 18 世紀末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成為一門獨立的學門等歷史現象，其實都與時人對於其自身的社會正在經歷更為商業化的轉變有關。金融革命並不僅是財政經濟的改革，同時也反映當時從政的英格蘭人對於社會型態已然轉變的認知，而此認知則又與商業和貿易逐漸成為社會的核心經濟活動有關。

關鍵字：金融革命 商業社會 商業 英格蘭銀行 政治算數

2013 年 2 月收稿，2013 年 5 月通過刊登。

* 致謝辭：本文脫胎於筆者的學士論文，由陳慧宏老師指導，並於 2013 年 12 月「第 38 期《史繹》成果發表會」宣讀。筆者感謝慧宏老師的指導，及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的意見，但本文所有問題由筆者自負。

**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97 級生，現為倫敦大學瑪麗皇后學院政治思想史與思想史碩士生。

- 一、 前言
- 二、 17 世紀末英格蘭的金融革命
- 三、 政治算數與財政政策
- 四、 服飾、出版與商業社會
- 五、 結語

一、 前言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檢視 17 世紀末、18 世紀初的英格蘭人，對於商業逐漸在當時英格蘭社會成為主要經濟生產方式的態度。近年來的研究成果已然指出，與內戰時期相比，英格蘭的商業活動在此時期有著可觀的進展。本文嘗試藉由探討時人對此一社會變遷所做的評論，以管窺時人面對此社會變遷的心態。

自 17、18 世紀開始，歐洲的社會型態逐漸有了轉變。隨著商業的漸次發展，歐洲的社會活動與文化也開始有不同的面貌。18 世紀的一些思想家們用「商業社會」（commercial society）來稱呼這個不同型態的社會。¹但在直接使用這個稱法時，或許會形成某種誤解。人類並非到了 17、18 世紀才開始有商業和貿易出現，以商業作為主要生產活動的政治社會也絕非到 17、18 世紀才出現。

1 討論 17、18 世紀歐洲新社會型態的著作繁多，諸如：John G.A. Pocock,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Maurice M. Goldsmith, *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t: Bernard Mandeville'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Istvan Hont and Michael Ignatieff ed., *Wealth & Virtue: 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David Armitage,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舉例來說，西元前 5、6 世紀的雅典（Athen）與 13、14 世紀的威尼斯共和國（Republic of Venice），皆不僅僅是今人所熟知，同時也是 17、18 世紀思想社群極其熟稔、以商業為主的政治社會。既然商業為主的政治社會不是僅始於 17、18 世紀，那麼，顯然要以商業社會一詞來特指此時在歐洲所出現的特殊社會型態，需要更多的理由。

今日的史學家們認為 17、18 世紀的歐洲，有一個新的社會型態，即商業社會的出現，而且這並不是一種後設、線性史觀強加於歷史之上的觀點。他們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看法，是基於有關 17、18 世紀歐洲的社會、文化、思想、政治等等諸多層面的研究，而建立的共識。商業社會一詞，是 18 世紀中晚期開始，時人用來指稱自己所身處的社會。而最早使用商業社會這個詞彙的人，或許正是被今人視為經濟學之父的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他認為，當一個社會有了完善的勞力分工，社會中的每個人都必須仰賴交易來滿足自己的需求，貿易不再被商人壟斷，而是人人都成為進行貿易行為的商人時，這個社會就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商業社會。² 這是史密斯對商業社會的認定標準，而今日的歷史學者對商業社會的解釋，往往是依著史密斯的說法而來。

史學家丹尼斯·拉斯穆森（Dennis Rasmussen）在他的著作中，以史密斯的論述為基礎，對商業社會有更為詳盡的補充。拉斯穆森在 *The Problems and Promise of Commercial Society: Adam Smith's Response to Rousseau*（商業社會的問題與前景）裡寫道，商業社會是一個「勞力分工廣泛，也因此（人們在其中）高度地相互依存，

²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 R. H. Campbell and A. S. Skinner, vol. 1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1), 37.

既能保護財產權，亦有明文的法制，並且在社會、經濟、地理、職業上都有高度能動性」的社會。至於那些並未稱爲商業社會的政治社會，拉斯穆森認爲，這並不表示這些地方的人們沒有任何的商業活動，只是這些商業社會在社會、經濟等層面的流動性較差，人們的相互依存關係較低，往往也沒有那麼廣泛的勞力分工機制。³ 換句話說，以「商業社會」來稱呼某些特定社會時，並非表示商業只存在於這些社會裡，而是因爲這些社會的運作高度仰賴人們彼此的貿易行爲。人們在社會經濟層面的流動性較高，也更依賴貿易來滿足自己的生活。商業社會因此是一種不同於以往，新的社會型態。最後，更值得一提的是，商業社會往往被視爲今日資本主義社會的胚型。⁴

歷史學家們認爲，在歐洲，商業社會自 17 世紀開始漸漸興起，而綜觀整個 17 世紀，世紀初的荷蘭共和國 (The Dutch Republic) 與世紀末的英格蘭，⁵ 前後成爲商業社會的表徵；兩國各在世紀初與世紀末，輪流執歐洲經濟牛耳，成爲經濟霸權。⁶ 這兩國在 17 世

3 Dennis Rasmussen, *The Problems and Promise of Commercial Society: Adam Smith's Response to Rousseau*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3.

4 "...an extensive division of labor and hence a high degree of interdependence, the protection of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a good deal of social, economic, geographic, and occupational mobility."

4 除了拉斯穆森之外，有不少學者均有這樣的看法，以下僅舉幾本著作爲例：Louis Dumont, *From Mandeville to Marx: The Genesis and Triumph of Economic Ide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David McNally,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A Reinterpre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Joseph A.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 Democracy* (London: Routledge, 1994).

5 英格蘭 (England) 一詞當是不夠精確，畢竟在本文所書寫的時間裡，英格蘭與蘇格蘭在 1707 年已然合併；然而，本文在此所用的英格蘭一詞，當採基斯·托馬斯 (Keith Thomas) 的定義。其以「在不列顛群島的各地，有著對英格蘭生活方式有高度喜好的一群人」來界定英格蘭與英格蘭人，本文亦是如此。Keith Thomas, *The Ends of Life: Roads to Fulfilmen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3. "In each part of the British Isles there were groups who had close affinities with English life..."

6 Steve Pincus, *1688: The First Modern R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49-90.

紀前後的經濟表現，在被稱為「危機的世紀」（The Age of Crisis）的 17 世紀裡，更為突顯。⁷

17 世紀的歐洲，因為社會、經濟與政治的衰頹與動亂，被歷史學家們以「17 世紀的危機」（The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相稱。⁸ 然而，在這個歐洲普遍陷入低迷的世紀裡，荷蘭與英格蘭仍舊分別在經濟上有著長足的發展。他們的發展與兩國商業貿易的興盛有關，也因此，荷蘭與英格蘭被視為商業社會在 17 世紀歐洲興起的兩個代表，分別在 17 世紀前後，扮演歐洲市場經濟的要角。但荷蘭由於直接參與包括三十年戰爭、反法聯盟與對抗法國路易十四的大規模軍事衝突，經濟發展也連帶受到波及。是以，到了 18 世紀前半，荷蘭的經濟與其黃金時期相比，已顯衰頹。⁹ 與荷蘭相反，英格蘭的經濟隨著國內政局逐步穩定，在 18 世紀有更為蓬勃的發展。對某些史學家而言，這段期間的經濟發展，甚至成為之後所謂「工業革命」的基礎。¹⁰ 本文所要聚焦討論的，正是 17 世紀末到 18 世紀初，英格蘭商業社會逐步興起的過程。

7 「危機的世紀」借自史家揚·德·伏萊（Jan de Vries）一本研究 17 世紀歐洲經濟危機的書名。伏萊在書中認為，17 世紀歐洲有一場全面性的經濟危機，而此危機與社會動盪極其相關。見：Jan de Vries, *Economy of Europe in an Age of Crisis, 1600-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8 關於 17 世紀危機的討論，詳見：E.J. Hobsbawm, “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in the 17th Century,” *Past & Present*, 5 (May, 1954): 33-53; E.J. Hobsbawm, “The Crisis of the 17th Century - II,” *Past & Present*, 6 (Nov., 1954): 44-65; Trevor Aston ed., *Crisis in Europe, 1560 - 1660: Essays from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Routledge, 1970); Geoffrey Parker, *Europe in Crisis, 1558-1648* (Oxford: Blackwell, 2011).

9 Jan de Vries and Ad van der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1500-181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681-683.

10 經濟史家針對這個論述有不少辯論，可見：David Cannadine, “The Present and the Past in the Engl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1880-1980,” *Past & Present*, 103 (May, 1984): 131-172; Jan de Vrie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 Author,”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4:2 (Jun, 1994): 249-70.

本文將分別從兩個脈絡來探討商業在 18 世紀英格蘭逐漸興盛的過程。在第一個脈絡裡，本文將聚焦討論英格蘭政府在 17 世紀末的財政改革，以及當時政壇流行的政策論述。自此兩點，討論商業的發展，與英格蘭的政治政策與政府組織改革之間的關聯。本文欲藉此指出，自 17 世紀末開始，英格蘭政府與從政的思想家們，已然察覺到商業的重要性，並且認為，改革既有的政府組織，使之與逐步興盛的商業同步，將有助益於整體政治社會的發展。這種態度的改變，反應在他們具體的財政變革上。本文第二個脈絡則將討論新型態產業，如服飾與印刷出版的蓬勃發展，並兼以時人對此類新型態產業的觀察與書寫，指出在 18 世紀的英格蘭，除了從政之人的財政政策考量外，即便就 18 世紀初的社會大眾而言，他們也正逐步體會到商業的重要。兩者並觀則可以發現，對當時的英格蘭人而言，他們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正處於一個與過往不同的社會型態中。

在此必須指出，歷史學者往往將金融革命放置在英格蘭政治、經濟史的視野中討論，而商業社會的興起則是屬於社會文化，乃至於思想文化史所處理的主題。就後設的眼光觀之，在政府組織的改革與消費文化逐漸興起之間，或許可能存在著不協調的圖像。在此姑且不論今日「政治－社會」的區野，對當時的英格蘭人而言是否有意義；¹¹ 就當時的英格蘭人而言，金融革命與商業社會同

11 筆者認為，對 17、18 世紀之交的英格蘭思想家而言，政治與社會並沒有明確的界線。以霍布斯 (Thomas Hobbes, 1588 - 1679) 為例，其筆下的人類開始集體生活，即組成社會的同時，他們也同時建立了一個政治共同體。政治與社會因此無法明確切割。再以洛克 (John Locke, 1632 - 1704) 為例，洛克認為，人類唯有進入一個「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 方能有文明發展。事實上，「政治社會」這樣的辭彙或許就表示，時人並沒有明確區分政治與社會。曼德維爾為此提供最直白的例子：“... by society I understand a body politic”，見：Thomas Hobbes, *Leviathan*, ed. John Gask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11-115; John Locke, “The Second Treatise of Government: An Essay Concerning the True Original, Extent, and End of Civil Government,”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ed. Peter Lasle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330-349; and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ed. F. B. Kaye vol. 1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8), 347.

時存在於英格蘭這樣一個政治社會之中。再者，就理論層面而言，筆者認為社會本身同時並存著諸多不盡協調、甚至彼此衝突的圖像符號，而這並不影響一個社會的存在。¹² 本文並未試圖將兩者調合，做為一個連貫且有因果關係的歷史事件來討論。相反地，本文可被視為兩起案例研究。藉由金融革命這個政府組織的改革，以及商業社會這個社會文化面向的發展，強調當時人對於商業逐漸興起的觀察。兩者或許極端不協調，但這並不妨礙本文的論旨，即此時的英格蘭人，就政治與社會文化層面而言，意識到其所身處的社會，因為商業逐漸興起，而與過往有所不同。事實上，就時人對商業重要性的體會觀之，兩者沒有不協調的圖像存在。

二、 17 世紀末英格蘭的金融革命

近年來，學者在研究英格蘭近現代歷史時，關注英格蘭在 17 世紀末、18 世紀初，於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上，逐漸出現不同於之前的面貌。探討英格蘭經濟史的學者以「金融革命」（Financial Revolution）來稱呼這個現象。金融革命成為英格蘭歷史發展的一個過渡，其後英格蘭成為號稱日不落國的全球經濟霸權、即人們所熟知的「大英帝國」（the Great Britain or the British Empire）。

彼得·狄克森（Peter G. M. Dickson）的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英格蘭的金融革命），是關於這個課題，最具代表性的研究之一。他認為，英格蘭之所以會在這段期間興起一場金融革

12 在此筆者接受 Pierre Bourdieu 的論述：一個和諧一致的行為與文化圖像，唯有在一個強大的機構力主這麼一個圖像存在的前提下，方可實現。然而，如此的機構並無法全然主導社會的多重文化圖像。一個社會因此可以有著諸多不協調的圖像並存，然而，這些圖像仍然共享且共存於一個社會之中。認為必須在不和諧間尋求和諧與一致，不僅僅是藉由統治者的符號權力（symbolic power）視野觀察社會，同時也是一段歷史消簡化歷史的過程。見：Pierre Bourdieu, *Language & Symbolic Power*, ed. John B. Thompson, Trans. Gino Raymond and Matthew Adamson (Cambridge: Polity, 1991), 107-116; Pierre Bourdieu, *Pascalian Meditations*,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164-205.

命，其根本原因是因為英格蘭此時的經濟有長足的發展。經濟蓬勃與長程貿易的興盛息息相關，而此經濟榮景，一方面需要新的政治金融組織來規範秩序，另一方面，也為這種組織的設立提供社會基礎。無論如何，金融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經濟發展有所突破，民眾所得連帶提升了消費力，長程貿易同時帶來金融經濟與期貨貿易、資金投資等新的貿易行為，成為英格蘭最主要的經濟活動。凡此種種皆需要新的政治制度來規範。金融革命正是在這個脈絡下發生。¹³

1990 年代左右的英格蘭經濟史家，多數認同狄克森的論旨，即金融革命是一場由市場經濟所引發的政治經濟革命。¹⁴ 姑且不論史家對這個定義的相關辯論，與歷史斷代分期上的困擾，史家們會使用金融革命這樣的辭彙，最主要還是因為他們發現，這段期間的英格蘭在經濟與政治上有了新的發展。而最能代表此一金融革命精神的，莫過於 1694 年所設置的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英格蘭銀行的設立，代表英格蘭在政治與經濟型態上，第一次出現獨立的金融組織。這意味著英格蘭市場經濟漸趨成熟，儘管其設立目的乃是為政府財政紓困。

同樣在 90 年代，經濟史家布魯斯·卡魯瑟（Bruce G. Carruthers）提出了另一種詮釋金融革命的觀點。他認為，以狄克森的著作為代表，經濟史家對金融革命的討論固然有理，但他以為，

13 Peter G.M. Dickson,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redit, 1688-1756* (Hampshire: Gregg Revivals, 1993).

14 相關論著，見：Peter G.M. Dickson,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John Brewer,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London: Unwin Hyman, 1989); Henry Roseveare,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1660-1760* (Essex: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1991).

金融革命不只是政府因應經濟發展而做的改變，而是一個時代中政府與社會相互牽引的歷史現象，不能僅以「起因－反應」式的歷史語言來說明。他的研究援引經濟史家約翰·布魯爾（John Brewer）的論點。布魯爾探討 17 世紀末英格蘭政府的轉變，以有效應用逐漸轉化的社會經濟資源，並成為一個類似現代的國家體系。他在 *The Sinews of Power*（權力的砥柱）一書中指出，英格蘭之所以在 18 世紀開始，逐漸成為歐洲政治、軍事權力的代表，甚至在 19 世紀成就全球性帝國的威勢，其實與英格蘭在 18 世紀的財政改革息息相關。他認為，17 世紀末以降的市場經濟發展，為英格蘭財政改革提供了有效的社會資源，也使得英格蘭得以在 18 世紀初改變為具有現代國家色彩的「財政－軍政國家」（fiscal-military state）。這讓政府得以更有效率地應用社會的經濟資源，也使得政府與社會有更為緊密的連結。¹⁵

卡魯瑟同意布魯爾所言，金融革命使英格蘭發展為具現代國家雛形的「財政－軍政國家」，但他對此做了補充。他表示，金融革命的結構複雜，經濟發展固然使政府必須有所因應，但政府的因應措施卻也更進一步地促成經濟型態的改革。是以，唯有釐清金融革命時期，政府施政與市場經濟的互動關係，才能為英格蘭如何發展為「財政－軍政國家」，並進而成為全球經濟霸權，提供完整的歷史解釋。¹⁶ 無論如何，17、18 世紀之交英格蘭，因為商業貿易發達帶動市場經濟發展，以致於有過一場政治經濟體質的轉變，是史家們的共識。

15 John Brewer, *The Sinews of Power*, 23-180.

16 Bruce G. Carruthers, *City of Capital: Politics and Markets in the English Financial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卡魯瑟認為，從 17 世紀末到 18 世紀之間，英格蘭經歷了兩次重要的財政體制改革。¹⁷ 而這兩次的改革，固然可以視為政府因應新的社會型態所做的反應，是政府思考如何在以商業為核心的經濟活動裡，有效率地收取稅收、擴展收入來源的結果。然而，正如卡魯瑟所言，他認為這不僅僅是簡單的「起因－反應」而已。他指出，事實上，這些改革不只使政府能更有效應用社會的經濟資源，社會的經濟活動也由於政府的介入，有了可靠的體制規範可循，因此比過往更為活躍。¹⁸ 藉由討論這段期間的財政改革，當可更明白英格蘭當時的政府施政，如何反應社會變遷。並能更進一步了解，17 世紀末從政思想的論述背景。

誠如卡魯瑟的研究所陳，英格蘭原本的財政收入仰賴兩種來源：稅收與借款。前者由政府以類似包稅制的方式實行，後者則在政府需錢孔急時，向民間借款。布魯瑟指出，前者仰賴土地稅，但一旦應用到商業稅入時，便顯得效率不彰；因為無法有效衡量商業資產。收稅於是成為一個漫長且疏漏百出的過程。如政府在 1671 年開始，為了備戰第三次英荷戰爭，向國會提出的增稅請求獲准後，直到 1687 年才將該年稅入收整完畢；而這場戰爭在 13 年前就已結束。由於稅收成效頗低，英格蘭政府的收入來源開始逐漸仰賴借款。但借款則有另一個問題，即當時英格蘭並沒有長期借款的觀念，其借款往往是短線操作。¹⁹

當時英格蘭的借貸方式如下：政府因為財政需求急迫，向民間借款，由於一般人民並未能大額借款給政府，因此，政府的借

17 Bruce G. Carruthers, *City of Capital*, 53-91.

18 Bruce G. Carruthers, *City of Capital*, 13-26, 115-160.

19 Bruce G. Carruthers, *City of Capital*, 56-61.

款對象主要是貴金屬工匠、貴金屬商販、資金貿易商等，被稱之為「金匠銀行家」（goldsmith bankers）且身負較多資產的民眾。當然，這些人本身也未必有足夠的資產借與政府，他們因此往往向其他人民小額借款，積聚一定數額後再轉借給政府。他們成為政府與民間借貸關係的中間人，並從金錢往來中謀取暴利。這麼一來，英格蘭政府財政在一定程度上，便掌握在這些「金匠銀行家」手中。當時的英格蘭政府也清楚這個狀況，並展開初步的財政改革。

改革的第一步自財政部與國庫（Treasury）開始。國庫是政府財政的核心，但充實國庫的行政，如處理稅收與借款等事宜，則皆由財政部負責。一般認為，這波財政改革，由1667年，任命喬治·唐寧爵士（Sir George Downing, 1623-1684）為國庫秘書（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開始。

唐寧爵士的改革，以模仿荷蘭的財政制度為目標。當時的歐洲人認為，荷蘭既是共和政體，又有繁榮的經濟水平，因此被視為理想國家的典範。²⁰ 英格蘭的經濟與荷蘭相比，不免相形見绌。對唐寧爵士等參與財政改革的官員來說，經濟的繁榮與否，和財政制度息息相關。英格蘭經濟不若荷蘭，與英格蘭政府財政不彰相互印證。其中一個例子便是，荷蘭政府向民間借款時，只需要承擔4%的利息，而英格蘭卻要承擔12%。過高的利息，使政府無法在限期內還清債務，因此只得繼續借款償還前債。這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後續的借款也無法有效應用在國務。至於民間，由於

20 Erik S. Reinert, "Emulating Success: Contemporary Views of the Dutch Economy before 1800," in Oscar Gelderblom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Dutch Republic* (Burlington: Ashgate, 2009), 19-41.

無法在限期內取回借出的款項，資金緊縮的情形所在多有。²¹

唐寧爵士的財政改革從管控政府支出開始做起。他認為政府財政窘迫，最主要是因為承擔過多的人事成本。因此，降低冗員人數，便成為改革的一大要旨。例如，他更改了原本屬於官員榮譽的「終身職」（tenure）制度。終身職不再真的表示官員可以終身任職，而是改成官員在國王許可的情形下，才得以任終身職。也就是說，原本取得終身職榮譽的官員，只要國王認為其工作內容不再合乎政府要求，便可以撤銷終身職位。換句話說，唐寧爵士變相地取消了終身職制度。

除了降低支出外，當時英格蘭財政收入，無論稅收還是借款，都仰賴中間人向民間收取資金。這讓政府財政繫於中間人，即金匠銀行家。為了改善這點，唐寧爵士試圖讓政府可以不透過中間人，直接向民間借款。他降低原本支付中間人的利息，頒布法令，向民眾保證借款必定按期還清，即「程序付款」（payment in course）的政策。程序付款政策為政府籌得 125 萬英鎊的民間借款，並為之後的改革奠定基礎。然而，政府的財政困境仍舊存在。1672 年廢止了財政部一切借還款業務，正是因為財政難以為繼所造成。²²

1672 年，查理二世（163-1685）下詔停止財政部借款活動，以終止大量支出，事實上，也就是停止還債。史學家以「財政部的廢止」（Stop of the Exchequer, 1672）稱呼這個詔令。這時的英

21 Bruce G. Carruthers, *City of Capital*, 60.

22 關於財政改革，亦可參見：Henry Roseveare, *The Treasury 1600-1870*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3); Geoffrey Holmes, *The Making of a Great Power: Late Stuart and Early Georgian Britain, 1660-1772* (London: Longman, 1993).

格蘭政府正在為第三次英荷戰爭籌款，但第二次英荷戰爭的借款卻尚未還清。政府為了減低新近借款的支出，於是廢止了財政部的業務，換句話說，即不再償還前債。英格蘭財政自此陷入低迷，而這般財政困境，也成為 1688 年威廉三世 (William III, 1650-1702) 得以順利奪位的遠因。²³

財政低迷並非表示英格蘭從此進入經濟的黑暗時代。政府財源拮据不表示民間經濟蕭條。1672 年的廢止令破壞了政府原本的收入來源，但民間貿易持續發展。英格蘭的海外貿易仍舊蒸蒸日上，甚至逐步取代荷蘭，成為執歐洲海外貿易牛耳的經濟強權。費南德·布勞岱爾 (Fernand Braudel) 在他三冊巨著《十五至十八世紀的文明與資本主義》(*Civilization &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的第三冊《商業的巨輪》(*Wheel of Commerce*) 裡，將英格蘭與荷蘭並列為歐洲經濟核心，從地中海地區轉移到北海沿岸的兩大代表，確實有其憑據。²⁴

財政困頓的情況，要到 1688 年威廉三世 (1650-1702) 入主英格蘭後，才漸漸得到改善。除了實行直接徵稅外，最能代表這波改革，同時也最具威廉政權的荷蘭色彩的，正是本節開始所言，1694 年英格蘭銀行的設立。

23 Jonathan Israel ed., *The Anglo-Dutch Moment: Essays on Glorious Revolution and its World Impa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05-162, 389-406; Dale Hoak ed., *The World of William and Mary: Anglo-Dutch Perspectives on the Revolution of 1688-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28, 75-86; Lisa Jardín, *Going Dutch: How England Plundered Holland's Gl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8), 53-81; Steven Pincus, *The First Modern R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6-8, 87-90.

24 Fernand Braudel, *Civilization &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Vol.3: Wheel of Commerce*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309.

英格蘭銀行將原本政府與民間的短期借款，改成長期的借貸關係。政府以發行債券或國債的方式，由民眾以投資的方式將資金借給政府，政府再按期償還利息。此外，銀行成為政府與民間的獨立財政樞紐，民眾將存款投資銀行，而政府也會依其需求，向銀行貸款。易言之，銀行的設立等同於政府設置了一個中間人組織，國家財政更加條理分明。政府的借款對象也不再受限於原本的中間人，如金匠銀行家。一般大眾成為政府發行債券的借款對象，其借款是由民眾的小額借款積累而成。

英格蘭銀行設立後，政府與民間借款的關係如下：購買政府債券者，亦即借款給政府的人，每年會定額收到其借款的利息，作為報償。利率因為較長的償還年限而降低。這麼一來，政府不必在短時間內承擔高額の利息壓力，而人民的財務也因為每年定期收到借款利息，而有所保障。這些改革的成效驚人，在 1702 年威廉三世去世後，繼承的安妮女王（Queen Anne, 1665-1714）統治期間，英格蘭藉由各種長期信貸，總共募得一千萬英鎊左右的資金。英格蘭得以解決財政困境，而新的財政體系也更能支持現有的貿易市場。²⁵

這波改革之所以有所成效，英格蘭銀行得以設立，長期借貸得以順遂發展，都有一個根本前提：即英格蘭社會有足夠的資金以供應用。這些改革措舉，都仰賴高度的資金流動。而正如卡魯瑟所說：「感謝貿易與商業的發展，英格蘭的可用資本日漸增加。」²⁶ 充裕的資本為此一新的財政體制提供了可資應用的經濟資源，也因此才得以紓解 17 世紀末的政府財政危機。

25 Bruce G. Carruthers, *City of Capital*, 42-46.

26 Bruce G. Carruthers, *City of Capital*, 71. "Thank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de and commerce, there was in England a growing pool of available capital."

三、 政治算數與財政政策

前一節花費這麼多篇幅討論英格蘭的財政改革，主要原因乃在於，透過英格蘭財政體制的轉型可以發現，自 17 世紀末起，英格蘭政府已然明白既有的財政體制，無法呼應正在逐步發展的市場經濟。試問，如果政府得以仰賴既有的財政體制，有效掌握市場經濟的經濟資源，那麼，英格蘭政府何以會面臨財政捉襟見肘的窘境？

當然，要說明某個政府的某項施政，是因應當時的社會潮流而發，確實是個曖昧難明的問題。經濟史家將金融革命視為政府財政與社會商業相應合的討論，多依賴數據來說明，政府財政改革與商業數據增加的時間重疊，藉此佐證他們的解釋。數據的確是最直接的證據，然而，是否能不只透過數據，來說明財政改革是政府呼應社會變遷的結果？要如何透過財政改革來說明，當時英格蘭政府、或廣義的政治界開始察覺商業社會的浮現？這或許可以在當時參與政治界的英格蘭思想家之主流議論中得到證明：即「政治算數」（political arithmetic）的流行。政治算數一詞，最早出現在威廉·佩第爵士（Sir William Petty, 1623-1687）的遺世之作，*Political Arithmetic*（政治算數）裡。²⁷ 這在稍後的段落將更進一步說明。在此之前，當先解釋當時從政的思想家，為何特別重視政治算數。

布魯爾在 *The Sinews of Power* 裡，說明政治算數的要旨在於：清楚掌握國家的財政資源分布，以數學的方式解讀政治社會財政，藉此達到富強的目的。²⁸ 而其流行，也代表當時英格蘭思想社群對

27 William Petty, *Political Arithmetic* (London, 1690).

28 Bruce G. Brewer, *The Sinews of Power*, 183.

政治的理解有所轉變。好的政治家不能僅有具備完善的美德操守與政治手腕，還要熟悉一國的財務資源，並能妥善利用這些資源，以增進一國財富。這意味著在當時思想社群眼中，政治社會的強盛與否，和其財力多寡密切相關。

另外，以當時思想社群對政治算數的諸多論著均是獻給君王、希望國王採納實踐，並向世人「展現英格蘭王威的分量及重要性」看來，²⁹ 政治算數可視為思想社群對政府的呼籲。希望英格蘭政府能依他們書中建言，做出真正使英格蘭富強的政策，即有效應用新的市場經濟使國家繁盛。經由檢視 17 世紀末，思想社群討論政治算數的著作，或許可以更清楚展現英格蘭財政改革，乃是呼應商業逐漸成為社會主要活動而來的結果。

威廉·佩第的 *Political Arithmetic* 一書，在 1690 年由佩第的兒子，依其父遺志呈閱給國王威廉三世。在這本書裡，佩第向威廉三世展現了理想的治國之道，並指陳要使英格蘭興盛的辦法無他，唯有「使英格蘭人民的國王，掌握所有商業世界的普遍貿易」而已。³⁰

佩第以荷蘭作為對照，指出如荷蘭這般貧瘠的自然條件，猶能享有如此繁盛的商貿，則英格蘭自然也得以有類似的成就。英格蘭不足之處在於，它不若荷蘭有有效率地活用市場經濟資源的財政組織，因此，未能有效使用英格蘭社會的經濟資源。對佩第

29 William Petty, *Political Arithmetic*, ii. "...to show the weight and importance of English Crown."

30 William Petty, *Political Arithmetic*, 114-115. "...for the king of England's subjects, to gain the universal trade of the whole commercial world."

而言，英格蘭與荷蘭財政組織最大的差別，就是銀行的設立與否。荷蘭的銀行為荷蘭政府和社會提供了經濟的連結，資金，為兩者都提供更進一步發展的經濟活力。佩第寫道：

銀行，關於銀行的功用，乃在於增加金錢，或者使只能等同於小筆商業利潤的利益成為廣大的利潤，這些類似的事務正是銀行所關切的。第一，多少金錢可供政治社會的商業驅使，第二，政治社會現在究竟有多少流動金錢……³¹

總之，佩第認為，銀行將使英格蘭的資金更加靈活，並使英格蘭的財政與商業都更加興盛。

佩第是英格蘭國會議員，且在查理二世、詹姆士二世（James II, 1633-1701）統治時都居政要地位。他的著作當能代表政治界思想社群的呼籲。除了佩第之外，另一名棲身政壇的思想家，查爾斯·戴弗南（Charles Davenant, 1656-1714）的作品也回應了英格蘭銀行設立一事。

戴弗南也是國會議員，他在英格蘭銀行設立四年後，發表了 *Discourses on the Public Revenues*（論大眾年金）。他寫道：

這應當不是不合時宜的警覺，去承認如果英格蘭銀行受到法律約制，使其不在資金流轉中獲利，將會使貿易有整體的良

31 原文為：“Bank, the use whereof is to increase money, or rather to make a small sum equivalent in trade to a greater, for the effecting whereof these things are to be considered. 1. How much money will drive the trade of the nation. 2. How much current money there is actually in the nation...”，見：William Petty, *Political Arithmetic*, 28-29.

善發展。³²

戴弗南回應的主題與佩第相同，即如何透過妥善控管財政與商貿，來促使政治社會興盛。兩人的差別在於：佩第寫作時，英格蘭銀行尚未設置，因此，佩第呼籲銀行對政治社會經濟的重要性；戴弗南在回應時，銀行剛設立不久，他是在呼籲政府重視現有銀行制度的管理，以達到更好的財政效果。

後世的經濟思想史家，將佩第與戴弗南歸類為「重商主義者」的範疇。這種分類當然有其問題所在，最主要的問題，即他們根本不是要提倡某一經濟學說，而是要為政治問題提出對應的藥方。儘管如此，這種分類仍然多少有其道理。他們都認為，無法分割政治社會興盛與否和其經濟發展高低的關係，而經濟發展則有賴於商業貿易的繁盛。但與其因此將他們定位為重商主義者——這個名詞在自由經濟思想當道的時代裡，多少帶有貶意——不如免去一切分類，只是如實地陳述他們的書寫，反映他們對時代的體會：17世紀末的英格蘭，商業成為政治社會的主要活動。由於他們的著作，往往旨在向國王提出如何能使英格蘭富強的想法。因此，當他們認為商業有助於英格蘭發展時，他們也直接將英格蘭國勢興衰等同於商業活動的興衰。而銀行，則是商業貿易運轉的重要機構。

佩第與戴弗南都是17世紀末期的人物，在18世紀初，賽門·克雷門（Simon Clement, 1654?-1730?）也對銀行與國家經濟的關

32 原文為：“it may not be unseasonable to take notice, that it would be for the general good of trade, if the Bank of England were restrained by law, from allowing interest for running cash.” 參考自：Charles Davenant, *Discourses of the Public Revenues, and on the Trade of England* (London: 1698), 265.

係，發表見解。*A Vindication of the Bank of England*（為英格蘭銀行辯護）在1707年出版，開章第一頁就如此寫到：

我認為，那個機構為貿易帶來真正的利潤，以及其為政府做出的諸多服務，均是清晰可見的……³³

克雷門本人曾經擔任駐神聖羅馬帝國大使、彼德鎮伯爵 (Earl of Peterborough) 的秘書，也是位履足政壇的思想家。他的著作，亦在討論如何透過具體的施政來使英格蘭富強。

除了佩第、戴弗南與克雷門，同樣投身政壇，並對經濟課題發表論著的還包括17世紀中葉，在當時屬於政府特屬的東印度公司擔任委員會委員，於1630年寫成 *England's Treasure by Foreign Trade*（英格蘭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的托馬斯·曼 (Thomas Mun, 1571-1641)。³⁴ 在此要多做說明的是，雖然曼的著作成書甚早，卻一直到1664年才發表。這或許表示了同樣的課題，在17世紀末比17世紀初更受到關注。此外，身兼政職的思想家還有代表英格蘭出使荷蘭共和國，於1687年寫下 *Observations upon the United Provinces of the Netherlands*（對尼德蘭聯合省的觀察）的威廉·特普爵士 (Sir William Temple, 1628-1699)，以及擔任東印度公司總督，於1698年發表 *A New Discourse of Trade*（新論貿易）的約書亞·柴爾德爵士 (Sir Josiah Child, 1630-1699)。³⁵

33 原文為：“I thought, the real advantages which that corporation had afforded to trade, and the many services which it had performed to the government, were so visible...”，參考自：Simon Clement, *A Vindication of the Bank of England* (London, 1707), 1.

34 Thomas Mun, *England's Treasure by Foreign Trade* (London, 1664).

35 Sir William Temple, *Observations upon the United Provinces of the Netherlands* (London, 1687); Sir Josiah Child, *A New Discourse of Trade* (London, 1698).

這些參與政治的思想家，對英格蘭銀行的諸多看法，基本上都認可銀行的重要性。甚至，他們都同意銀行有益於商業，而商業興盛等於國家興盛的觀點。他們之間的差別，只在於銀行的適當定位與運作模式。換句話說，這些思想家都認為，刺激商業是根本原則，他們對經濟政策的討論雖然各有主張，卻也都是在呼籲政府，要設置適合市場經濟的財政組織，才能有效利用國家的經濟資源。如此一來，透過這些論著，正好可以說明，英格蘭的政府與從政的思想家們，已然察覺到社會、經濟型態的變動，也開始呼籲政府對這個變遷做出回應。

17 世紀末提倡商業的思想家，其著作多是呈給國王的政策建言。這表示了投身政治的思想社群，對社會型態的轉變有一定的認知，能體會商業的發展；否則，他們不會鼓吹設置銀行等新財政機構，來有效應用社會上的經濟資源，也不會有諸多關於商業與國家富強的討論。下一節的內容，將自政壇轉到社會民間，討論大眾對於社會型態轉變的感受，由此來呈現時人對商業社會的自覺。

四、 服飾、出版、與商業社會

商業的興起如何改變社會型態與文化？這是個看似容易，實際上卻極難回答的問題。社會變遷的歷程總是難以言明，卻又確實存在。21 世紀的今日英格蘭讀者，在回頭審視 18 世紀英格蘭的著作時，難免會對作者筆下的世界感到陌生。甚至，不必將時間拉回到 18 世紀，20 世紀 90 年代的英格蘭孩童成長的社會，就已然與他們的父祖輩有所差別。這中間的變化如何產生？某種機械

（如電腦）的發明，某種生活型態（如網路通話）的轉變，這些都可以是一種解釋。

在尋找社會變遷的軌跡時，歷史學家可以陳述某個時期，某個社會出現新的面貌。例如街道開始出現街燈、石磚取代了泥濘的道路、大眾穿著形式的變化、奢侈品消費數量提高……等各種面向，來說明社會文化的變遷。而後，將這些變遷歸因於這個時期市場貿易的成熟，並舉出種種材料證明這時期的商業如何興盛，由此得到因為商業興榮，導致社會型態轉變的結論。這種研究理路或許受到批判反省，或許得到修正。但無論如何修正，在某種程度上，任何一種歷史研究，都是一種對既定現象的還原。這個問題可以繼續延伸成歷史學方法論的討論，也可以成為哲學思辯上，對歷史學存在意義的反思，但在這裡，卻僅僅是想藉此提出這麼一個疑問：既然社會變遷的痕跡難以捉摸，嘗試言明又難免後設，那麼，要如何討論 18 世紀英格蘭，有一種與過往有所不同的社會型態出現？

這一節將以服飾與出版兩個產業，於 18 世紀逐漸蓬勃發展為例，希望由此說明當時英格蘭的社會變遷。服飾業的發展，表示當時英格蘭的服飾消費社群有所成長。此外，透過時人的觀察可以發現，當時大眾對服飾的需求，不再只著重於蔽體保暖等生存需求。服飾對當時的人來說，還象徵了個人的社會文化地位。因此，被消費的服飾漸趨華麗，服飾消費不再只是維生必須的消費，增添了奢侈消費的特質。

出版業的擴張也反映了同樣的特色。書報雜誌大量湧入出版市場，一方面代表閱讀消費社群逐漸龐大，另一方面也表示，休

閒閱讀逐漸成為生活習慣的一環。閱讀當然不是維生所必須的條件，因此，出版品消費同樣也表示，當時社會大眾的消費行為，不僅僅是為了生存，追求更安逸的生活成為 18 世紀英格蘭消費的特質。消費型態的轉變表現了消費社群心態的轉變，而這兩者則共同反應了商業社會興起的變遷。

1939 年，在一篇投稿到第九期 *Gentlemen's Magazine*（紳士雜誌）的論文，*The Late Improvements of our Trade, Navigation, and Manufactures, Considered*（論我國貿易、航運與手工業的近來進展）中（以下簡稱：論我國貿易），作者如此寫道：

誠然，我們既有的手工業，有些受損，有些廢置，但同樣真實的，是我們有諸多新興的手工產業，而且，有一些甚至是在近 30 年內才出現的。例如，服飾商人俗稱的「西班牙服裝」產業，其價值每碼五到八先令，即便尚未廢置，其業務也有所減少。但是，（除了上述傳統產業外），其他服飾產業，其價值從每碼二先令六便士到四先令，如賽爾特呢製衣褲、威爾斯平布衣、粗毛衣、日耳曼嘩噠衣物、長襪、帽子、東方式絲織衣物、以及各式各樣的衣物，都比昔日國外來訂購的西班牙服裝產業大幅增加。³⁶

這段敘述說明當時英格蘭服飾產業的多樣性，此外，這段文字也

36 原文為：“It is true, that some of our ancient manufactures are lessened, and some quite disused; but it is equally true, that there is a very considerable increase of some manufacture, and that others are invented within these twenty years. For instance, the manufacture of what the clothier calls Spanish Cloth, worth from 5 to 8 s. per yard, is generally lessened, if not quite disused; but the manufacture of cloth, from 2s. 6 d. to 4 s. per yard, of kersies, welsh-plains, druggets, saggathies, German serge, stockings, hats, camblets, and stuffs of various kinds, is augmented far beyond what it was when Spanish Cloth was called for from abroad.” 參考自：Anon., “The Late Improvements of our Trade, Navigation, and Manufactures, Considered”, in *Gentlemen's Magazine*, vol. IX (London: 1739), 479.

透漏，此時的英格蘭服飾業比諸既往，更為蓬勃。

依據根本的生產需求原則，產業的生產端既然有所進展，或許可以合理推論：在消費端，消費社群的消費力，同時也有所提升。透過上段的引文可見，18 世紀初的服飾業，在類型與銷量都比之前增加。這當可反映當時的消費社群，與 30 年前相比，對服飾的數量與種類需求也都有所增加。如果這樣的推論無法說服讀者，或許，透過另一段同時代的敘述，可以更進一步說明，當時英格蘭服飾產業的消費社群，有了與之前不同的樣貌。

因為書寫 *The Fable of the Bees*（蜜蜂的寓言）一書而惡名昭彰的荷蘭移民伯納德·曼德維爾（Bernard Mandeville, 1670-1733）也在該書提到，他發現，與之前的時代相比，服飾在他所居住的 18 世紀英格蘭，開始有了不同型態的社會意涵出現。他認為，「服飾原本只有兩種用途，遮掩我們的裸體，以及保護我們免於天氣與其他的外在傷害」。然而，到了 18 世紀，服飾開始成為個人社會地位的表徵。根據曼德維爾的觀察，人們「普遍因為他們的服飾，與其他服飾上的飾品而受人敬重；我們從人們服飾奢華的程度來評斷他們的身價，也從人們對服飾的打扮來審度他們的品味」。³⁷ 論我國貿易一文展現了 18 世紀英格蘭服飾產業的多樣性，表現了當時英格蘭社會消費者數量的增加，而曼德維爾的文字則展現了，一個當代人對當時消費者社群進行服飾消費時，心態轉折的觀察。對曼德維爾而言，服飾消費不再是為了生存需求，而是為了展現

37 Bernard Mandeville, *The Fable of the Bees*, vol. 1, 127-128. "Cloths were originally made for two ends, to hide our nakedness, and to fence our bodies against the weather, and other outward injuries"; "...are generally honoured according to their cloths and other accouterments they have about them; from the richness of them we judge of their wealth, and by their ordering of them we guess at their understand".

「無盡的自尊」(boundless pride)與滿足「愚昧的虛榮」(stupid vanity)。³⁸

服飾消費的轉變也體現在第三種資料，即討論服飾的出版品。根據今日史學家的研究，18世紀英格蘭出現大量討論流行服飾的著作，其中尤其以流行雜誌為大宗。除了出版數目增加外，流行服飾著作的內容量也有顯著的成長。例如在尼爾·麥坎德里克(Neil McKendrick)、約翰·布魯爾與約翰·普朗布(John Plumb)等人的共同著作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消費社會的誕生)裡提及的，*The Handbook of Fashion for the Eighteenth Century* (十八世紀流行服飾指南)總頁數共有453頁，比起一個世紀前出版，共229頁的 *The Handbook of Fashion for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十七世紀流行服飾指南)多出一百多頁的內容。³⁹至於出版品，該書也指出，以「多數年輕女仕」為對象的流行雜誌開始湧現。諸如：*The Lady's Magazine* (女仕雜誌)、*The Annual Present for the Ladies* (年度女仕期刊)、*Carnan's Ladies' Complete Pocket Book* (卡南的女仕專屬全口袋書)、*The Ladies' Mirror* (女仕之鏡)、*The Polite and Fashionable Ladies' Companion* (典雅與時尚女性指南)等。⁴⁰

服飾相關的出版品，尤其是流行服飾雜誌數量的增加，可以顯示當時的英格蘭社會，對於合宜與流行的服飾款式、穿著方式

38 在此需要附帶說明的是，曼德維爾是帶著一種戲謔的口吻，而非批評，見：Bernard Mandeville, *Fable of the Bees*, 127.

39 Neil McKendrick, John Brewer and John H. Plumb,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 1982), 54.

40 Neil McKendrick and others,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47.

等服飾相關課題的關注，比起之前的時代提升了不少。18 世紀英格蘭的流行服飾出版品，在質與量方面皆有所增長，也正好呼應了曼德維爾的觀察。表示當時英格蘭的服飾消費者，除了在數量上有所增加，也更重視服飾的搭配，與其社會品味的關係。曼德維爾認為這是「愚昧的虛榮」作祟。他沒有多加解釋為何會出現新的服飾消費型態與追求虛榮的風潮；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服飾消費者在 18 世紀，確實有了與之前不同的型態，即他們追求、試圖跟上流行服飾變化的腳步，以及大量閱讀流行服飾雜誌。

流行雜誌的增加，所反映的不僅是服飾消費心態的轉變，同時也說明了 18 世紀英格蘭新興的出版市場。流行雜誌以一種新出版品的姿態，大量出現在書籍市場上，或許可以表示當時英格蘭社會消費力的成長，足以承擔一種大量的新出版品。當然，如果僅以流行雜誌等服飾出版品，作為書籍市場成長的證據，說服力未免不足。幸運的是，學者伊莎貝爾·瑞佛絲（Isabel Rivers）所編著、討論 18 世紀英格蘭書籍流通的論文集 *Books and Their Reader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十八世紀英格蘭的書籍及其讀者），對當時英格蘭書籍市場與消費者，進行了詳盡的研究與討論。⁴¹

該書收錄了詹姆斯·瑞文（James Raven）探討書籍貿易的論文。瑞文的研究指出，18 世紀英格蘭出版市場擴張迅速，而這種擴張則與英格蘭的經濟成長息息相關。社會有充裕的資本得以消化更多的出版品，出版商的數量也隨著出版市場的需求擴大而增加。此外，出版品消費市場的成熟，讓出版商與作者，在出版書籍雜誌與寫作的同時，必須更關注當時消費市場的品味，如此方

41 Isabel Rivers ed., *Books and Their Reader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New Essays* (London: Continuum, 2001).

能使自己的出版品得以在競爭中生存。易言之，消費能力的提升連帶也擴大了出版業的規模；出版業規模的成長，代表行業內部競爭力的上升；而出版商與作者們彼此競爭的過程，則又突顯了消費者在這時期的重要性。瑞文認為，這個現象最能表現在報紙廣告的收益成長上。⁴²

根據瑞文的統計，英格蘭報紙刊登廣告的收入，在 1713 年約為 912 英鎊，在 1734 年則成長為 3158 英鎊。綜觀整個 18 世紀，報紙的廣告收益持續攀升。1754 年為 7915 英鎊，1774 年是 33,662 英鎊，1784 年為 46,284 英鎊，1794 年為 69,943 英鎊，而 1798 年則成長到 98,241 英鎊。報刊廣告的收益增加，表示當時各種行業間彼此競爭的激烈程度。⁴³ 正如瑞文所展示的，在商業市場穩定成長之後，報紙廣告欄成為新興的商業戰場。商人、商行的興衰，往往取決於在報紙廣告上投入資本的多寡。市場的能見度成為商人在收支成本外，必須考量的另一個經商要素。

報刊廣告數目的遽增，除了反映市場能見度對當時英格蘭商業的重要性，也隱約透露了另一個訊息，即在 18 世紀，報紙有一定規模的銷售市場。畢竟，如果報紙沒有足夠的閱讀社群與消費市場，則報刊廣告的成果理當有其侷限，而如果報刊廣告的效益不彰，將無法解釋何以 18 世紀英格蘭的報刊廣告會高度成長。這固然只是推論，但史家傑瑞米·布萊克（Jeremy Black）在著作裡清楚指出，報紙雜誌等出版品的銷量，在 18 世紀有大幅增加的趨

42 James Raven, "The Book Trades" in Rivers, *Books and Their Reader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New Essays*, 1-35.

43 見 James Raven, "The Book Trades", in Rivers, *Books and Their Readers*, 26. 瑞文的統整見：A. Aspinall, "Statistical accounts of the London newspaper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63 (1948): 112-130。

勢。

布萊克在 *Cul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十八世紀英格蘭文化）中寫道，扣除倫敦，18世紀英格蘭地區的報紙數量從1723年的24種，到1753年為32種，1760年為35種，於1782年則更增加為50種。⁴⁴ 至於英格蘭報紙的年度銷售量，則從1713年的每年250萬份，到1780年已成長為每年1400萬份。與報紙相類，雜誌的銷量也有所成長。前述已經說明了流行雜誌的盛行，布萊克則更進一步指出，不僅僅是流行雜誌，當時英格蘭更為風靡的，是內容包含劇評、文評、書評……等評論性文章的評論雜誌。這包含了在1711年出版，由喬瑟夫·阿迪森（Joseph Addison, 1672-1719）與李察·史提爾（Richard Steele, 1672-1729）合辦，以時論聞名的 *Spectator*（旁觀者雜誌）。⁴⁵

報紙與雜誌大量流通，證明了18世紀英格蘭出版業消費市場的擴張。而考量同時期，服飾消費的市場也正蓬勃發展，或許可以作為幾個例子來說明：當時英格蘭的社會，隨著市場經濟逐漸成熟而有所轉變。服飾成為社會地位的指標，報紙與雜誌的高銷量則或可代表日常閱讀習慣的發展。值得一提的是，布萊克指出，在當時的英格蘭，有些小說作者開始以連載的方式，將自己的創作分期登於這些新興雜誌上。《魯賓遜漂流記》（*Robinson Cru-*

44 本段落所有的數據資料皆引自布萊克的著作，見 Jeremy Black, *Cul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A Subject for Taste* (London: Hambledon Continuum, 2005), 148。布萊克則轉引自：K.T. Winkler, *Handwerk und Markt: Druckerhandwerk, Vertriebswesen, und Tagesschrifttum im London 1695-1750* (Stuttgart, 1993); R. Taylor, *Goldsmith as Journalist*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1992)。

45 關於這段期間新出版雜誌的詳盡目錄，詳見布萊克的專著，於此就不再討論。Jeremy Black, *Cul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148-149。

soe) 的作者，丹尼爾·狄福 (Daniel Defoe, 1659-1731) 就在 1720 到 1723 年間，於 *London Post* (倫敦郵報) 上連載自己的最後一本小說：《法蘭德絲姑娘》 (*Moll Flanders*)。⁴⁶ 當然，小說不是唯一連載的文類，18 世紀初頗為著名的政論作品，Cato's Letters (卡圖的信)，也是一個連載的顯著例子。而曼德維爾因為 *The Fable of the Bees* 被求處死刑，並在 1723 年為自己辯護時撰寫的〈為一本書的平反文〉，雖然不是連載文體，但也刊登在 1724 年的《倫敦期刊》 (*London Journal*) 上。考量曼德維爾為自己辯護，需要有一定數量的閱讀群眾，他選擇刊載在雜誌上的行為，或許也代表當時的雜誌有相當規模的讀者社群。

五、 結語

今日史學家從各個面向切入，討論 18 世紀英格蘭社會型態如何因為商業的興起而有所轉變。如羅伯特·麥肯穆森 (Robert Malcolmson) 在 *Popular Recreations in English Society, 1700-1850* (英格蘭社會的流行娛樂) 中，說明英格蘭社會大眾的休閒活動，如何因為商業社會的出現，在 18 世紀有了不同於既往的樣貌。⁴⁷ 而近來的另一本研究，安·狄恩 (Ann Dean) 的 *The Talk of the Town* (市鎮蜚語)，則探討 18 世紀英格蘭的公共領域與政治輿論之間的關係。⁴⁸ 基斯·托瑪斯 (Keith Thomas) 在他的 *The Ends of Life* (生命的目的) 裡，從各個不同面向剖析了 16 到 18 世紀間，英格蘭

46 Jeremy Black, *Cul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150.

47 Robert W. Malcolmson, *Popular Recreations in English Society, 1700-18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48 Ann C. Dean, *The Talk of the Town: Figurative Publ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Lewisburg: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人生活習慣的轉變。⁴⁹

18世紀的思想社群確實觀察到，當時社會大眾的衣著與之前有所不同，而這也在思想社群中激起迴響。有些思想家認為，18世紀奢華的服飾是人性逐漸腐化的象徵，人們的穿著從原本強調實用的克儉風格，轉趨崇尚華服細作。奢靡的服飾展現了人性罪惡的奢侈，這些思想家們擔心這會破壞維繫政治社會富強的諸般美德。例如，安德魯·弗萊契（Andrew Fletcher, 1655-1716）即是因為這個原因而反對商業的思想家。他認為，奢侈將帶來腐敗，而個人的腐敗將導致國家的覆亡。⁵⁰另外有些思想家則擔憂，人人皆得以購著華服將會破壞既有的社會秩序。18世紀的英格蘭已經無法藉由穿著來判斷一個人的職業，男僕穿著與主人相仿的服飾，這些思想家認為，原有的社會秩序已被破壞殆盡，正如一名觀察者所記：

現在，我們的女僕已經因為其自傲而顯得趾高氣揚，她們從不曾滿意於她們的衣著。在今日，要由服裝來判定一個人是名大家閨秀還是女僕，是件極為困難的事。事實上，女僕往往是穿得比較好的那一個……⁵¹

由此可見，服飾的變化確實為當時的思想社群所察覺，而他

49 Keith Thomas, *The Ends of Life*.

50 關於弗萊契的討論，可見：John Robertso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at the Limits of the Civic Tradition”, in Hont and Ignatieff ed., *Wealth and Virtue*, 137-178.

51 原文為：“Our servant wenches are so puffed up with pride nowadays that they never think they go fine enough. It is a hard matter to know the mistress from the maid by their dress; nay very often, the maid shall be much the finer of the two...” 此處引文來自一份1735年的遊記，由麥坎德里克等人所引。見 Neil McKendrick and others,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60.

們也更進一步將此一變化與奢侈消費作連結與討論。⁵²

再者，出版業的擴張，表示當時思想社群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讓一般讀者接觸、閱讀。而思想社群彼此的討論，往往不是私人魚雁往返，而是刊登在雜誌報刊上。說明了這些思想社群彼此對話的同時，其對話內容不僅僅是一種私人談話，而是具有公共性的討論交流。曼德維爾為自己辯護的文章，並不是以書信的方式寄給對他提出控訴的法庭，而是刊登在雜誌上，就是一個例子。這可以視為當時的思想社群選擇將議論的內容訴諸讀者，論著的內容孰優孰劣，則交由讀者的迴響來論斷。這是 18 世紀思想社群彼此對話的公共場域，而一些思想史家的研究也指出，在 18 世紀，身處於社會之中的思想社群，已然察覺到社會型態的轉變，他們也因此在既有的思想資源上，重新思考自身心中的政治社會，與實際社會樣貌之間的關係。在這個再思考的過程裡，思想社群彼此各有意見，產生了不少對話。⁵³

從本文的討論可以發現，18 世紀英格蘭人關於施政與社會觀察的書寫中，商業已佔居要位。18 世紀的英格蘭人明白自己正處於一個不同於過往的社會當中，在這樣的社會裡，思想社群內有

52 Hont and Ignatieff, *Wealth and Virtue*; Christopher J. Berry, *The Idea of Luxury: A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01-176, 199-242; E. J. Hundert, *The Enlightenment's Fable: Bernard Mandeville and the Discovery of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16-218; Donald Winch, *Riches and Povert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Britain 1750-183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124.

53 John G.A. Pocock, *Machiavellian Moment*, 423-505; Malcolm Jack, *Corruption & Progress: The Eighteenth-Century Debate* (New York: AMS Press, 1989); John G.A. Pocock, *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 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Chiefl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91-124, 230-252; J. G. A. Pocock, *Barbarism and Religion vol. 2: Narratives of Civil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29-330; John Robertson, *The Case for the Enlightenment: Scotland and Naples 1680-17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56-375.

諸如政治算數與政治經濟學（Political Economy）這類新學科的興起，但同時社會上也普遍存在著一種對於商業可能風險的焦慮。⁵⁴ 商業在18世紀英格蘭所帶來的，不僅僅是物質生活上前所未見的享樂，更使時人必須重新思考諸多既有的概念與認知。本文第一部份所呈現的，正是當時從政的思想家與政治家如何因應商業發展，而重新思考財政體制與金融政策的過程。本文的第二部分則指出，未從政的人們如何觀察到既有的社會風俗，如何因為商業成長帶動的新興產業而有所轉變。這個轉變也使得當時的思想家必須重新思考奢侈消費與勤儉道德之間的關係。除此之外，正如近來不少學者所指出的，這樣的社會型態，也使當時人們必須重新檢視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種種關係，而此一針對個人與人際關係的反思，則正是不少所謂「啟蒙思想」（Enlightenment Ideas）所關懷的核心課題。⁵⁵

54 關於政治經濟學：Hont and Ignatieff, *Wealth and Virtue*, 1-44, 271-316; Winch, *Riches and Poverty*, 33-124; Istvan Hont, *Jealousy of Trad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05), 1-158, 185-388; 關於商業社會的焦慮：G. J. Barker-Benfield, *The Culture of Sensibility: Sex and Societ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1-153; Emma Rothschild, *Economic Sentiments: Adam Smith, Condorcet, and the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7-156; Sarah Knott, *Sensibility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9), 1-104; Emma Rothschild, *The Inner Life of Empires: An Eighteenth-Century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1-10, 121-209.

55 針對這個主題，儘管學者們有著諸多關於啟蒙思想詮釋的辯論，但商業與新的社會型態對思想家的刺激卻是學者們共同接受的認識。見：Jonathan Israel, *Radical Enlightenment: Philosoph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ty 1650-17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156; Jerrold Seigel, *The Idea of the Self: Thought and Experience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87-170; Jonathan Israel, *Enlightenment Contested: Philosophy, Modernity, and the Emancipation of Man 1670-175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25-263; Dror Wahrma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Self: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98-217; Charles Taylor, *A Secular A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25-89, 221-298; Jonathan Israel, *A Revolution of the Mind: Radical Enlightenment and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Modern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92-123.

徵引及參考書目

史料

- Anon. "The Late Improvements of Our Trade, Navigation, and Manufactures, Considered", in *Gentlemen's Magazine*, vol. IX. London: 1739.
- Child, Sir Josiah. *A New Discourse of Trade*. London: 1698.
- Clement, Simon. *A Vindication of the Bank of England*. London: 1707.
- Davenant, Charles. *Discourses of the Public Revenues, and on the Trade of England*. London: 1698.
- Mandeville, Bernard. *The Fable of the Bees*. ed. F. B. Kaye 2 vol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8.
- Mun, Thomas. *England's Treasure by Foreign Trade*. London: 1664.
- Petty, William. *Political Arithmetic*. London: 1690.
- Smith, Adam.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 R. H. Campbell and A. S. Skinner 2 vol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1.
- Temple, Sir William. *Observations upon the United Provinces of the Netherlands*. London: 1687

論文

- Cannadine, David. "The Present and the Past in the English Industrial Revolution 1880-1980." *Past & Present*, 103 (May 1984): 131-172.
- de Vries, Ja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the Industrious Revolution Author."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4:2 (June 1994): 249-270.
- Hobsbawm, Eric J. "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in the 17th Century." *Past & Present*, 5 (May 1954): 33-53.
- "The Crisis of the 17th Century - II", *Past & Present*, 6 (November 1954): 44-65.

專書

- Aston, Trevor ed. *Crisis in Europe, 1560-1660: Essays from Past and Present*.

- London: Routledge, 1970.
- Armitage, David.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Barker-Benfield G. J. *The Culture of Sensibility: Sex and Societ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2.
- Berry, Christopher J. *The Idea of Luxury: A Conceptual and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Black, Jeremy. *Cul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A Subject for Taste*. London: Hambledon Continuum, 2005.
- Bourdieu, Pierre. *Language & Symbolic Power*. ed. John B. Thompson, Trans. Gino Raymond and Matthew Adamson, Cambridge: Polity, 1991.
- *Pascalian Meditations*. trans. Richard Nice, Cambridge: Polity, 2000.
- Braudel, Fernand. *Civilization & Capitalism 15th - 18th Century, Vol.3: Wheel of Commerce*.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 Brewer, John.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 1688-1783*. London: Unwin Hyman, 1989.
- Carruthers, Bruce G. *City of Capital: Politics and Markets in the English Financial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 de Vries, Jan. *Economy of Europe in an Age of Crisis, 1600-17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 Dean, Ann C. *The Talk of the Town: Figurative Publics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Lewisburg: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 Dickson, Peter G. M.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A Study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Credit, 1688-1756*. Hampshire: Gregg Revivals, 1993.
- Dumont, Louis. *From Mandeville to Marx: The Genesis and Triumph of Economic Ide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 Gelderblom, Oscar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Dutch Republic*. Burlington: Ashgate, 2009.
- Goldsmith, Maurice M. *Private Vices, Public Benefit: Bernard Mandeville'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Hoek, Dale ed. *The World of William and Mary: Anglo-Dutch Perspectives on the*

- Revolution of 1688-8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Holmes, Geoffrey. *The Making of a Great Power: Late Stuart and Early Georgian Britain, 1660-1772*, London: Longman, 1993.
- Hont, Istvan and Michael Ignatieff ed. *Wealth & Virtue: 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Jealousy of Trad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05.
- Hundert, Eric J. *The Enlightenment's Fable: Bernard Mandeville and the Discovery of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Israel, Jonathan ed. *The Anglo-Dutch Moment: Essays on Glorious Revolution and its World Impac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Radical Enlightenment: Philosoph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ty 1650-175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Enlightenment Contested: Philosophy, Modernity, and the Emancipation of Man 1670-175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A Revolution of Mind: Radical Enlightenment and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Modern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 Jack, Malcolm. *Corruption & Progress: The Eighteenth-Century Debate*. New York: AMS Press, 1989.
- Jardine, Lisa. *Going Dutch: How England Plundered Holland's Gl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8.
- Knott, Sarah. *Sensibility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9.
- Koselleck, Reinhart. *The Practice of Conceptual History: Timing History, Spacing Concepts*, trans. Todd Samuel Presner and Other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Malcolmson, Robert W. *Popular Recreations in English Society, 1700-18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 McKendrick, Neil, John Brewer and John H. Plumb. *The Birth of a Consumer Society: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London:

Europa Publications Limited, 1982.

McNally, David.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A Reinterpre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arker, Geoffrey. *Europe in Crisis, 1558-1648*. Oxford: Blackwell, 2011.

Pincus, Steven. *1688: The First Modern R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ocock, J. G. A.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Florentin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Atlantic Republican Tra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 *Virtue, Commerce, and History: Essays on Political Thought and History, Chiefl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Barbarism and Religion vol. 2: Narratives of Civil Govern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Rasmussen, Dennis. *The Problems and Promise of Commercial Society: Adam Smith's Responses to Rousseau*.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8.

Reinert, Erik S. "Emulating Success: Contemporary Views of the Dutch Economy before 1880", in Oscar Gelderblom e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Dutch Republic*, Burlington: Ashgate, 2009.

Robertson, Joh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at the limits of the civic tradition", in Hont and Ignatieff ed., *Wealth & Virtue: The Shaping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137-178.

——— *The Case for the Enlightenment: Scotland and Naples 1680-176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Rothschild, Emma. *Economic Sentiments: Adam Smith, Condorcet, and the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The Inner Life of Empires: An Eighteenth-Century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Rivers, Isabel ed. *Books and Their Readers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New Essays*. London: Continuum, 2001.

Roseveare, Henry.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1660-1760*. Essex: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1991.

The Treasury 1600-1870.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3.

Schumpeter, Joseph A. *Capitalism, Socialism & Democracy*, London: Routledge, 1994.

Taylor, Charles. *A Secular A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Thomas, Keith. *The Ends of Life: Roads to Fulfilmen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Wahrman, Dror.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Self: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Englan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Winch, Donald. *Riches and Poverty: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Britain 1750-183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Financial Revolu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Commercial Society: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Alvin Che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late-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and the emergence of a commercial society in early-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In this article, I argue that late-seventeenth-century English intellectuals' advocac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financial institutions reveals their awareness of the necessity of correspond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making progress toward a more commercialized society.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during that period was dependent on the emergence of a new commercial society, which was a central topic of discussion among eighteenth-century British intellectuals. I also argue that the financial revolution, late-seventeenth-century discussions of political arithmetic, and eighteenth century debates on luxu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dicated that English and (after 1708) British intellectuals were aware of transformations that had taken place in social and economic behaviors. Consequently, these behaviors transformed their mentality, distinguishing them from their predecessors.

Keywords:

Financial revolution commercial society commerce Bank of England political arithmetic

* M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Queen Mary University of London.

從 *A Woman in Berlin* 觀察 柏林戰役中蘇聯紅軍的性暴力 *

廖容慈 **

編者按：本文原為 99 學年度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林維紅老師為大學部學生開授的「數位資源與史學研究」課程報告。而本刊徵得林老師同意後，在文後刊載當時的作業說明，供讀者參考。

2013 年 3 月收稿，2013 年 10 月通過刊登。

* 致謝辭：本文原為 99 學年度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林維紅老師為大學部開授的「數位資源與史學研究」課程報告。筆者修改之後投稿《史繹》，並於 2013 年 12 月「第 38 期《史繹》成果發表會」，由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林宜璋代宣讀。這份報告，是筆者大一時第一次依照老師規定的架構、格式，撰寫比較嚴謹的讀書報告。當時雖投入相當力氣爬梳歷史背景、尋找西文資料、閱讀專書論文才下筆，然而事隔兩年重新翻看，依然覺得當時的自己對語言、史料或文獻的掌握相當有限。在此感謝維紅老師的鼓勵，讓我憑著外系生的憨膽踏入歷史世界，至今收穫無窮。

**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99 級學生、雙主修歷史學。

- 一、 研讀主題說明
- 二、 研究文獻解題
- 三、 史料解題
- 四、 結語
- 五、 檢索過程、學期學習心得與建議

一、 研讀主題說明

(一) 研讀主題的意義

戰爭的暴力常以可見方式在城市、人民身上留下傷痕，但暴力的各種形式可見程度各異。殘肢斷臂與建築的殘破遺跡相仿，憂鬱創傷則是內在的損害，一點一點碎裂。性暴力廣泛的存在於戰爭當中，從荷馬史詩描述戰勝的英雄以敵方女眷作為獎賞，便可略知一二；中世紀基督宗教內部、與穆斯林之間的宗教戰爭，20世紀東歐南斯拉夫、非洲剛果的戰爭與種族侵略當中，以強暴作為清洗的手段，也揭露戰爭當中性行為的特定意識。選擇特定的大規模性暴力案件加以討論，便使我們能夠透過歷史文獻、研究報告、個人見證等資料，以歷史角度理解、觀察戰爭受害者的經歷與面貌，並嘗試提供往後繼續探索的途徑。

本文將討論的歷史事件，是由 *A Woman in Berlin* 這本柏林女子的日記所開啓。以下將從史料與二手研究，試圖認識蘇聯在二戰後期於柏林戰役（Battle of Berlin，1945年4月16日至5月2日）的性暴力事件。這份報告將在課程要求的框架下，選取不同種類、語言的材料進行整理與討論。無名氏（亦有認為是德國記者 Marta Hillers）於1954年在美国出版的日記，揭開了「解放」背後的代價，

對於戰爭與正義、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隱隱造成挑戰。此書不僅在當時引起美國、德國的討論，晚近也重新出版（2003年）、改編成電影，使這份戰爭回憶以歷史、文學、大眾文化等角度，幾次在社會閱聽群眾之中激起漣漪。

1945年4月，二戰歐洲戰局已然進入尾聲，英美蘇協談討論戰後劃分德國、如何突破柏林，而最後是由蘇聯紅軍攻下德國首都。當蘇聯向東普魯士進軍，內梅爾斯多夫屠殺事件（Nemmersdorf Massacre，1944年10月21日）當中劫掠與強暴的消息便逐漸散播。儘管可能是納粹政宣傳部門刻意誇大的恐慌策略，¹但強暴的事件在紙本或影像的口述歷史紀錄當中逐漸浮現。柏林歷史的創傷故事，目前在臺灣仍相對缺乏研究。有鑒於此，研讀外文史料以及二手文獻，除了幫助我們深入理解近代歐洲政治社會史，也有益於中文世界開展戰爭史研究的新方向。

在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當中對於女性在戰爭中的討論，較常聚焦於前臺籍慰安婦被迫對日軍提供性服務一事。此事與柏林婦女受暴固然是兩起獨立事件，但若就戰爭中女性境況而言，兩者之間不無可供參考之處。在二戰結束、冷戰危機解除、各地民主化運動普及之後，學界對於戰爭犯行的討論開始增加，西文資料對於軍民「私通」（liaison）的論述角度日漸多元，也不限於俄國。²在此情況下，我希望能從他人的研究中，了解由性別、族群、

1 Antony Beever, *The Fall of Berlin 1945* (New York: Penguin, 2003), 28.

2 有關二次大戰美軍與法國女性的羅曼史迷思、性交易、性侵等，參見 Mary Louise Roberts, *What Soldiers Do: Sex and the American GI in World War II Fra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對美軍在德奧佔領區的親善、反親善、性關係之研究，見 Perry Bidiscombe, "Dangerous Liaisons: The Anti-Fraternalization Movement in the U.S. Occupation Zones in Germany and Austria,"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34:3(2001):611-647. 對於英軍從 D-Day 至戰勝期間於

個人見證等視角看待這段歷史的方法。

A Woman in Berlin 這本柏林女子的日記，使我興起觀察二次大戰中柏林戰役的念頭。時居柏林城居的女性，在柏林陷落的過程中，有過甚麼遭遇？戰爭中的性暴力在當下得以施展、數十年後得以訴說，向我們顯露了哪些可能的身體、政治意涵？除此之外，我也希望從中理解，為何二戰以後對於柏林受暴婦女的討論，會引起學界諸多爭議，激發媒體論爭。蘇聯在二次大戰中屬於同盟國，在戰爭的末期揮軍征服柏林，當勝利的戰歌與戰敗受暴者的求救呼聲齊響，聽者的感官又是如何選擇？

（二） 相關時代脈絡

1945年1月12日，蘇聯發動維斯瓦河—奧德河攻勢，同時啓用白俄羅斯第一方面軍及烏克蘭第一方面軍兩支軍隊，自維斯瓦河出發，解放華沙，同時向德國前進，三週內經波茲南抵達波德邊境的奧德河畔，以200萬大軍揮擊僅有40萬名兵員的德意志國防軍（Wehrmacht），並於1月27日解放波蘭境內的奧斯威辛集中營（Konzentrationslager Auschwitz-Birkenau）。戰役在2月2日結束，紅軍隨後於2月8日發動西里西亞攻勢，在柏林東南方地區清除可能威脅烏克蘭第一方面軍的德國勢力，以備將來進軍柏林，此一攻勢於2月24日結束。蘇聯進攻柏林的計畫原定於2月進行，但紅軍當時也面臨軍情以及軍員調配問題：烏克蘭第一方面軍的主要任務是保護白俄羅斯第一方面軍的左翼，其右翼由白

德國的性暴力，詳見 Sean Longden, *To the Victor the Spoils* (London: Constable & Robinson, 2007)。歷時較長，討論兩次大戰與戰間期英軍的不法行為，請參考 Clive Emsley, *Soldier, Sailor, Beggarman, Thief: Crime and the British Armed Services since 191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俄羅斯第二方面軍所保護，然而掃除右翼威脅的東普魯士攻勢代價極高，且東波拉美尼亞地區的戰事推遲了進攻柏林的計畫，導致此軍事行動到 4 月 25 日結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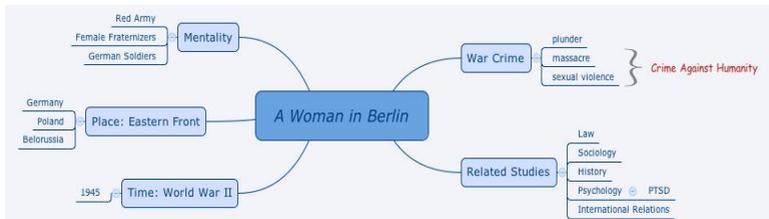
於此同時，同盟國熱烈討論柏林一城的地位。無可懷疑，第三帝國的首都柏林是歐洲戰場最大的目標，蘇聯從東邊出兵，即圖與西線軍隊合作夾擊柏林。但究竟是誰的軍隊有足夠軍力以及正當性獲得終點的勝利、又該如何搶先，是英美蘇領袖仔細思考的問題。3 月 27 日，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 1887-1976）致電遠征軍最高司令部，向歐洲盟軍最高指揮官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 1890-1969）請求單獨突擊柏林，但遭到拒絕，因為艾森豪為安全考量，堅持以寬大正面攻勢取代狹窄縱深突擊。³ 除此之外，艾森豪也認為這座城市已經失去重要性，向英國首相邱吉爾（Sir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 1874-1965）表示，柏林不再是主要軍事目標，並且在 3 月 28 日致電蘇聯最高統帥部，表明和紅軍進攻德勒斯登、萊比錫，切斷德軍防線，加快蘇軍進攻柏林的速度。此一決定引起軒然大波，英國方面表示震怒，美軍內部也產生歧見。儘管艾森豪誓言已出，各國軍隊仍暗自以柏林為目標較勁。

根據大英百科全書條目紀錄，蘇聯元帥朱可夫（Georgy Konstantinovich Zhukov, 1896-1974）帶領白俄羅斯第一方面軍，於 1945 年 4 月 16 日聯合蘇聯元帥科涅夫（Ivan Stepanovich Konev, 1897-1973）的烏克蘭第一方面軍橫渡尼斯河（Neisse River），並

3 卡爾·巴姆著；張國良、史強譯，《強擊柏林》（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年初版），頁 40。譯自：Karl Bahm, *Berlin 1945: The Final Reckoning* (Minneapolis: Zenith Press, 2001).

在一周之內進入柏林郊區。4月25日，朱可夫和柯涅夫的聯軍已經包圍柏林，前者守住北部及東部，後者於南面隨時準備進攻，此外連結了美國軍隊，在易北河（Elbe River）組成聯合陣線。⁴蘇聯紅軍隨即進入柏林。此役也是朱可夫、涅科夫軍隊的較勁時刻，兩人處心積慮奪下柏林：科涅夫的軍團先攻佔柏林，但在德國國會大廈（Reichstag）升起紅軍旗幟的則是朱可夫的軍團。經過17天，這場柏林戰役在5月2日畫下句點，德軍戰敗投降。紅軍從蘇聯進入柏林的過程中，經常發生士兵搶劫物資、強暴婦女等事件，受害者估計約有十萬人。

（三） 心智圖



（四） 關鍵字表

sexual violence, mass rape, Battle of Berlin, Marta Hillers, Red Army

（五） 名詞解釋

1. Sexual violence

4 The New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15th ed., s.v. “World Wars.”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簡稱 WHO）於 2002 年發表的世界暴力與衛生報告，性暴力的定義是：不論時間、地點、關係，以強制手段達成或意圖與人性交，或以強制手段達成的性暗示言論，或其他計畫性的壓迫行為，包含（但不限於）家庭與工作場所的性暴力。⁵ 性暴力是未經當事人同意、非當事人自願的性行為，也包含性騷擾與性侵害的行為。除此之外，中華民國性騷擾防治法（2002）當中對性騷擾的定義，是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⁶

2. Mass rape

強暴（rape）是指違反被害人意願的性交，尤其是在被威脅以及受暴的情況之下所發生的性行為。加害人並不限於男性，受害人也可能是男性、女性、老人，或兒童。大規模的強暴（mass rape）常出現在戰爭當中，對於被占領地區的受害者造成身心創傷。例如第二次大戰（1939 -1945）時軍隊對佔領區婦女的強暴，以及種族滅絕（genocide）事件，如盧安達事件（1994 年 4 月到 6 月），其目的或為報復，或是有計畫的阻絕某一種族繼續繁衍。

3. Battle of Berlin

柏林戰役（Battle of Berlin，1945 年 4 月 16 日至 5 月 2 日），是結束二次世界大戰德國戰場的主要戰役之一，和不列顛戰役

5 Etienne G. Krug, L. L., James A. Mercy, Anthony B. Zwi, Rafael Lozano, *World Report On Violence and Health*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149-181.

6 全國法規資料庫：性騷擾防治法，<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74>（2011 年 6 月 10 日檢索）。

（Battle of Britain）、大西洋海戰（Battle of the Atlantic）、諾曼第登陸（Normandy landings）同列為歐戰當中的重要戰役。4月16日，蘇聯元帥朱可夫與科涅夫的聯軍橫渡尼斯河，在一周內抵達柏林郊區，包圍柏林。蘇聯紅軍和美軍組成聯合陣線，然而首先進入柏林城內的是蘇聯紅軍。⁷朱可夫的軍團得到史達林的授權，佔領德國國會大廈，在頂樓升起蘇聯旗幟。這場戰役持續了17天，在5月2日畫下句點。期間，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在4月29日與女友愛娃·伯勞恩（Eva Braun, 1912-1945）結婚，根據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德國史教授瑪麗·富布盧克（Mary Fulbrook）的說法，希特勒與其妻翌日共同自殺身亡，遺體隨即由侍從火化。⁸

4. Marta Hillers

Marta Hillers（1911-2001），是一位德國記者，在納粹時期曾在報社及雜誌社工作，也被認為是自傳體日記 *A Woman in Berlin: Eight Weeks in the Conquered City* 的作者。⁹ Hillers 本人雖非納粹黨員，但在納粹時期曾經短期擔任宣導員，負責編輯招募令。此書最早於1954年在美国以匿名由 Kurt Marek 出版。2003年，德國報社編輯 Jen Bisky 在 *Süddeutsche Zeitung* 指出，Marta Hillers 就是這本日記的作者。同年，德國文學家 Hans Magnus Enzensburger 將這本日記再版發行時撰文表示，日記仍應該以匿名方式出版，並且

7 參考：卡爾·巴姆著，張國良、史強譯，《強擊柏林》。

8 瑪麗·富布盧克（Mary Fulbrook）著，王軍璋、萬方譯，《劍橋德國簡史：一個不斷尋找自我的國家》（臺北：左岸文化，2006年初版），頁283。譯自：Mary Fulbrook, *A Concise History of German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9 Anonymous, translated by Philip Boehm, *A Woman in Berlin: Eight Weeks in the Conquered City: A Diary*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Henry Holt, 2005).

認為 Jen Bisky 公佈作者姓名是無恥 (shamelessness) 的行為。¹⁰

5. Red Army

根據大英百科全書，蘇聯紅軍 (Red Army) 是蘇聯在十月革命 (October Revolution, 或稱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 年 11 月 7 日) 之後，由共產黨政府建立的軍隊。這個名稱從 1917 年開始使用，一直到 1946 年後，才改成蘇軍 (Soviet Army)。¹¹ 蘇聯紅軍從 1917 年到 1946 年之間歷經許多戰役，如 1917 年到 1922 年之間的俄國內戰 (Russian Civil War)、1941 年 6 月 22 日到 1945 年 5 月 8 日的德蘇戰爭。蘇聯紅軍人數在二戰期間達到高峰，而在戰後逐漸減少，最後在 1946 年改稱為蘇軍，編制改為陸海空三軍。

(六) 檢索思考過程

這學期 (99-2) 我在歷史所旁聽 Omer Bartov 教授的選修課程，課名是 *The Holocaust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歷史觀點下的猶太人大屠殺)。透過解讀一手文獻、二手研究，教授帶領大家接觸歐洲反猶主義的思想，檢視社會輿論、政府宣傳，思索迫害行為背後繚繞的意識形態。高中時從文庫讀本約略瞭解反猶主義簡史，現在通過 Bartov 教授、UCLA 教授 Saul Friländer、法國紀錄片導演 Claude Lanzmann 等人的紀錄觀點與詮釋，對於猶太人大屠殺有比較深入的認識。在此之外，我也進一步認識二戰時期德國百姓的生命故事，尤其對戰爭末期民眾處境感到好奇。二戰期間，猶太人遭逮捕送往集中營屠殺的消息若有似無的出現在街頭巷尾，

¹⁰ Luke Harding, "Row over naming of rape author," *The Observer*, October 5, 2003.

¹¹ The New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5th ed., s.v. "Red Army."

有些民眾感覺到氣氛轉變，也有人毫無所悉；既然如此，戰敗的結果，以及希特勒是個邪惡獨裁領袖的事實，是否曾經困擾德國民眾？全民都要接受「罪人」的身分，以及可能受到的制裁迫害，又產生了什麼衝擊？

和老師討論並且反覆思索以後，從安東尼比弗（Antony Beevor）寫的 *The Fall of Berlin 1945* 開始閱讀，並幸運地在圖書館借到 *A Woman in Berlin: Eight Weeks in the Conquered City*。這本匿名戰時日記是比弗相當重視的受害者見證。比弗在書中討論到，蘇聯紅軍從波蘭出發進攻柏林的同時，一路上便有性暴力事件傳出，受害者來自波蘭、白俄羅斯或烏克蘭，因此可以觀察的地理範圍與族群很廣。原本計畫討論二次大戰時期歐戰軍隊的性暴力，包含盟軍各國以及各地輿論報導，但是涵蓋的時間、地點超出能力所及，恐怕無法細緻討論此一主題的關鍵問題。經過幾次比較，並重新檢視書中提供的資訊，發現柏林乃至德國各地居民，多經由口耳相傳或其他媒介，得知性暴力事件不斷發生，因此相當懼怕紅軍到來，我認為這樣的事件值得縮小範圍檢視，遂決定以德國境內婦女為觀察對象，進一步閱讀相關文章與史料。

學期中的某日，林老師找同學們談期末報告的內容和方法。經過詳談，老師認為我設定的範圍還是太大，不如以 *A Woman in Berlin* 這本書為中心，用以了解柏林戰役（Battle of Berlin）期間蘇聯紅軍對柏林婦女的性暴力。我希望從一手資料中得知當時人民對於大規模性暴力的真實想法，學者如何看待蘇聯紅軍的角色，以及當事人和下一代如何回憶歷史。除此之外，紅軍作為戰勝者和加害者兩種身分之間的矛盾，以及德國人戰敗而受害不能發聲的處境，也是我很想深入了解的議題，雖未必能在這次的報告中

一起討論，但相信是心中長期關懷的主題。

二、 研究文獻解題

(一) “Sexual Violence in World War II, 1939--1945”¹²

這篇於 2009 年 3 月於哥倫比亞大學 *Politics & Society* 期刊登出的論文，是東北大學教授 Jeffery Burds 對於二次大戰當中德蘇戰爭的性暴力的回顧。全文分為四節討論德國意識形態、在東線戰場的性暴力，以及蘇聯軍隊在德國的大規模性暴力。透過德國在種族與性別的論述、法律與禁令，作者勾勒出納粹時期德國國內與前線的衝突：儘管種族純淨一直是納粹的重要信條，這項命令在前線卻難被遵守。斯拉夫民族女性受暴者為數頗為眾多，儘管在當時被納粹列為次等人（Untermenschen, sub-human），不同種族之間的性行為、性暴力依然存在，其中也包括待處決的猶太人。另一方面，因為隨行軍妓無法負荷過多軍人，當地也有些女性以身體換取較好的生活條件。儘管目前仍缺乏對於德軍在東線戰場的性行為研究，作者認為德軍在蘇聯境內的性行為，有相當程度伴隨著暴力與虐待。

經過德軍在蘇聯境內的性暴力，紅軍於 1945 年向德國進軍的過程中也出現許多報復的性暴力。戰場上同袍傷病而亡、被俘的同胞受到蹂躪，納粹的行為在蘇聯士兵的眼中缺乏人性，兩種情緒除了在殺敵的時刻得以宣泄，也另外在平民女性的身上找到出口，某種意義也是「血債血還」。而在強制性交、受孕、虐待之外，

¹² Jeffery Burds, “Sexual Violence in World War II, 1949--1945,” *Politics & Society* 37:1 (2009): 35-75.

性虐致死、毀屍、褻瀆的行為也曾發生，曾有德國女性虐死後被割去雙乳，或以十字架的姿勢裸身被釘死。由於性與繁衍的關聯被特別放大，女體在戰爭中也就承載了國族意識，成為不可奪走的一種物質、一種價值，也因為如此，戰爭結束之後對於與敵親善（fraternize）的婦女也有諸多撻伐，西歐地區、法國尤為可見。作者透過詳盡的口述與檔案資料，呈現德軍對於東歐民族的歧視、施暴，進一步理解支持蘇聯紅軍性暴力的集體意識為何，並嘗試建立過去時空當中，德國與蘇聯軍人、婦女的態度與策略。

（二） “The Price of Victory, the Cost of Aggression”¹³

本文作者 Alexander Orlov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蘇聯中尉，在戰爭中的性暴力相關討論中，提供了蘇聯軍人的立場與看法。他在文中對於英國歷史作家 Antony Beevor 在 2002 年出版的 *Berlin: The Down Fall 1945* 一書有所評論，認為書中關於蘇聯紅軍的描寫有失公允。Orlov 認為，柏林戰役期間固然發生軍人強暴婦女事件，但這卻是所有戰爭的普遍現象。他提到，德軍佔領東歐地區時，對人民十分殘暴，相較之下，紅軍進入柏林之後用比較平等的方式對待德國人民。儘管紅軍對德軍滿懷恨意，但 Orlov 認為紅軍在德國境內的軍隊暴動只是給德國一點回擊，比德軍在蘇聯的舉止輕微許多。在當時，許多紅軍士兵的親友都被德軍屠殺或虐待，因此他認為這樣的紅軍的怨恨心理是可理解的。

A Woman in Berlin: Eight Weeks in the Conquered City 一書中曾提到紅軍士兵搶奪民宅財物、糧食，也提及大規模強暴事件，

13 Alexander Orlov, “The Price of Victory, the Cost of Aggression,” *History Today* 55:4(2005): 24-26.

Orlov 對此書提及的事件提出看法，認為劫掠行為並不頻繁發生，但強暴確實存在。但他也特別指出，在這波混亂當中，有許多竊盜犯把自己犯的罪行嫁禍在紅軍身上，例如遣返過程中的部分義大利人、荷蘭人，甚至德國人都可能是竊盜犯，他們擔心自己犯罪要承擔後果而嫁禍給紅軍。

這篇是少數以紅軍身分回應史學界批評聲浪的文章，列舉許多案例說明紅軍行為並不異於其他軍隊，軍官也曾嘗試規範脫序騷擾行為。作者也指出 Antony Beevor 的歷史書寫尚有闕漏，除了史料收集不全之外，還可能誤用數據，因此提出質疑。但在提問以外，更需要關注的是紅軍被放在顯微鏡下觀察的現象，學者單向討論紅軍對他人施加性暴力，卻未論及此前蘇聯人民遭受極大迫害，學術輿論的不平衡，是本文作者心中的懸而未決的疑問。

(三) “Rape in Berlin: Reconsidering the Criminalization of Rape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Armed Conflict”¹⁴

除了歷史學之外，戰爭性暴力也是近 30 年的國際法焦點。哈佛大學法學教授 Janet Halley 一篇近 50 頁的文章，便討論二戰後戰爭性暴力與國際法沿革，以及她對 *A Woman in Berlin* 這部日記的解讀與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主義者在專業領域的努力，是婦女議題受到關注的重要原因，然而作者看待判決觀點的演變，仍帶有一些疑問，懷疑將性暴力作為一種強烈的罪行，是否為女性主義者所樂見。戰爭性暴力的法律案件，於二十世紀屬前南斯

14 Janet Halley, “Rape in Berlin: Reconsidering the Criminalisation of Rape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Armed Conflict,” *Melbour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9:1(2008): 78-124.

拉夫內戰、盧安達屠殺為首，作者研究這兩案（ICTY, ICTR）的規約，以及 1988 年通過的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提出深刻的疑問：戰爭當中的強暴，是否更有罪？作者的提問並非否定女性主義者的耕耘，而是反思：女性主義漫長、多元的理論，使其在法律上建構的「更高的惡」（superior badness），這種「受暴慘於死」的觀念，卻讓前南斯拉夫的衝突成為一種「反女性」的戰爭（war against women）。這些結果在作者看來是有疑慮的。

作者在第二節詳細討論了女性主義者在國際人權法（IHL）與國際刑法（ICL）努力的過程，使性暴力成為可見的議題，而後提升到一種罪。其結果是：戰爭性暴力擁有特殊化的地位，且須單獨作為一種罪行來審理、對於強暴等性侵罪的證據要求降低，以及被害人當下的同意不能作為被告抗辯的理由。第三、四節當中，作者透過對 *A Woman in Berlin* 內容與出版史的閱讀，理解戰爭性暴力的歷史論述經歷過的改變，並由此觀察法學研究的轉向。由這個文本折射出來的議題，包含了文件的真確性、脅迫與同意、女性與國族，或是更切身的問題：強暴既是戰爭的武器，又能否作為戰爭的理由？除去文本真偽的爭論，其他問題雖從這本日記而生，卻都和二十世紀的兩次大規模種族戰爭有著深刻關連。文本原作者呈現了戰爭當中性所固有的矛盾，以及人類在語言與概念工具對於戰爭性暴力的問題，這些都扣問著當代的法學研究者、女性主義者。

三、史料解題

（一） *A Woman in Berlin: Eight Weeks in the Conquered City*¹⁵

15 Anonymouse, *A Woman in Berlin: Eight Weeks in the Conquered City*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5).

這本由無名氏所寫的日記，被認為是由德國記者 Marta Hillers（1911-2001）所撰，寫於 1945 年 4 月 20 日到 6 月 22 日，記錄了柏林戰役期間蘇聯紅軍對當時城區以及居民帶來的破壞，也記錄了當時普遍存在的性暴力，對於軍隊在當地的性侵行為也多有描述。作者戰前在德國擔任記者，書中有許多篇幅敘述作者本人與紅軍軍官之間的互動，這是因為作者通曉俄、德、法三種語言，在當時是少數能直接與外國軍人溝通的平民，書中因此有許多篇幅敘述她與紅軍軍官之間的互動。作者是戰爭性暴力的受害者，卻也因為自身語言能力而和軍人有所接觸，成為臨時翻譯人員，後又與軍官產生錯綜複雜關係。這本書在 1954 年首度於美國以匿名出版英文版，後於 1959 年由瑞士出版商買下德語版權出版。英國歷史作家 Antony Beevor 在他的著作 *The Fall of Berlin 1945* 當中把這本日記當作重要史料，使得 Hillers 的日記受到更高的注目，對此事件過程、史料真偽的討論也因此增加。

※ 檢索過程：

我在接觸這個題目時，閱讀的第一本書是 Antony Beevor 的 *The Fall of Berlin 1945*，為了尋找更多相關資訊而查詢書末所列的參考書目（bibliography）。閱讀過後對此主題了解較深，認為此役當中女性書寫的一手史料或許並不多見，想進一步咀嚼史料、討論此題，於是就把這本書作為核心史料，閱讀相關的研究文章。

(二) *Outcast: A Jewish Girl in Wartime Berlin*¹⁶

本書作者 Inge Deutschkron 是生長於柏林的猶太人，在這本回

¹⁶ Inge Deutschkron, *Outcast: a Jewish Girl in Wartime Berlin* (New York: Fromm International Pub. Corporation, 1989).

憶錄中談到自己因為種族問題，在二戰期間必須到處遷徙躲藏，而戰後卻在柏林和其他婦女一樣，遭到性暴力的傷害過程，是較為少見的見證。作者在戰後成為記者和自由寫作者，1970年代開始出版許多關於二戰猶太人的小說、回憶錄，到2004年已發表11本書，而這本書也在1990年出版。她在書中特別提到自己遭遇的雙重打擊。在蘇聯紅軍準備進入柏林時，Inge Deutschkron期待軍隊能立即解除納粹政權對猶太人的迫害，卻失望的發現軍人的性侵行為不因國籍而有區別，即便她拿出猶太人的身分證明，也無法倖免於性暴力的下場，因此身心受創。在觀察柏林戰役中的性暴力狀況時，Inge Deutschkron的回憶錄是一部重要史料，證實當時仍有一些猶太人藏匿在柏林，以及大規模性暴力當中，德裔血統的婦女並非唯一受暴者的事實。

※ 檢索過程：

在閱讀相關文獻時，我讀到了一篇關於 *BeFreier und Befreite* 這部紀錄片的評論文章，內容提及記錄片受訪者的姓名，以及她們出版的回憶錄。利用線上資料庫（EBSCO、Jstor、WorldCat、Google Scholar、Google Books）檢索她們的姓名之後，發現這些受害者的回憶錄以德文出版，而 Inge Deutschkron 的回憶錄則以德文及英文出版。雖然臺大圖書館並沒有這本館藏，我還是輾轉在網路上獲得相關的資訊。如果校方有經費可以購入這本書，或許對這方面的研究有所助益。

（三）*BeFreier und Befreite*¹⁷

17 *Befreier und Befreite Krieg, Vergewaltigungen, Kinder*. Sander, H. and B. Jahr. Neue Visionen Medien and Goethe Institut. 2006. Documentary film.

這是一部由德國導演 Helke Sander 製作的紀錄片，共由四種形式的影片構成：一是蘇聯紅軍在進入柏林時所拍攝的影片，二是導演對性暴力受害者的訪談，三是導演對當時參與柏林戰役的蘇聯退伍軍人訪談，四是導演和受暴婦女的兒女訪談。這部影片在 1992 年上映（DVD 於 2006 年發行，也在 2005 年 2 月 15 日發行同名書）時即造成熱烈討論，例如 *October* 期刊 1995 年春季號就以這部影片做為當期討論主題。這部紀錄片全長共 192 分鐘，分為兩個部分，不只討論戰爭中的性暴力，也論及因為這波戰事與性侵而產生的兒童問題。當時有許多婦女墮胎，但是因性侵而產下的嬰兒仍所在多有。導演討論受害者的心態之餘，也突顯受暴婦女與子女之間的情感問題。這部紀錄片是我所發現少數以非文字方式呈現的戰爭紀錄，內容深刻結合當事人的見證與當時的影像紀實，並常是提出新問題。

※ 檢索過程：

我原先並不知道有導演拍攝這一主題的影片，而是在 Jstor 資料庫上閱讀 *October* 期刊時，找到 1995 年春季號的專題討論。文中提到，這部紀錄片以德文發音，配有英文字幕。我猜想這部紀錄片可能發行 DVD，利用搜尋引擎檢索後發現確實如此，這部電影的 DVD 能在亞馬遜網路書店購得。此外，我也發現，這部影片曾在 2009 年於台北電影節公開發映。¹⁸ 不過，當時並未全部播畢，而是播放第一段，約 90 分鐘長的版本。

18 臺北電影節：典藏柏林：解放者得自由 Liberators Take Liberties (Part 1)，<http://tiff2009.pixnet.net/blog/post/24498848>（檢索日期：2011 年 5 月 30 日）。

四、結語

從目前的閱讀資料當中，我發現許多學者討論柏林戰役中大規模強暴事件的焦點多著重於蘇聯紅軍的犯行，並且認為他們是紀律不彰的軍隊。部份婦女研究學者則希望不要將女性角色單純局限於「戰爭下的犧牲者」，或許婦女與軍士的權力關係和心理情感也有許多討論空間。不過，我們也不能忽略女性主體性（subjectivity）與能動性（agency）的問題。討論戰爭中女性與敵軍的特殊性關係，常會陷入一個疑問：雙方的意願為何？又何謂「自願」？特殊情況下以身體交換食物、避難所，甚至多一天的生命，儘管兩情相悅，壓力下的自發行為依舊很難被稱為全然自願。同樣的主題之下，仍有許多可討論的議題，例如軍妓。

在文獻資料中，有些指控蘇聯的惡行惡狀，也有些為蘇軍辯護。受暴婦女的見證，也分為德國人與猶太人兩派，兩者陳述方式也各有不同。相異立場刺激了對於婦女史與戰爭史的想像。我瞭解到，蘇聯紅軍的大規模強暴事件，或許還有洩慾以外的其他因素，甚至洩慾並非首要因素。德國進軍蘇聯時沿途所經之處，也都發生多起虐待事件。平民遭受性暴力，或是其他生命威脅虐待，在此情況之下有許多百姓死於軍人之手，因此蘇聯軍人的犯行可能是基於報復心態所致。另外，在受暴婦女方面，由於族群差異以及戰後階級逆轉，德國婦女與猶太婦女的感受也有不同。猶太婦女在納粹德國受到迫害，戰事接近尾聲時，原本以為可以獲得自由，卻又在蘇軍佔領時受到二次暴力。德國婦女則認為蘇聯紅軍有許多來自中亞地區的軍人，相較於德國，是比較落後而且野蠻的民族，她們的心態也反映納粹政府對民眾的積極宣導深入民心。

至於紅軍的勝利是否壓抑了受暴者對蘇聯的譴責，我還沒有定論。有些研究文章嚴正批評蘇聯紅軍的暴力行為，但是許多新

的疑惑因此產生。關於美軍、英軍的性暴力資料，在資料庫、專書中相對少見許多。同樣在二次大戰當中，其他軍隊應該也有性暴力事件發生，為何歷史學家獨獨譴責蘇聯呢？或許將來應該綜合比較戰爭當中的其他戰役，討論盟軍各國在大小軍事行動的正當性，以此觀察學者評價軍隊以及歷史事件的標準。

五、檢索過程、學期學習心得與建議

這份讀書報告，是我這年寫的第一份正式報告，也是我這學期最大的負荷。但我在寫報告的過程中學到很多，也試著思考歷史論爭的問題意識。寫作過程用了上課學習的檢索方法，也額外閱讀一些從未接觸過的專書、期刊、評論文章。利用網路資料庫檢索的過程中，我發現列出關鍵字是我最感困難的部份。起初不熟悉學者撰寫論文的思路架構，自然無法猜出作者文章的核心要旨應該歸納為哪些字串，因此往往只能從最基本的字彙開始，利用布林邏輯重複查找，好不容易找出一些篇章，反覆練習以後，漸能順利掌握關鍵。此外也感到很幸運得到林老師的建議，讓我報告的範圍不致太廣而無法掌握，因此在縮小範圍討論單一事件以後的撰寫過程都算順利。這學期在 Omer Bartov 教授的課上也獲得許多前所未聞的思考刺激，幾次向他請教都獲得相當正面的回應。透過 Bartov 教授的介紹，我才有機會和婦女研究學者，同時也是美國庫柏聯盟（Cooper Un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Art）的歷史學教授 Atina Grossmann 通信討論戰爭性暴力的史料、專書，以及她的著作。但很可惜的是，這些書在臺灣非常少見，只有一本收錄為國立成功大學的館藏，在學期未來不及以館際調閱的方式運來台大，而無法當作這次報告的閱讀資料。¹⁹ 從 Google Books 提供的篇章看來，此書是這一主題的重要著作，令人非常期待。

¹⁹ Atina Grossmann, *Jews, Germans, and Allies: Close Encounters in Occupied German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徵引及參考書目

雜誌文章

- Harding, Luke. "Row over Naming of Rape Author." *The Observer*, October 2003.
- Joseph, Kanon. "'A Woman in Berlin: My City of Ruin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4 2005.

期刊論文

- Craig, Gordon and Antony Beevor. "The Fall of Berlin 1945."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49: 9(2002): 46-7.
- McCormick, R. W. "Rape and War, Gender and Nation, Victims and Victimiziers: Helke, Sander's BeFreier und Befreite," *Camera Obscura* 46:16 (2001): 98-141.
- Orlov, Alexander. "The Price of Victory, the Cost of Aggression." *History Today* 55:4 (2005): 24-26.

專書

- 瑪麗·富布盧克著，王軍瑋、萬方譯，《劍橋德國簡史》，臺北：遠足文化，2006 年初版，譯自：Mary Fulbrook, *A Concise History of German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卡爾·巴姆著，張國良、史強譯，《強擊柏林》，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年初版。譯自 Karl Bahm, *Berlin 1945: The Final Reckoning*. Minneapolis: Zenith Press, 2001.
- Anonymous. Translated by Philip Boehm. *A Woman in Berlin: Eight Weeks in the Conquered City: A Diary*.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Henry Holt, 2005.
- Etienne G. Krug, L. L., James A. Mercy, Anthony B. Zwi, Rafael Lozano. *World Report On Violence and Health*.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 Deutschkron, Inge. *Outcast: A Jewish Girl in Wartime Berlin*. New York: Fromm International Pub. Corporation, 1989.
- Grossmann, Atina, Jews, Germans, and Allies. *Close Encounters in Occupied German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網路資源

臺北電影節：典藏柏林 - 解放者得自由 (Liberators Take Liberties (Part 1)) ,
<http://tiff2009.pixnet.net/blog/post/24498848>。

專題書目

(有關 Military Rape in World War II 的書目)

雜誌文章

Beevor, Antony. “‘They Raped Every German Female from Eight to 80’.” *Guardian*, May 1 2002.

Harding, Luke. “Row over Naming of Rape Author.” *The Observer*, October 2003.

Joseph, Kanon. “‘A Woman in Berlin: My City of Ruins’.”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4 2005.

Trump, Donald, and Christoph Gottesmann. “Donald Trump on Mark Singer: ‘a Woman in Berlin’.” *The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1 2005.

期刊論文

Bidisco, Perry. “Dangerous Liaisons: The Anti-Fraternization Movement in the U.S. Occupation Zones in Germany and Austria.”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34:3(2001):611-647.

Bos, Pascale R. “Feminists Interpreting the Politics of Wartime Rape: Berlin, 1945; Yugoslavia, 1992–1993.” *Signs* 31:4 (2006): 995-1025.

Burds, Jeffrey. “Sexual Violence in Europe in World War II, 1939-1945.” *Politics & Society* 37:1 (2009): 35-73.

Craig, Gordon and Antony Beevor. “The Fall of Berlin 1945.”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49: 9(2002): 46-7.

Gottschall, Jonathan. “Explaining Wartime Rape.” *Th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41:2(2004): 129-36.

Grossmann, Atina. "A Question of Silence: The Rape of German Women by Occupation Soldiers." *Liberators Take Liberties* 72 (1995): 42-63.

Halley, Janet. "Rape in Berlin: Reconsidering the Criminalisation of Rape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Armed Conflict." *Melbourn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9 (2008): 78-124.

Heineman, Elizabeth. "The History of Sexual Violence in Conflict Zones: Conference Report." *Radical History Review* 101 (2008) 5-21.

Kazin, Michael. "Our Exceptional Innocence. (Cover Story)." *U.S. News & World Report* 136:23 (2004): 28.

L. M, L. "A Woman in Berlin." *Bitch Magazine. Feminist Response to Pop Culture* 45(2009): 73.

Langenbacher, Eric. "Twenty-First Century Memory Regimes in Germany and Poland an Analysis of Elite Discourses and Public Opinion." *German Politics & Society* 26:4(2008): 50-81.

Liebman, Stuart. "There Should Be No Scissors in Your Mind." *Cineaste* 40 (1995):40-42.

McCormick, R. W. "Rape and War, Gender and Nation, Victims and Victimized: Helke, Sander's BeFreier und Befreite," *Camera Obscura* 46:16 (2001): 98-141.

Merridale, Catherine. "Culture, Ideology and Combat in the Red Army, 1939-45."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1:2 (2006):305-324.

Moeller, Robert G. "War Stories: The Search for a Usable Past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1:4 (1996): 1008-1049.

Morris, Madeline. "By Force of Arms: Rape, War, and Military Culture." *Duke Law Journal* 45:4 (1996): 651-781.

Orlov, Alexander. "The Price of Victory, the Cost of Aggression." *History Today* 55:4 (2005): 24-26.

Roland, Littlewood. "Military Rape." *Anthropology Today*: 13:2 (1997): 7-16.

專書

- Anonymous. translated by Philip Boehm. *A Woman in Berlin: Eight Weeks in the Conquered City: A Diary*.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Henry Holt, 2005.
- Deutschkron, Inge. *Outcast: A Jewish Girl in Wartime Berlin*. New York: Fromm International Pub. Corporation, 1989.
- Emsley, Clive. *Soldier, Sailor, Beggarman. Thief: Crime and the British Armed Services since 191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 Etienne G. Krug, L. L., James A. Mercy, Anthony B. Zwi, Rafael Lozano. *World Report On Violence and Health*.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 Longden, Sean. *To the Victor the Spoils*. London: Constable & Robinson, 2007.
- Grossmann, Atina, *Jews, Germans, and Allies. Close Encounters in Occupied German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 Merridale, Catherine. *Ivan's War: Life and Death in the Red Army, 1939-1945*.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6.
- Naimark, Norman M. *The Russians in Germany: a history of the Soviet Zone of occupation, 1945-1949*. Massachusett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1995.
- Roberts, Mary. *What Soldiers Do: Sex and the American GI in World War II Fra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 Vinen, Richard Charles. *A History in Fragments: Europ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assachusetts: Da Capo Press, 2002.
- Virgili, Fabrice and Branche Rhapsaëlle. *Viols en tempes de guerre*. Paris: Payot, 2011.

附錄

「數位資源與史學研究」期末報告格式及內容規範

期末報告的設計，主要用意在提供學生機會，綜合應用本學期所學得的各項技能，撰寫讀書報告，為未來研究作預備；因之也可說是初步的研究報告，但期末作業還不需是一篇書寫完整的研究論文，不過，經過檢索、閱讀、思考和撰寫的過程，可以為未來研究打下基礎。

各項技能包括：如何利用圖書館及各種網路學術資源和數位資料庫，找尋閱讀探討的主題，利用心智圖整理該主題的基本概念，利用參考工具書定義相關名詞；檢索相關研究文獻，說明探討主題的時代背景（脈絡）、已有的研究成果及其看法；並搜尋相關史料，增進自己對該主題的一手認識。也利用書目管理軟體 EndNote 整理檢索而得的書目資料，並練習引用文獻的學術格式。

報告內容除了主題說明、研究文獻及史料解題、初步研讀心得之外，請務必說明資料檢索過程與心得，包括：研讀主題討論的聚焦、關鍵類別及詞彙的選擇、參考文獻及史料的檢索和選擇等等。

期末報告內容及編排格式

報告請以 A4 紙張列印，並請包括以下各項：

- 一、 封面頁：請列出報告題目、課程名稱、開課教師、學生姓名、系級、學號及繳交日期。
- 二、 目次頁：請以 Word 定義樣式，並列出目次及頁碼
- 三、 正文內容：
 - (一) 研讀主題說明

從 *A Woman in Berlin* 觀察柏林戰役中蘇聯紅軍的性暴力 149

1. 研讀主題的意義，特別是主要提問及相關思考、主題探討範圍相關時代脈絡。
2. 繪製心智圖（概念圖），說明基本提問、主要概念及概念之間的關聯。
3. 列出關鍵字詞表。
4. 名詞解釋（關鍵字詞定義），請試定義四到五個關鍵字詞，每則約兩百字。
5. 說明從發想到訂定研讀主題的檢索、思考過程，尤其是提問和討論觀點的聚焦（研究文獻和史料的檢索細節請分別在第三、四點詳細敘述，此處僅需扼要說明）。
6. 參考文獻出處及本文有需另做解釋之處，請用註釋，並請用註腳（footnote）方式，格式請參考《臺大歷史學報》。

（二）研究文獻解題

請檢索、選擇三到五項與研讀主題相關的研究文獻，包括專書和論文，說明各研究文獻的提問、討論觀點、申論、引用史料、主要看法，以及和你的期末報告主題的相關性。每則解題約 400 字左右。

請說明研究文獻檢索與選擇的過程及結果，包括利用哪些圖書館及資料庫的資源、使用哪些關鍵字和檢索類別、查得筆數、以及如何選擇研讀文獻等。

同樣，參考文獻出處及本文有需另做解釋之處，請用註釋，並請用註腳（footnote）方式，格式請參考《臺大歷史學報》。

（三）史料解題

請檢索、選擇三條到五條相關史料，並做解題。解題的意思是介紹該史料出處、作者、性質、主要內容，以及和你的期末報告主題的相關性。每條史料解題約 400 字。

同樣，請說明史料檢索與選擇的過程及結果，包括利用那些圖書館及

資料庫的資源、使用哪些關鍵字、檢索類別、查得筆數、以及如何選擇研讀史料等。

史料出處及本文有需另做解釋之處，仍請用註釋，並請用註腳（footnote）方式，格式請參考《臺大歷史學報》。

（四） 結語

請就目前已有研讀成果，說明對所提問題可能的回答。由於這只是初步練習，請瞭解當未來讀得更多、有機會接受進一步訓練、思考精進之後，可能會修訂目前的意見，甚至會產生相當不同的答案。

任何研究都需循序漸進，從基礎功的扎實練習上路，逐漸產生自己的看法：這學期的訓練，只是踏出第一步，但希望從此開始，自圖書館和數位資源利用的學習，加上閱讀、思考和寫作，終能逐漸進入史學研究的殿堂。若需註釋，仍請採用以上相同格式。

（五） 檢索過程及學期學習心得與建議

檢索心得請包括進步和挫折，尤其是上這門課之前與之後，對於圖書館與數位資源利用的認識及應用，特別是和史學研讀的關係，有沒有甚麼樣的新認識或學習的改變？對於這門課的課程設計和教學，有甚麼改進的建議？或值得肯定、覺得有收穫的方面？其他心得及意見？

（六） 書目

練習使用 EndNote 的匯出、匯入格式，建立書目。請依文獻及語言類別製作書目，不同語言的文獻請分列，專書、論文、史料、書評、數位資源等也請分列。

1. 徵引書目：期末報告正文中所引用的書目。
2. 專題書目：依據期末報告檢索過程中所找到的文獻，選擇一個主題，製作專題書目：請列出主題名稱，書目最多約 40 筆。

書介：
馮客，《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 年
的中國浩劫史》*

作者：馮客（Frank Dikötter），譯者：郭文襄、盧蜀萍、陳山

臺北：印刻文學，2011。

英文版：Frank 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0.

林明波**

為了「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中國在上世紀 50 到 60 年代之交付出慘重的代價，馮客把這段歷史稱為「中國史無前例的毀滅性浩劫」（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同時也是本書的副標題。有關大躍進運動及隨之而來的大饑荒，長久以來都是一個熱門的話題，但是，系統性地探討這個問題的著作，卻相當稀少；本書為填補這個空白作出了有益的嘗試，馮客也憑藉本書獲得了

2013 年 7 月收稿，2013 年 10 月通過刊登。

* 致謝辭：本文原為 101 學年度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陳永發老師開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二）」課程報告，筆者修改後投稿《史繹》，並於 2013 年 12 月「第 38 期《史繹》成果發表會」，由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龐志豪同學代宣讀。筆者感謝匿名審查人提供的珍貴意見。本文所有問題由筆者自負。

** 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公共行政組 98 級生、雙主修歷史學

英國廣播公司 2011 年度塞繆爾·約翰遜獎（Samuel Johnson Prize）。馮客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架構，指出大躍進的慘劇是由毛澤東為首的中共極權體制一手造成的，幾乎每一個黨和政府的幹部都參與其中，最終把整個國家帶到崩潰的邊緣。他引用了大量檔案資料和訪談內容，揮舞著他的生花妙筆，試圖把這場災難的全景呈現在讀者面前。

全書分為六篇共 37 章。第一篇〈追逐烏托邦〉（The Pursuit of Utopia），講述毛澤東為了與蘇聯一爭長短，一意孤行發動大躍進。經歷反右運動的洗禮，上至周恩來、鄧小平等高幹，下至一般平民百姓，人人噤若寒蟬，沒有人敢對毛的激進做法提出異議，大家都投入了火熱朝天的「超英趕美」浪潮。在地方幹部的強制推動下，全民大修水利、大放衛星、大煉鋼鐵、大搞人民公社集體化。

第二篇〈穿越死亡谷〉（Through the Valley of Death），為了保證城市居民生活品質和出口貿易平衡，大規模向農村徵糧，饑荒的苗頭開始出現，更被迫從「帝國主義」國家進口糧食。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提出糾正錯誤，結果掀起反擊右傾機會主義的風潮，敢言幹部紛紛被打倒，已經無人可以制止這列瘋狂的列車前進。等到 1961 年大躍進完全失控，才由劉少奇、李富春等出面主持「策略性撤退」。

第三篇〈毀滅〉（Destruction），分述這場盲動冒進的生產運動，對農業、工業、貿易、住房和自然等國計民生領域造成的毀滅性破壞，超額的糧食徵收和人民公社管理混亂，使農村人口在生死線上掙扎。工業生產重量不重質，工人生活環境惡劣，使工

業產值大減。對計劃經濟的過份依賴使得商品奇缺，商貿流通陷入停頓。集體化把老百姓從他們的住房中趕出來，騰出來的空間用來建設政府的「面子工程」建築。為了大煉鋼鐵，樹木作為燃料被大肆砍伐，劣質水利工程使洪水的威力不減反增，空氣、江河湖泊被有毒化學物質污染。

第四篇〈求生百態〉（Survival），在生死邊緣，大小官民為求活路，紛紛各出奇謀以苟全性命於亂世。農村居民出逃避荒，城市裡黑市交易蓬勃，暗處有人偷摸搶劫，黨幹倒賣物資大吃大喝，以上行為完全脫離了計劃經濟和極權體制的設計框架，全國亂象紛呈。

第五篇〈弱勢群體〉（The Vulnerable），重點關注大躍進運動中的弱者：小孩、婦女與老人。在這個效率至上、「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年頭，他們被虐待凌辱最後身死的故事奏出一曲時代的哀歌。

第六篇〈死因〉（Ways of Dying），詳細分析了這場浩劫中大量人口死亡的原因：除了饑餓以外，還有勞累致死、傳染病、法西斯式暴力鎮壓與打殺，甚至出現人吃人的狀況。最後，馮客綜合手上各種資料及前人的研究，判斷在大躍進中非正常死亡人數不下於 4500 萬。

本書與其他研究大饑荒的作品相比，到底有什麼特色？馮客自己的說法是，以往的著作都把大躍進期間中共高層的權力鬥爭（如「反冒進」、廬山會議等）與民間的悲慘遭遇孤立開來，他的工作就是要把這兩個分離的層面進行連結，告訴我們黨國菁英如何

把這場史無前例的人禍加諸平民百姓的頭上。本書書名雖然只是《毛澤東的大饑荒》，但是要為災難負責的絕對不止元凶毛澤東一人。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地方上的封疆大吏（省委書記）乃至小鄉村裡生產隊的頭頭，他們作為極權體制內部大大小小的螺絲釘，把中國變成了一台巨大的絞肉機，親手把無數鮮活的生命送入其中。幫凶的罪惡比起首腦有過之而無不及。

馮客最為自豪的是，本書近 95% 徵引的史料都是中共的原始檔案，¹ 而且都是經過他精心驗證，真實性很高。馮客很有辦法，能進入省和縣一級的檔案館調閱這些史料，至於中央層級的檔案，在可見的將來一般史家仍然無緣得見。不過，從本書看來，運用地方檔案文件已經足以讓本書的論證增添不少說服力。上文提到，馮客試圖把高層政治和民間社會結合起來，當中那個關鍵的連結，就是省、大區、鄉縣的一把手幹部，他們直接把中南海的意志貫徹執行，同時也把地方上執行的結果匯報給中央，作政策調整的參考。馮客指出，直接參考這些地方大員交上去的報告和數字是沒有意義的，因為當中出於政治考量，一籬筐都是冠冕堂皇的話語和滲滿水份的政績，真實的情況卻乏善可陳。他轉而探詢政治利害關係較弱的官僚部門，如省的水利廳、林業廳、衛生廳和工業局的檔案，比較能夠真實的反映大躍進期間不同生產領域的狀況。² 至於各種統計數字，多採用 1962-1965 年中央和各地統計部門發佈的材料，因為災難結束後這些部門要重建自己的可信性，不得不對饑荒年頭的事情作客觀的回顧（頁 137）。馮客的做法是

1 〈專訪馮客 (2011.10.17)〉，《陽光時務週刊》網站，<http://www.isunaffairs.com/?p=555>（檢索日期：2013 年 6 月 27 日）。

2 馮客曾於 2012 年 5 月 3 日在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作專題講座，曾論及檔案的使用方法。感謝師大史研所學長提供的資訊。

「讓檔案自己說話，讓讀者自行評判」，透過這些官方文件，大躍進期間的眾生相可謂躍然紙上，其中活生生的慘象也讓人不忍卒讀。

從本書中我們可以讀到，地方幹部面對大規模死人的結果實在是難逃罪咎。像甘肅張仲良、雲南謝富治等人，在地方上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瞎搞水利工程，引水道、建水庫，強逼農民進行超負荷體力勞動，結果導致大批人勞累致死，然而這些水利工程最後卻未能發揮灌溉的作用，人們都白死了（頁 57、59）。要鞭策人們如奴隸般幹活，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問題提到政治高度上，敢提出異議的人都被劃成右派，扣上「反對大躍進」、「反對總路線」的帽子進行批鬥，地方幹部們靈活地運用這招數，使得少數人吃盡苦頭，多數人默不作聲。在整個大躍進期間，幹部主導了多起暴力凌辱事件，總死亡人口中至少百分之六到八是被基層幹部及民兵直接殺死的（頁 267）。極權體制上行下效，黨幹揮動大棒鎮壓最終倒霉了老百姓，這個暴力模式被視為文革的預演，最後進化成「挑動群眾鬥群眾」，正式瓦解了最基本的社會倫理秩序。當然，幹部們也不是鐵板一塊、甘願乖乖作黨的螺絲釘，掌握權力的他們也面臨吃飯艱難的問題，由於獲得額外的計劃和市場資訊，因此可以進行投機倒把活動，大發橫財，工廠裡的工人、城市裡的小市民，紛紛依樣畫葫蘆做生意，沉醉於「資本主義的生活方式」（頁 193）。這是極權體制長久以來的弔詭：這邊廂國家竭力對個人和社會進行無微不至的滲透和控制，那邊廂人們的求生本能引發的各種反應卻形成對極權有意或無意的挑戰，迫使後者採取更高壓的手段遏止之，國家與社會雙方皆陷入這個死循環，最後只等待駱駝背上最後一根稻草的降臨。

中共在 1950 年代初期照搬蘇聯模式發展計劃經濟，計劃經濟的特點就是物資的生產數量和價格並不按市場供需決定，一切取決於國家權力者的政策偏好。換言之政治凌駕於經濟，計劃經濟的運轉，必須有高度集中的政治權力作為後盾。如果要深究大躍進失敗的慘烈，不得不處理計劃經濟體制與這場盲目生產運動之間的關係，這也是本書必須面對的另一個大問題。

馮客在本書中毫不掩飾自己對計劃經濟嗤之以鼻的態度，並指出它是整場災禍的根源之一。在農業領域，計劃經濟使得農民沒有權力決定栽種的作物，也不可以自由處置自己的收穫。幹部對農業一竅不通，卻瞎指揮生產，栽種不合適的作物，導致田地幾乎顆粒無收。在浮誇風虛報產量的情勢下，在農村過度徵收糧食，使得農民們命喪黃泉，周恩來、鄧小平、李先念和王任重等人難辭其咎（頁 140-141），譚震林更把糧食收集視為國家與農民之間的爭奪戰。

在工業方面，計劃經濟本來就擁有缺乏效率的隱憂，由於大躍進鼓動超額超規模生產，只注重擴大產量、縮短生產時間，不注重成本和品質，結果造成工業原料和設備的極大浪費，造出一大堆與廢物無異的劣等工業品。工廠把資源都投入到胡搞的生產當中，工人們的工作和生活環境卻日復一日惡化，使得他們更無心無力於工作之上，最後使得工業產值滑坡式直線下跌（見第三篇第 18 章〈毀了工業〉）。

馮客告訴我們，計劃經濟體制是毛時代中國的病灶，由於這套經濟制度先天不足，平日無事尚可勉強支撐，一旦遇上政治環境的急遽轉變，在好大喜功、違反客觀條件下讓權力任意妄為，

最後必然會出現毀滅性的後果。另一方面，馮客讚頌自由主義市場的神奇功用，大饑荒當中的倖存者不少從黑市中獲得了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城裡的幹部們也在大搞買賣，大家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等到真的沒有活路時，人們紛紛逃往香港——東方的自由柏林。

馮客專闢〈弱勢群體〉一篇介紹大躍進期間婦女、兒童與老人們的遭遇，又是本書另一個讓人欣喜之處；篇幅雖短，卻向我們演示了從其他角度切入中國現代史的可能性。近現代中國政治暴力與軍事殺戮不斷，不同的弱勢群體如何在這個弱肉強食的嚴峻歷史環境下求存，一直以來史家對這個問題著墨有限。以大躍進為例，整個社會體制已經趨向軍事化，糧食嚴重不足，老弱又缺乏生產力，肯定成為人們首先拋棄的對象，殺害孩童和老人以奪取其配給口糧的事情，時有發生（頁 230）。因為「不勞動者不得食」，稚幼耆老也不得不硬撐上陣勞動，最後疲勞致死者大有人在。共產主義專門為他們設置了集體的幼兒園和老人院，但是這些地方的生活環境非常不堪，管理工作一片混亂，最後使得不少孩童老人因疏忽照顧而患病甚至身亡。婦女因為體質問題（懷孕、月經等），在超負荷的生產中更是吃盡苦頭，不少女性被幹部性侵犯，也有人為求獲取食物被迫出賣肉體。大躍進本來的目的是要創造出一個人間的共產主義天堂，結果卻把中國變成煉獄，地獄裡沒有仁義道德可言，只有赤裸裸的叢林法則，弱者要活下來注定是一件艱難的事情。馮客在字裡行間並沒有嚴厲的道德批判，卻向我們拋出了一個歷史的大哉問：集體化逼使人們做出艱難的道德抉擇，是讓自己活下去，還是讓別人活下去？近現代中國人面對一次又一次的天災人禍，是什麼因素影響著他們最後的選擇？

最後我們不能免俗，也要檢討一下大躍進期間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數目。馮客指出，這個問題永遠難找到正確答案，因為當時很少有可靠的數據被保留下來（頁 290）。馮客自己推斷的死亡人數至少是 4500 萬，他以上海人口學家曹樹基的數字（3200 萬，曹主要根據官方編纂的地方志中的數據來推算）為基礎，與自己找到的檔案交叉比對，發現死亡率至少被低估百分之 30 到 50，得出 $3200 \text{ 萬} \times (1+30\% \sim 50\%) = 4160 \text{ 萬到 } 4800 \text{ 萬}$ ，取中間約 4500 萬的最後結果。平心而論，馮客只是一名歷史學家而非人口學家，他的估算肯定存在可供商榷之處。楊繼繩在《墓碑》一書中也有自己的算法，關鍵在於他一語道出了數字背後的意義：「我珍惜生命，每一個數字後面就是一批從生到死的生命。」北野武在談及 2011 年日本 311 地震災害死亡人數時，也曾言：「悲慟是一種非常私人的經驗。這次震災並不能籠統地概括為『死了兩萬人』一件事，而是『死了一個人』的事情發生了兩萬件。兩萬例死亡，每一個死者都有人為之撕心裂肺，並且將這悲慟背負至今。」百餘年的中國近現代史，因為內外各種暴力而流血死去的芸芸眾生不知凡幾，大躍進是近代中國暴力革命的另一個顛峰，這場試圖把一個人類史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送進共產主義天堂的實驗，以數千萬部悲劇收場結局。中國人不斷摸索著追趕西方、早日實現現代化的道路，大躍進把這個理想發展到極致，誠如馮客所言，它是中國現代史的核心。

第 38 期《史繹》發表會會議紀要

張容兒*

日期：2013 年 12 月 19 日

地點：臺灣大學普通教學館 306 教室

一、前言

《史繹》創刊於 1964 年，為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大學部的學術刊物，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許多現今於學術圈久負盛名的學者，在其大學時代也都曾於《史繹》上發表論文。可以說，《史繹》承載著臺大歷史系成長的記憶軌跡，見證著一代代大學生對歷史學燃燒不滅的熱情，亦蘊育著每一個時代不凡的精神、社會的變遷與年輕人獨特的關懷。而今，《史繹》已走過 50 年的歲月，期間雖曾停刊，但因著許多人不斷的努力，近幾年來，《史繹》順利復刊，且得到多方的支持與關注。

2013 年 12 月 19 日，籌備了一年半的第 38 期《史繹》終於破繭而出，與 2013 年秋季的「史學導論」課程「史料與史學」系列工作坊合作，於晚間六點半至九點半在臺大普通 306 教室，舉辦第 38 期《史繹》發表會。發表會出席狀況踴躍，內容充實精彩，討論也十分熱烈，老師、發表人、編委會成員、修習史導的大一

**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101 級生，第 38 期《史繹》責任編輯。

學生、其他系上同學齊聚一堂，實為不可多得的一次盛會。本篇即為第 38 期《史繹》發表會的實況紀錄，供參與者回味品讀，亦期與不及參與的同好們交流分享。



圖一：甘懷真主任致辭（攝影：張容兒）。

二、致詞

（一）系主任甘懷真老師

第 38 期《史繹》發表會，以現任臺大歷史系系主任甘懷真教授的致詞正式開場。甘主任首先談到了《史繹》的發展歷程。《史繹》第一期於 1964 年出版，對於學術論文寫作風氣的培養大有助益。但從 1977 年開始，有近 30 年，臺大歷史系沒有人寫學士論文。不過可喜的是，近年又開始有此風氣出現，主任亦借此機會，鼓勵大家寫作學士論文。

「做，比不做好；雖有缺失，但也不要因此停滯。」這是主任對台下同學的勉勵。他同時相當樂見《史繹》的發展與壯大，更進一步建議，《史繹》可往電子出版發展。最後，甘主任也提醒大家要多多練習寫作，到大三下的時候，即可嘗試申請寫學士論文。

（二）第 44 屆歷史學系系學會丁驥紘會長

臺大歷史系三年級生丁驥紘同學為第 44 屆 101 學年度臺大歷史系系學會會長，任期為 101 學年度。儘管他現在已經卸任，但第 38 期《史繹》的出版，是他任內推動的重要項目，丁會長致詞時感觸良多。他期許《史繹》能將臺大歷史系的優良傳統延續下去。

（三）第 38 期《史繹》主編林宣瑋

臺大歷史系三年級生林宣瑋同學為第 38 期《史繹》的主編，負責這次《史繹》編輯與出版事務，也對它累積了相當深厚的感情。他提到，《史繹》從彙整老師們認為不錯的學期報告開始，到逐漸建立審稿等完整的流程，經過相當長的時間。這一本刊物，集結了臺大歷史系諸位師長、學長姐的心血。這一期的《史繹》，希望能承先啟後，將這份心意，發揚光大。

緊接著，林主編開始為與會者介紹《史繹》的歷史沿革與工作內容。他報告這一年來《史繹》走過的歷程：從稿約、撰稿格式、一期網站等建制開始，到申請 ISSN、DOI、與國家圖書館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華藝線上圖書館（Airiti Library）及凌網科

技 Hyread 資料庫的合作，推動《史繹》的電子化、國際化，再到繁瑣的徵稿、送審、排版、發表會等流程，加上過刊回溯以及零碎的行政庶務，才終於有第 38 期《史繹》的誕生。而在推廣宣傳等方面，林主編也努力尋求與專業課程的合作，並期許《史繹》能夠推動大學部基礎學術研究。同時，這些基礎學術研究、專業課程的成果也能成為《史繹》的稿源。

對於《史繹》未來的發展，林主編期待《史繹》能夠和其他學科有更多的合作交流，並能將徵稿對象進一步擴大到校外，甚至是廣大的華文世界。另外，他也希望能儘快完成過刊回溯，並以《史繹》為基礎，推動大學生學術社群的建立。

三、論文發表

(一) 廖容慈同學

第 38 期《史繹》發表會的第一篇發表論文，為臺大外文系雙修歷史四年級生廖容慈的〈從 *A woman in Berlin* 觀察柏林戰役中蘇聯紅軍性暴力〉一文。本場發表共分為三個部份，第一部份為臺大歷史系林維紅老師介紹「數位資源與史學研究」課程的作業設計說明。第二部份則為廖同學的發表，但因她現在於法國擔任交換學生，不克出席本次發表會，因此由林宣瑋主編代為宣讀。第三部份則為飛資得數位公司張克群經理發表，他主要介紹幾個重要的數位資料庫，並分享數位資料庫與史學研究的結合與可能。

1. 林維紅老師：作業設計

林維紅老師為臺大歷史系的老師，多年來致力於推動學生研究與活動、開設許多充滿創意的課程，對於系學會學術部的運作、活動、《史繹》的籌備亦提供了相當多指導與幫助。而本次第 38 期《史繹》發表會，更與老師開授的史學導論課程系列活動共同舉辦。另外，本期《史繹》的第一篇發表論文，亦是老師為大學部學生所開授的「數位資源與史學研究」課程的作業。因此，我們特邀老師於會上分享「數位資源與史學研究」作業設計說明。

林老師表示，該門課事實上是從「史學導論」的實作練習發展而來；「史學導論」除了是一門談知識性質的入門課程，也請學生從做中學。而在這個數位的時代，歷史學更需要運用新科技進行研究，因此在課程中設計了許多訓練與實作的內容。從 2008 年「史學導論」課程開始，老師便和一批訓練有素的助教一起，以圖書館利用、數位資源應用、寫作等訓練，豐富課程內容。但在該堂課結束以後，許多助教紛紛畢業，因此「數位資源與史學研究」這門課主要是與圖書館館員合作。

廖容慈同學這篇作業是該堂課的期末報告。期末報告的設計，是希望讓學生能綜合整個學期學習的內容，從如何做筆記開始，到心智圖、工具書的利用，完整掌握學術格式，並能利用史料、二手研究資料庫資源等等。這門課學生來自不同背景，老師鼓勵學生根據自己其他課程所學、感興趣的議題，選擇一篇史料為中心，進行發想研究；但都須與老師事先討論。

林老師表示，廖同學在一門談猶太文化的課中發現了二戰中的女性遭強暴的議題，並找到其他史料和相關研究，討論面涉及性別、暴力，完成得相當出色。老師強調，在進行報告時不要什麼都談，應該將主題聚焦，要有問題意識。可以把基本概念用心

智圖寫下來，並嘗試用關鍵字說明分析觀點，而工具書也可作為關鍵字詞解釋的初步輔助。尤需注意的是學術格式，可參照《臺大歷史學報》。老師亦鄭重地提醒台下的同學，絕對不要抄襲，也不要因為格式的不完整讓自己陷入抄襲的嫌疑中，學術格式也是一種證明自己言必有據的方式。



圖二：第 38 期《史繹》發表會參與盛況（攝影：林宣璋）。

那麼，在確立了主題之後，應該如何分析問題呢？老師認為有兩個關鍵，一為找相關研究，二為找相關史料。無論是一手史料或二手研究，均能啟發你對該議題的思考，增進知識，豐富你的分析能力。廖同學此篇報告，即檢索了性暴力、柏林被蘇軍圍城的性別事件等諸多資料，老師從這份報告中也收穫許多，可謂教學相長。

老師也向台下修習「史學導論」的大一同學強調，「史學導論」的教學目的，不是要求學生立即寫出學術論文，而是提供基礎能力訓練，期許大家以此裝備自己，摸索未來可能的方向，讓每個人到大四時都有能力寫學士論文。即使不走學術這條路，扎實的研究訓練也不會白費，在不同行業，都有機會派上用場。老師也鼓勵同學，可以將任何反思、想法寫在報告的結語中，它們可能成為未來研究的發想。最後，老師強調 EndNote 等書目管理軟體的重要性；圖書館也根據《史繹》的撰稿格式，設定了輸出格式（output style），館員們亦非常樂意提供大家相關幫助。

老師期許大家在這個數位新時代，把握機會，利用新的訓練、新的科技增強自己的研究能力。

2. 廖容慈同學宣讀（林宜瑋主編代宣讀）

廖同學在宣讀稿中談到，這份報告是大一下的期末作業，因此其中有很多不成熟之處，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她提到，在學期初時，老師告訴他們要自選題目，並尋找資料完成小作業。而期末報告則是將之前搜集的一手史料和二手材料修整好，在個人提出的問題框架下進行討論。因此，期末報告和小報告緊密連結。

她在一開始選題時，其實覺得非常不清楚，也很茫然，但之後在書上讀到二戰期間軍隊性暴力的報導，也在網路上看到相關新聞，感到非常好奇，才有了之後的研究延伸。事實上，這個報告的發想很偶然。不過，這份報告的目的只是培養大家搜集資料的能力，她當時也沒有能力從西洋史脈絡中討論這些史料背後的正義問題，因此她仍然將一些疑問留在報告中。

廖同學談到，她是在歷史學家安東尼比弗（Antony Beevor）的作品中，第一次看到這起事件，隨後才接觸了相關一手史料。而其中的一本日記 *A woman in Berlin*，也成為這篇報告最主要的史料。日記中主要記載了一名女性在二戰結束前，柏林被蘇聯攻破後夾縫求生的故事。她的丈夫出外打仗，她因會俄文、法文而與軍官有了情感、肉體關係。但是，有學者質疑這本日記的真實性及其寫作目的，因為這本書是匿名出版，在此書中亦有蛛絲馬跡顯示作者的教育背景、工作，她的文筆相當好，而這篇日記的開始記錄日又恰巧是希特勒的生日，故自然引起了多方的猜疑。

對廖同學來說，這些爭議給她帶來了困擾，她當然不希望自己的材料是假的。但無論如何，軍隊性侵的狀況是真實存在的，該篇日記不是唯一的證明。她後來也想到，就算它是假的，那也不失為一種觀點。這說明這篇日記是順著某種意識形態寫成的，這也並不妨礙我們藉由這本日記的視角去窺探當時的柏林。

關於這篇報告的準備，廖同學提到，她發現中文世界對戰爭性暴力的研究相對較少；在研究過程中，也聯想到了臺籍慰安婦的歷史。她並注意到，歐洲婦女史對這些女性的相關研究，逐漸脫離了只將她們視為受害者的立場，而轉為肯定這些人在既有環境下的努力。這也提供她在修習臺灣史時，對臺籍慰安婦問題有更多其他思考。「你可以選擇相信，也可以選擇不要，我覺得最困難的地方就在於你如何證實你的資料值得信賴，去解釋史料的語氣、聲音，還有它的意識。」這是廖同學撰寫這篇論文中感到最困難，但也收穫最多、感觸最深之處。

在研究過程中她也發現，歐洲世界與華人世界的女性角色、

地位都存在差異。她認為，觀察國外的相關議題，可幫助我們思考如何面對該主題，尋找適合的角度。這些女性從單一面向的受害者，變成兩軍之間的和平使者，這是一種巧妙的變化。這種觀察，藉由肯定女性的能動性（agency），取代純粹可憐女性、單向譴責暴力的論述。不過，廖同學也特別強調，她不是認為我們不該譴責暴力，而是我們不能只譴責暴力，因為這種看法過於簡單、片面了。她認為，研究路線的轉變可以帶來更多可能，也有機會解決這一問題。

3. 飛資得數位公司張克群經理：資料庫與史學研究的結合與可能

在林維紅老師演講中，她特別強調了數位資料庫的重要性。而要完成一篇學術論文，搜尋資料的過程必不可少。因此，對資料庫的瞭解亦是學術研究訓練的重要環節。在本次發表會中，我們邀請到了飛資得資料庫公司的張克群經理，來為我們分享歷史數位資料庫的使用。

張經理談到，他所處的公司主要從事國外出版社資料代理，事實上許多期刊、資料都需要本土化廠商進行推廣、特殊加工。他們在期刊方面代理的有 Sage、Taylor & Francis、Jstor 等，前二者更是世界前五大期刊出版社。

Jstor 是一個數位回溯人文學期刊的資料庫，它收錄了從 1545 年至今的期刊，豐富多元，且臺大幾乎將其中的資料買齊了。從這個資料庫中，我們可以瞭解國外如何做期刊，分析其中期刊格式的轉換、內容的轉變，並由此梳理出期刊發展的脈絡。他認為，這也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歷史研究主題。

另外，他還特別介紹了 Artstor 資料庫。這是一個圖像資料庫，收錄許多照片、建築、雕塑等內容。他提到，這個資料庫受很多臺大歷史系老師喜歡，因為有了它們之後，不用去特定地點就可以看到裡面的內容。譬如敦煌石窟，這個資料庫中便有 360 度拍攝的畫面，甚至是一些封起來、現在看不到的石窟。並且，這些圖片有很高解析度，還可以放大、看到更多細節，甚至比在現場看的效果更好。張經理也特別提醒，該資料庫每年會有試用時間，一般在學期初，建議學生可以申請試用。然而，縱使有那麼多老師、學生的愛戴，臺大至今仍未購買，這也和學校經費上的考量有關。他亦試圖與廠商協調授權價格，希望能讓價格降至學校可接受的範圍，嘉惠臺大的師生。

除此之外，他也重點推薦了一些歷史相關的資料庫，如 Adam Matthew Digital。該資料庫的特色是它出版第一手資源，如草稿、手稿、信件、日記、照片等，且皆未經篡改，不加上任何評論。它們多半來自各大洲的圖書館、檔案館，由此，我們不必出國便可取用所需資料。臺大已購買了 Adam Matthew Digital 資料中的 China: Trade, Politics and Culture 1793-1980，而張經理認為 China: Culture and Society、China, America and the Pacific 等主題，亦會對我們頗有幫助。比較特別的如 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919~1980 這一主題，則收錄了英國檔案局的外交史料，包含很多大陸政權交接時的紀錄。它可以提供第三方觀點，讓我們瞭解到過去可能不知道的、空白的歷史。

最後，他還介紹了 Gale Digital Collections 資料庫，這是一個報紙資料庫，臺大也購買了許多主題，譬如 19 世紀典藏資料庫等。而一些有關亞洲和西方、女性主義，甚至歐洲貴族收藏的無名氣

作家的小說等主題，他都覺得非常有趣，值得一覽。張經理也特別提醒，大家如果感興趣、想試用都可以提出申請。他笑稱，他們是坐擁寶山而不知如何運用，他也希望能夠提供大家更多運用資料庫的機會，讓寶山有可發揮的空間。

（二）朱祉樂同學發表

本期《史繹》發表會的第二篇論文，為臺大歷史系三年級生、朱祉樂同學——〈朝鮮天下圖與其天下意識〉。這篇文章主要圍繞一種 17 到 18 世紀在朝鮮流傳的地圖——朝鮮天下圖——展開討論。朱同學現場用黑板，向大家描繪中央是中國，旁邊是朝鮮的地圖概念。



圖三：茶敘時朱祉樂同學與黃悠詩同學的交流（攝影：林宣璋）。

他談到，當初看到這張圖時覺得它很奇怪，而研究之後，他認為這張地圖代表 17 到 18 世紀朝鮮人的世界觀。對我們而言，清朝取代明朝成為統治中國的王朝，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但對當時人而言，滿洲人是「夷」；這張地圖的產生，便和清朝入關後，華夷思想的變化有關。

這篇論文是朱同學修習本系衣若蘭老師開授的「中國史三」期末報告，他選擇了自己感興趣的地圖來研究。這份地圖和清朝、東亞人的世界觀有連結，在時代上也相同，所以順利成為了他的期末報告。

對他而言，地圖是很藝術、令他感興趣的研究對象。相較之下，西洋的航海圖有很多藝術、科學成份，而中國地圖則比較簡單、不精密；他後來發現，這其實代表兩種世界觀的想像。西方地圖之所以精密、科學，是因為有版權、要賺錢，這也是大航海時代的特徵。而在中國，地圖沒有大規模發行，它是一種概念性的東西。從地圖中我們可以看到人們所重視、不重視的事物，譬如鄉下地區地圖尤其重視廟宇，這也反映了他們的世界觀。

朱同學一再強調，「世界觀」是他這篇論文的關鍵詞。他同時也認為，讀歷史系，便是建構自己世界觀的過程。我們不需要過分理會小細節，而要學習從史料、書中去想問題的能力，思考它們與現代的連結。他不希望歷史變成少數人的藝術品，歷史應該是建構自己怎麼看世界、與他人溝通的工具。

談及撰寫這篇論文的過程，朱同學提到，地圖研究確實比較冷門，但少人做也有好處，就是沒有權威經典壓制你。對小的題

目，我們會更有想像力、更豐富內心，也更易有成就感。但在研究地圖時，不可能完全相信地圖，因為地圖是有意識建構出來的。圖象是一種重現，它反映某些人心中的想法，但那不一定是真的。

甚至於現代的地圖，也未必「科學」，如中國大陸的世界地圖，也是中國在中央。這讓我們很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但也影響你對世界的思考。而歐洲地圖，則是以 0 度經線為中心。甚至於，地圖的很多地方還會騙人。而臺灣在不同國家地圖中標識的顏色不同，這也與政治意識形態有關。

在研究該課題時，朱同學也遇到不少問題，找資料便是一項。他深切感受到，歷史系的學生不能只會歷史。譬如他不懂韓文、日文，無法研究日韓兩國學者的著作；而中文在這一方面的研究又較少；此外，研究地圖又需要科學、數學的分析方法，其中亦包含政治、藝術等學科知識。這都給他帶來很大挑戰。

在朱同學的發表結束後，臺大歷史系二年級生張容兒提出第一個問題，希望發表人能分享一些在研究過程中發現的、好用的資料來源。朱同學表示地圖資源確實尋找不易，但諸如總圖四樓的輿圖區、二樓的藝術圖書區等，都提供不少幫助，有時透過 Google 搜尋資料，也會有意外的發現。緊接著，本學期交換來臺大歷史系的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三年級生方舟提出了第二個問題，她希望發表人能夠分享研究心得。朱同學表示，就如他之前所說，17 世紀時已經有西方傳教士的精密地圖出現。但朝鮮的地圖仍然是中國在中央、朝鮮在旁邊，更出現許多《山海經》中奇怪的地名。中國的地圖則是中國在中央，許多小的夷國在旁邊，日本則比較多利瑪竇式、或摻雜佛教世界觀的地圖。西方學術儘管傳入東方，

但並沒有真正改變人們的世界觀，反而是透過地圖，增強固有的世界觀。

方同學進一步追問，在看地圖時，常常牽涉到插圖的繪畫、製圖技術、地圖城市學等，她覺得圖像分析相當複雜，亦想請教朱同學運用什麼方法進行地圖詮釋，在研究過程中又是否有碰觸到地圖出版史的內容。朱同學表示，他運用較多的還是二手資料詮釋，較少用原始資料。而在地圖出版上，這些地圖事實上也有出版、並在民間傳播，而天下圖也是一本地圖集中的一張。

（三）茶敘時間

經過一個半小時不間斷的發表議程，主辦方也提供了精緻的茶點、飲料供老師、同學享用。中場休息階段大家相談甚歡，氣氛十分熱烈。

（四）陳禹仲同學發表

第 38 期《史繹》發表會的第三篇論文，為臺大歷史系 97 級畢業生，現在英國倫敦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的陳禹仲同學所寫的〈金融革命與商業社會的興起：18 世紀初期英格蘭的社會轉型與公共輿論〉一文。儘管陳禹仲同學人不在臺灣，但透過 Skype 和發表會現場連線，分享他的研究心得。這種高科技的發表形式，也引來在場同學們的驚歎。

陳同學首先表達了對《史繹》主編林宣璋、支持《史繹》的系辦以及「史學導論」課程的感謝。他表示，這篇文章的主體其

實是改寫自其學士論文的一個章節，主要要講的，是從兩個例子來說明商業對 18 世紀初英格蘭人心態的影響。第一個例子，是一場 1691 年對英格蘭是否需要設立一個國家銀行，以期改變整個政體的經濟體質的辯論；第二個例子，則是當時出版業與服飾業的興起。另外當時的出版品中，有非常多關於人們在新興的商業社會裡應該如何自處的討論，這也是 18 世紀初非常重大的辯論。90 年代有不少史學家以 18 世紀辯論來稱呼這個現象，可見其重要性。

陳同學談到，對於文章中還有那些可以進一步發展的地方，他認為，任何形式創作的任何一個作者，都明白自己的作品不可能完美，但同時，他們也都會盡可能地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無限趨近於完美；不過這種期望往往會讓作者在閱讀自己的作品時產生盲點：對作者而言不成問題的問題，可能是讀者最大的問題，也因此同樣的作品，在作者書寫的時刻、在作者成為讀者的時刻、在不同的讀者閱讀的時刻，往往會呈現不同的面貌，故而各個作者與讀者的認知必然會有落差。因此他覺得，透過讀者提問的方式，可以讓這篇文章破綻百出，也可以讓它有更多可能的發展空間。不過在此之前，他也會先談談這篇文章創作的過程。

陳同學表示，該篇文章是其學士論文的一部分。而他的學士論文的範疇，廣義而言是啟蒙運動早期（Early Enlightenment）思想史。主要討論英國當時的思想家們，對於人類與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這兩者關係的看法，如何因為商業在英格蘭社會逐漸興盛而有所轉變。他認為政治與社會，在當時並不是可以完全區分的兩個概念，對其論文關注的對象而言，社會代表的是有一定政治組織的人類群體；換言之，只有政治存在才有社會。因此，他們才會有政治社會一詞來泛指當時的各種人類社群，包含我們今日

所認定的國家，村落，甚至社會。

陳同學認為，這篇文章的原型，在整篇學士論文裡，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背景角色。在解答學士論文的核心問題前，他需要先問一個問題：為什麼當時會有這樣的轉變？這篇文章的內容給了一個很直接的答案，商業的逐漸興盛改變了當時人們對人際網絡和政治社會的看法。這亦衍生另一個問題：商業的影響力究竟有多大？這篇文章朝著這個問題追索，因而有了和論文本體不太一樣的生命。

分享完他撰寫該篇文章的原因、過程，陳同學也想提供台下同學更多在學士論文撰寫方面的幫助。值得一提的是，臺大歷史系自 100 學年度開始推動學士論文，陳禹仲同學即是首批撰寫的兩位同學之一。

陳同學談到，他自大二起，對荷蘭史開始感興趣。當時剛好修陳慧宏老師的「世界史三」，相當有熱忱地（陳同學稱之為「年少輕狂」）向老師提問，是否有寫學士論文的可能。在老師和系辦助教的幫助下，他在懵懂之中從大三開始跟老師上專題討論的課，然後慢慢開始寫學士論文。

他提到，寫論文前，應該要有一個大方向的主題，例如他當時想寫 17 世紀的荷蘭經濟、文化與人們的生活，三者之間的關係，而這個主題在之後會慢慢縮小，變成一個可以操作的題目。但縮小之前的第一份工作，是對這個主題的研究要有一定程度的熟稔。因此，從一無所知到開始寫學士論文的過渡期，他盡可能最大量地閱讀和自己研究主題相關的書。對主題有一定認知之後，提出

一個更實際，更適合操作的研究題目。除了讀二手研究以外，也要清楚掌握相關的一手資料。陳同學也提供了閱讀現代歷史研究著作的訣竅：注意註腳、索引（index）、參考書目。透過它們，可以知道研究這個主題的學者們都看那些研究，也可以知道我們可能的材料在那裡。索引則可以看出對作者（甚至出版者）而言，他們認為這本書對讀者最有價值的資訊是什麼。總而言之，學士論文很重要的兩個環節，一個是掌握二手研究的脈絡，另一個則是對史料的熟稔。

除此以外，其實學士論文就是不斷地讀書，然後書寫。最後，陳同學特別強調語言的重要性，除了英文，更要學習第二外語，甚至第三、第四外語。舉例而言，他原本想寫荷蘭史，但是 17 世紀荷蘭的史料大概是用拉丁文、古荷蘭文、法文、西班牙文以及極少的英文組成。不會這些語言，就沒辦法看史料，也沒辦法作出好的研究。這也是他為什麼當初想寫荷蘭史，最後卻寫出一個英格蘭政治社會觀的思想史的原因。當時的他只會英文和一點法文。因此，語言學得越多，可以研究的範圍就越廣。無論在何種場域中，會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外語，都會有極大益處。

陳禹仲同學發表完畢後，方舟同學率先舉手發言。她認同陳同學所說的，尤其是語言對於研究的重要性。她談到，自己正在撰寫與 17、18 世紀苦難記憶有關的學年論文，在臺灣的這段時間，也利用這裡的資源收集很多資料。她提到：「在不斷限縮的過程中，仍需要大量的閱讀；但要看的書根本讀不完，要如何處理並面對書看不完的心理壓力？」

陳同學笑答：「書絕對讀不完！」但他強調，想、讀與寫是

不同的，要顧及到現實層面的問題。因此他建議在寫論文時設立停損點，掌握最重要的研究，即所謂的畫地自限。把自己限縮在一個小角落，雖限制了其他可能，但這樣研究計劃（project）才能操作。因此，必須要知道自己的極限在哪，學會去掉不必要的資料，不要讀一堆很有趣、刺激的書，卻不一定對研究有幫助。



圖四：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方舟同學提問（攝影：林宣璋）。

（五）吳倩宇同學發表

本期《史繹》發表會的第四篇文章，為臺大歷史系三年級生吳倩宇同學的〈坐產招夫：論南宋接腳夫與重財婚之關係〉。吳同學首先和大家分享為何會寫這篇文章的原因及其內容。這篇文章，也是 101 學年度衣若蘭老師講授的「中國史三」的期末報告。當時老師請大家交期末報告大綱，於是她開始回溯有興趣的題目。她回憶起衣若蘭老師在課上提到「接腳夫」這一詞，覺得很有趣，

因此去查相關內容，瞭解到它指的是一個「寡婦在婆家招外來男人共同生活」所產生的詞彙。這與她以往認知中宋代「程朱理學」禁錮婦女的印象相當不同。

由於對這個題目感興趣，她開始撰寫研究論文的大綱，其中包括前言、研究回溯（討論法律與士人對守節的看法）、接腳夫與財產權和重財婚的關係，以及結語。在找資料的過程中，她發現了《名公書判清明集》中有許多有用的史料。另外，她也注意到名為《宋代官箴研讀會》的讀書會。該讀書會不僅定期討論《名公書判清明集》，也出版一本《宋代社會與法律——《名公書判清明集》討論》。非常湊巧的是，裡面有宋代婚姻、婦女生活的相關內容，這也成為她撰寫論文的切入點。倩宇也特別提醒，在找二手研究時，看註腳、參考書目很有用，那些大家都會引用的著述，往往最重要。

在研究回顧的部份，吳同學主要引用了游惠遠、伊佩霞、滋賀秀三等三位學者的著作。但這三位學者對於重財婚、財產權只有少量提及，因此她又進入《基本古籍資料庫》找史料。巧合的是，她當時也在修林維紅老師開設的「近代中國性別與社會」一課，因此對性別史有粗略的認識，亦幫助她撰寫這篇論文。

這份研究轉變了她原有的概念。宋代士人說：「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她以前覺得守節在宋代是牢不可破的，但後來看了一些對婦女再嫁的討論，才發現沒那麼嚴重。那只是他們的理想，在法律上並沒有規定，在士人間也沒有一定的共識。他們僅反對任意再嫁，但如果因無法維持生計，「再嫁」是被認可的。宋代沒有完整照顧寡婦的制度、政策，社會上也沒有這種組織，

再嫁其實不是被嚴格禁止的。當然，守節的寡婦會被稱讚，但與再嫁也沒有太大關係。

在連結到接腳夫與重財婚、財產權的部份，她認同張彬村先生的文章〈明清時期寡婦守節的風氣 — 理性選擇 (Rational Choice) 的問題〉的論點。該篇主要在講明清寡婦的守節是理性選擇，不是社會的壓力和要求，亦即她們是在真的思考、判斷之後，認為對其有利，才選擇守節的。吳同學認為，理性選擇的概念，也可以運用在宋代接腳夫的討論。寡婦招接腳夫其實是自立的過程，是為了滿足自己、婆家種種的現實需求，是經過理性思考過的。在當時的財產權觀念中，丈夫死後，婦女可以對夫家財產權進行掌握、運用。法律也沒有禁止接腳夫，因此這是在勞動力喪失、生計困難時的折衷方式。甚至於招接腳夫，往往是婆婆要求的，在法律上也是被允許的。

吳同學認為，當時社會商業比較繁榮，可能造成婚姻商品化的狀況。寡婦選擇某個男人為接腳夫，可能是因為他體力好、能幹。對接腳夫而言，他可能在婚姻市場中條件較差，但如果擔任接腳夫，他不需支付聘金，便可進入一個家庭運用財產、享受成果、繁衍子嗣。接腳夫的現象，其實是重財婚表現的形式之一，都是理性選擇的結果。而宋代士人反對招接腳夫，除了道德上的理由外，還有可能引起的財產糾紛，如接腳夫揮霍財產、小孩爭產、立嗣、後夫和前妻小孩的奉養問題。這些內容在《名公書判清明集》中都有很多討論，很像法庭上的辯論紀錄，相當精彩。

最後，吳同學也和大家分享了自己撰寫論文的經驗。她提醒，要特別注意不要誤解、誤用史料。在使用前，要準備掌握史料背

景、注意記錄者的主觀性，並時刻記得現實社會和被記錄、建構的社會不同，你只看得到記錄者選擇要記的。而在解讀、撰寫時，我們可能會受到成見的牽引、援今判古，這便需要旁人提醒，如審稿人、老師的意見等。

在研究過程中，她也發現了一些盲點。她本來想要證明守節這件事情沒有那麼普遍，但一份審稿意見書中便提到，與其證明普不普遍，不如瞭解當時贊成與反對的聲音，到底那些人怎麼看，這應該更重要。她也認同前面陳禹仲同學、方舟同學的說法，越寫越感受到自己的無知，仿佛看到很大的網，書越唸越多卻越困難，也才發現自己因不懂日文、法律史、經濟史等而受到的限制。因此，她也建議大家多多去外系修課。而在撰寫過程中，也要時時回到標題去看，不要越寫越多、離題越遠。因此，一個好的標題、架構也非常重要。

在結束發表前，吳同學也分享了自己投稿《史繹》的小故事。因為和主編熟識，她擔心《史繹》缺稿，所以投了老師稱讚的這篇論文。但後來才發現沒那麼缺稿，投了卻又不能抽回來，只好從大年初一開始，找到咖啡店改稿。拜林主編所賜，她的春節就在不斷趕報告中度過了。

（六）林明波同學發表（龐志豪同學代宣讀）

《史繹》發表會的最後一場為書介發表。該篇文章的作者為臺大政治學系公共行政組 96 級畢業生，雙主修歷史系的林明波同學，他所要介紹的書籍為馮客（Frank Dikötter）的《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 年的中國浩劫史》。但林明波同學返回澳門，因時

間問題而不克出席本次發表會，因此請同為澳門人的臺大歷史研究所碩一學生龐志豪同學代為發表。

龐同學談到，自己和明波以前都唸所謂的「紅底學校」，即有共產黨背景的中學。在課本中，對這段歷史的論述就是三年困難時期，甚至沒有提到大饑荒，三言兩語就輕描淡寫帶過去。但事實恐並非如此，他引用香港電視劇的一句流行語來評價這場運動：「既不科學、又不民主，不講人權，只講法治，軍法統治的一個悲劇。」甚至他覺得，21世紀中國的發展，也有大躍進的殘留，現在中國政府在拆遷房屋時也像大躍進時那樣立指標、做業績。因此，認識那場大災難，也有助於我們認識現在的中國社會。

馮克此書在2011年獲得英國廣播公司的塞繆爾·約翰遜獎（Samuel Johnson Prize）。全書共分為六篇，第一篇〈追逐烏托邦〉提到毛澤東當年為了和史達林的爭執，推動大躍進。第二篇〈穿越死亡谷〉，談到開始發生饑荒後，彭德懷提出反對意見，毛澤東即發動了反右傾鬥爭將他趕下臺。一直到1961年大躍進的惡果已不可控制，劉少奇才用「策略性撤退」的方式結束，但他們深知大躍進其實失敗了。第三篇〈毀滅〉，討論大躍進在農業、工業、自然等各方面，對當時中國破壞的程度。第四篇〈求生百態〉，記錄官員幹部、黎民百姓在無視個人需求的年代如何用卑劣手段生存。第五篇〈弱勢群體〉，則論述小孩老人婦女的困難處境。第六篇〈死因〉，談論大躍進中的死亡人口。

龐同學提到，這本書有兩大特點。一為連結上層的政治鬥爭與下層階級的困境，在過去的研究中，往往將這兩者分開討論。二則是書中95%的內容引用自中共自己的檔案。馮客試圖讓檔案

自己說話，展現中共不停強逼人民勞動，運用政治武器打擊異己的歷史。

而大躍進運動的設計，參考了蘇聯的計劃經濟。中共號稱工農政權，但其實很多幹部根本不清楚當時中國農業的發展。在那樣的局勢下，不勞動者便沒飯吃，小孩和老人便成為了絕對的弱勢；女性甚至為了食物出賣自己的身體，被幹部侵犯等等。大躍進所期許的天堂，卻換來了毀滅的地獄，在此書中，馮客也反問了當時中國人在道德與生存間的掙扎。

關於那場運動究竟死了多少人，馮客認為是 4500 萬人。在此篇書介中，林明波同學引用了日本導演北野武評價 311 地震的話：「這次震災不能籠統概括為死了兩萬人這一件事，而是死了一個人這件事，發生了兩萬件。」我們除了要反思這條不科學不民主的發展路線，也要思考這些死去的人民對中國現代化道路的意義。他們只是一個死亡數字而已嗎？就馮客的觀點而言，他認為大躍進是導致文化大革命的主因。

在龐志豪同學的代宣讀結束後，臺大歷史系二年級生王郁婷同學提出一個問題：該書將毛澤東發起大躍進的原因完全歸給與史達林的會面，這種論述會否太過簡單？代宣讀的龐同學認為，如果以歷史追求多元思考的概念下，馮客這種論述確實有偏頗之處，但他覺得此書的重點並不在此，因此就整體而言是沒有錯的。

四、結語

在結束了第五場發表會的問答之後，第 38 期《史繹》發表會

也在熱烈的掌聲中，圓滿落幕。我們期待，《史繹》能夠代代傳承下去，受到更多人的關注、支持，成為專業的華人世界大學生歷史學術論文發表平臺，也能有更多人投入到《史繹》的編寫之中。

現在，第 39 期《史繹》也已開始徵稿。投稿《史繹》，對於大學生而言是一個相當好的練習機會。《史繹》收錄優秀的學生論文、作業觀摩與書介，且採行雙匿名審查制，所有的文章皆會受到該領域最優秀學者的審核。自第 39 期《史繹》發表會開始，往後每期的《史繹》皆會在出版前舉行發表會。發表會讓作者報告自己寫作過程、學術成長，除了作者統整自己的心得、經驗，也希望將這寶貴的經驗分享給聽眾。投稿《史繹》，是將來有志於從事學術研究的大學生，一次極好的機會。

對於《史繹》的未來規劃，第 39 期《史繹》編委會仍會致力於將《史繹》打造成「華文世界大學生的學術刊物」。我們的徵稿對象，不限臺大歷史系大學生，而擴及到華文世界。全年徵稿、隨到隨審。《史繹》除了延續自身悠久的歷史傳統，也希望帶動華文世界大學生的史學研究。

第 39 期《史繹》徵求兩種學術文章：（1）學術論文與（2）書介。此外，若有任何與學術相關的文章（如作業觀摩、史料研讀等），也歡迎來稿。第 39 期《史繹》編輯委員會誠摯地向各位同學徵稿，若有任何疑問，亦隨時歡迎與我們聯絡。

研究歷程*

施厚羽**

拙文原為陳熙遠老師講授的「明清檔案與歷史研究」課程期末報告。最初構思報告時，試圖就一個或多個面向，結合清代檔案之運用來訂定題目。而文章牽涉了清代思想史、書籍文化史等不同領域，這些都是筆者所感興趣的範疇。由於平日的興趣，在擬定題目的過程中，我先以「御纂」為關鍵字，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內閣大庫檔案、臺北故宮與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宮中檔奏摺等資料庫與網站瀏覽史料。後來讀到葉德輝（1864-1927）於《書林清話》卷九中的〈內府刊欽定諸書〉一文時，觸發了我的靈感。該文詳列清代內府刻書，其中便有《御纂朱子全書》。乍看書名，便好奇其內容為何，因南宋時已出現《朱子語類》，清代編纂《朱子全書》，特別又屬「御纂」性質，其目的、作用是什麼？

確定了基本方向之後，從此開始，我便聚焦該書，循線追索，查閱關於《朱子全書》的基本知識，在選題方面，我特別關注康熙朝的情形，是因為當時編纂了許多理學類的書籍。而我同時也好奇，當時的讀者如何看待這些書籍？這些書對他們又產生了什麼影響？首先我著手翻找清代內府刻書檔案中有關《朱子全書》的資料，同時也以該書為關鍵字，在上述資料庫以及基本古籍庫、中國方志庫等處蒐集材料。在閱讀史料的過程中，我認為或許可

* 編按：本文為〈從《御纂朱子全書》看清代前期官方意識形態與士風的形塑〉一文的研究歷程。由於時間因素，未能及時參加《史繹》第38期發表會。但作者仍為《史繹》撰寫研究歷程。特予刊載，並致上謝意。

**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98 級生。

試著從奏摺、上諭、政書、方志、文集等史料取材，結合清代的政治意識形態，及士人如何看待這部書的角度來探討。

整篇文章主要是從政治史（統治政權的意識型態）、思想史（理學在清初的脈絡）、書籍文化史（書籍的流傳、讀者的回應）三大方面構思。從《朱子全書》編纂的大背景來看，其最直接的連結是清代前期的文化政策，而此又與皇帝提倡理學密切相關，再加上編纂者們正是理學碩儒，所以必須說明清初理學發展之狀況。而本文的核心是一部書，那麼書籍文化的問題，即使未能極其深入討論，至少也須向讀者交代其背景。這些問題可謂環環相扣，絲絲相連，為了解決內心的諸多疑惑，於是開展了綜合諸多領域的一個研究主題。未著手寫作之前，仍懷抱著一切皆在掌握之內的心態，然而真正著手之後，才體認到牽涉甚廣；從清代諸帝的統治心態、文化政策，到程朱理學發展軌跡，甚至還需處理書籍的版本、流傳的問題。這些領域皆脈絡深遠，遠非筆者這樣的初學者所能獨力掌握，所以只能盡所能梳理相關問題。

書寫的過程，對筆者而言，是對自我的不斷檢視，藉由探索原先不熟悉的知識領域，從中挖掘出自己眾多不足之處。整個過程，就像從最初開始在迷霧中慢慢往遠處的微光，曲折地往光源走去，當發現光源所在之後，便開始探訪、分析，就這樣一步步地在知識的道路上求索。在這篇文章中，我的焦點是一部書，而非一個人，然而對它多了些瞭解之後，書籍不再只是單純的物體，「御纂」書籍也不單純只是帝國統治的工具，它們與讀者的互動，使其具備了生命。只是在寫作時，與主題有著若即若離的關係，進而開展出來的旁枝，或甚至只是一點詩意的想像，多加思考玩味其中意義或是可能的圖景，也是一種寫作過程的趣味。旁枝碎語了這麼多，希望能稍稍說明拙文構思的過程，以及在過程中觸發的問題和一點心得。

《史繹》稿約

第 38 期編委會 2012 年 9 月 30 日 訂定

第 38 期編委會 2014 年 1 月 12 日 二修

第 38 期編委會 2014 年 5 月 01 日 三修

- 一、 《史繹》創刊於 1964 年，為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大學部的學術刊物。
- 二、 本刊以發表大學部學生具有學術性質的文章為主。除了歷史學之外，也歡迎其他學科與歷史相關的作品投稿。本刊僅接受中文寫作稿件。
- 三、 本刊為年刊，約在每年 6 月份出版。編輯委員會將於出版前舉辦發表會，作者有義務參與。
- 四、 來稿須經《史繹》編輯委員會之審查程序。審查流程應於每年度徵稿時公告。審查程序原則上分為一審與二審。一審為委員會內審，二審為本委員會移送專業領域學者審查，並採行審稿人、作者雙向匿名制；二審審稿完畢，發送審稿意見書予作者；文章修改後，請於一定時間內回覆編委會。修改完成的文章，編委會具是否採用刊登之最終權力。
- 五、 本刊嚴禁一稿兩投，並且僅限「未發表之文章」。若經本委員會發現有一稿兩投、剽竊之情事，編委會有權力撤稿，並且不再接受該投稿人之投稿。
- 六、 若需要引用較長的文字引述，請作者預先得到原著與出版社之同意，本刊並不負責版權問題。而圖片、影音部分，請盡量使用原創作品；若遇版權取得困難，請務必在註腳標示清楚引用來源。
- 七、 來稿經審查通過，作者需授權本刊物擁有其著作財產權（包含紙本、網路公開、重製、收錄於資料庫、下載、列印等）之所有部分；另外作者需同意文章經由本刊紙本、電子品之印行與發送。作者仍保有著作人格權。
- 八、 來稿請用真實姓名，並附上完整資料（學校、年級、系所、聯絡電話、電郵及郵寄地址）。請將電子檔（Word 與 PDF 檔）寄至編委會信箱：shiyintuhistory@gmail.com。
- 九、 《史繹》編輯委員會擁有本稿約最終修訂權與解釋權。

《史繹》撰稿格式

壹、總則

- 一、《史繹》編輯委員會具有本撰稿格式最終修訂權與解釋權。
- 二、《史繹》編輯委員會應於每年度刊物出版之後，召開編委會議，討論撰稿格式是否需要修訂。

貳、基本架構

- 一、請用中文書寫，字體請用 12 號新細明體；英文專有名詞、出版項，請用 Cambria；單行間距；中文獨立引文請用標楷體。
- 二、文稿請按：題目、作者、中英文摘要（100 字左右）、關鍵詞（4 至 5 個）、正文、徵引書目、附錄的次序。
- 三、節次與內容標號請依照一、（一）、1、（1）的順序排列。
- 四、中文請一律使用新式全形標點符號，書名請用《》，篇名、文章名請用〈〉，未滿三行的引文請用「」。西文一律使用半形標點符號。

參、資料標注

- 一、請用腳註，註釋號碼為阿拉伯數字。註號放在標點後面。
- 二、正文每段第一行空兩格。獨立引文則每行縮排三格全形字元，不必加引號。
- 三、第一次提及的帝王或年號請附加公元紀年。例如：東漢明帝永平五年（62），宋康定（1040-1041）年間。干支及其他中外非公曆紀年，亦請括注公曆。
- 四、第一次提及的人名，請在後面用括號（）附上生卒年。例如王夫之（1619-1692）；而英文、外文人名請用中文譯名書寫，並且用括號（）附上原文名與生卒年。例如：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 1917-2012）。
- 五、數字寫法：一位數字以中文文字表示；二位數字以上，請一律使用阿拉伯數字；表示時間、日期亦請用阿拉伯數字。例如：第一次招生，38 人，1962 年 10 月 3 日。

肆、徵引

一、 引用專書、論文等資料，腳註請參照下面格式：

(一) 專書、文章

1. 中、日文專書：作者，《書名》（出版地：出版者，公元年），頁碼。例如：楊寬，《戰國史》（臺北：商務印書館，1997 初版），頁 451。引用中文譯著時，請附上作者原名、譯者名、原著出處與出版年。例如：曼素恩著，楊雅婷譯，《蘭閨寶錄：晚明至盛清時的中國婦女》（臺北：左岸文化，2005），頁 56，譯自：Susan Mann, *Precious Records: Women in China's Long Eighteenth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2. 中、日文文章：作者，〈篇名〉，《刊物名稱》×卷×期（公元年份，出版地），頁碼。例如：邢義田，〈漢代簡牘公文書的正本、副本、草稿和簽署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2 本 4 分（2011，臺北），頁 45。
3. 碩博士論文：作者，《論文名稱》（學校名與論文性質，年份），頁碼。例如：楊可倫，《社會主義的城市課：大躍進時期上海市編委教材與教學活動》（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3），頁 25。
4. 外文著作請參照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16 版。

(二) 古籍

1. 引用原版或影印版古籍，請註明版本與卷頁。影印版古籍請註明現代出版項。例如：〔漢〕劉向，《列女傳》（道光 17 年振綺堂原雕，同治 13 年補刊，梁端校讀本），卷 2，頁 12。〔清〕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臺北：樂天，1972 年影廣雅書局本），卷 12，頁 1。
2. 古籍書名與篇名連用時，可省略篇名符號。例如：《史記·游俠列傳》。

(三) 報紙

1. 紙本報紙：報導者，〈文章名〉，《報紙名稱》（出版地），年月日，

史繹 第 38 期

版次。例如：藍蘋，〈娜拉為何出走？〉，《新民報》（南京），1935年2月23日，版4。

（四）圖片、影音資料

1. 圖片、表格請註明資料來源，並加上編號。引用時請註明號碼，請勿使用「如前圖」、「見右表」等表示方法。
2. 圖片：
 - （1）平面作品：〔朝代名〕作者，《作品名》，創作年，收藏地：典藏機構。
例如：〔明〕吳彬，《羅漢圖》，1601，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2）立體作品：作者，《作品名》，出土年，收藏地：典藏機構。例如：作者不詳，《黑釉木葉紋盞》，1962，南昌：江西省博物館藏。
 - （3）圖片部分若有不足，請以《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學術格式為準。
3. 影片：
 - （1）中、日文影片：導演，《影像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日期）。例如：易智言，《藍色大門》（臺北：行政院新聞局，1998）。
 - （2）外語影片：The title of cinema (in italic). director. Studio or distributor. Year of release. Medium of publication. 例如：Sex and the City. Michael Patrick King. New line cinema. 2008. Film.

（五）字辭典與百科全書

1. 字辭典、百科全書：《字辭典、百科全書名稱》，版本，檢索詞：檢索詞名。例如：《中文大辭典》，2010年3版，檢索詞：孤獨。

（六）網路資訊

1. 請註明網站名稱、網址、檢索時間。例如：臺灣大學歷史系系學會，<http://ntuhistory.wordpress.com>（檢索日期：2012年11月3日）。
2. 無法取得出版資訊的網路圖片、影音資料：〈作品名稱〉，網址名（檢索日期）。例如：〈中國史四紀錄片〈銅像記憶〉〉，<http://www>.

[youtube.com/watch?v=ZNRDr6_G-GY](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NRDr6_G-GY)（檢索日期：2012年10月28日）。

- 二、 專書、論文、已出版的影像、音樂，第一次引用請註明完整資料；以後即可省略出版項、資料來源。

伍、徵引書目

- 一、 書目請按文獻史料（檔案、原典、考古報告等）、近人著作（中日韓文在前、西文在後）、圖片、影音資料、網路資料之次序分類列出。
- 二、 中、日、韓文著作請按作者姓氏筆畫，西文著作請按作者姓氏字母排序。
- 三、 學術格式請按腳註格式，然出版項不加（）。例如：楊寬，《戰國史》，臺北：商務印書館，1997 初版。

陸、投稿方式

- 一、 來稿請附 Word 與 PDF 檔各一份。

《史繹》徵稿啟事

《史繹》是一份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史繹》編輯委員會主編的學術刊物，創刊於1964年。50年的歲月中，《史繹》除了見證臺大歷史師生的開枝散葉，同時也見聞了臺灣史學界的蓬勃發展。在這份歷史悠久的刊物上發表文章，難能可貴，也具有重大意義。

《史繹》是大學生的刊物。這份刊物收錄優秀學生論文、作業觀摩及書介等，採行雙向匿名審查制，所有的文章皆會送該領域最優秀學者審核。對學生而言，這是絕佳的學習機會。此外，自2013年12月、《史繹》初辦第38期成果發表會之後，每期的《史繹》皆會在出版前舉行發表會。除了發表之外，作者也將寶貴的研究經驗，與讀者分享。投稿《史繹》，是將來有志於從事學術研究的大學生的初試啼聲。

《史繹》主要徵求二類文章：（1）學術論文、（2）書介。（1）類文長約一萬至二萬字，（2）類文長約5000字。此外，若有其他與學術相關的文章，如作業觀摩、史料研讀等，亦歡迎來稿詢問。未來將視情況，開拓其他與學術相關的文類。

《史繹》編輯委員會致力將《史繹》打造成「中文世界大學生的歷史學術刊物」，收稿對象為所有以中文寫作的大學生。本刊物全年徵稿，文章隨到隨審。

《史繹》承續其悠久的傳統，希望為推動中文世界大學生的史學研究而努力。在此誠摯地向各位同學徵稿。

Contents

Research Paper

- 1 Zuochanzhaofu : A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iejiaofu and Zhongcaihun
Chien-Yu Wu
- 19 Examining the Official Ideology and Shaping of the Academic Atmospher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Hou-yu Shih
- 59 The Korean Cheonhado and its World View
Chi-Lok Chu
- 87 Financial Revolu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Commercial Society: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Early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Alvin Chen

First-Hand Learning

- 125 Studying the Sexual Violence Conducted by the Soviet Red Army During the Battle of Berlin as Portrayed in *A Woman in Berlin*
Rong-Chi Liao

Book Review

- 151 Frank 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Ming-Bo Lin

Chronology

- 159 Minutes of the Book Launch Presentation for *History Unraveled*
Rong-Er Chang

- 183 Course of Study
Hou-yu Shih

史繹

官方網站：shiyihistory.org

電子信箱：shiyintuhistory@gmail.com

聯絡地址：10617 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 段 1 號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史繹》編輯委員會

聯絡電話：+886-2-3366-4702

編輯委員會

主 編：林宜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編 輯：李亞臻（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陳靖叡（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美術編輯：吳倩宇（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責任編輯：張容兒（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編輯顧問：林維紅 老師（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行政顧問：陳南之 助教（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排版顧問：曾絲宜 老師（景文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

劉柚佑 老師（淇奧友善股份有限公司）

李主冠 老師（淇奧友善股份有限公司）

涂雅筑 老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法律顧問：周慧芳 律師

出 版：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印 刷：淵明印刷有限公司（新北市永和區福和路 164 號）

出版日期：2014 年 6 月

ISSN：2305-8919

本刊收錄於：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華藝線上圖書館（airiti Library）、Hyread ebook 電子書店